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2023/6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yj](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开放获取：<https://cp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 年第 6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年第6期（总第42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7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 01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 齐卫平 郑天骄
- 13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 侯勇 柯增金
- 26 团结与凝聚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
/ 康秀云 梁志勇
- 38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
——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 / 俞佳奇 秦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5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 何旗
- 67 从“谋一域”到“谋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
在地方的孕育和实践 / 卢建华 颜晓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81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坐标、场域与
进向 / 何玉芳 张晓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93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 方正

108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去窄化”？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 朱尉 汪喆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126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 林华山 龚静阳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145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成因、影响与走向 / 戴维来

163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总目次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3 No.6(Sum No.42) Vol.7

- 01 The Formation Logic,Internal Logic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Qi Weiping&Zheng Tianjiao
- 13 The Generative Logic,Content System and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Hou Yong&Ke Zengjin
- 26 Unity and Cohesion of the People: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Kang Xiuyun&Liang Zhiyong
- 38 The Connotation,Value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Form of the United Front—Based on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Yu Jiaqi&Qin Xuan
- 53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hina '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e Qi
- 67 From 'Seeking a Domain' to 'Seek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the Local Breeding and Practice
Lu Jianhua&Yan Xiaofeng
- 8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ordinate,Field and Direc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He Yufang&Zhang Xiao
- 93 Intelligent Algorithm is Embedded in the Reform Logic,Digital Obstruc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ang Zheng
- 108 How to 'De-narrow' the Educa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Zhu Wei&Wang Zhe
- 126 From United Front Discourse to Discourse United Front: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spect of United Front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Lin Huashan&Gong Jingyang
- 145 The Debate and Continuation of Australia 's Taiwan Strait Policy:Causes, Impacts and Trends
Dai Weilai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齐卫平 郑天骄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应将这一重要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贯通地而不是割裂地加以理解和把握。从形成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要求，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从内在理路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包含结构、过程、功能、使命的完整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握时代特点、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要求、承担时代使命，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展开，彰显了守正创新的发展特征、人民至上的人本特征、系统科学的辩证特征、自信自立的引领特征以及胸怀天下的开放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导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武器。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G120；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6-0001-12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6.001

作者简介：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天骄，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ZD014）；华东师范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究项目（2023ECNU-XWHSX04）

引用格式：齐卫平，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6）：1-12.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个具有厚重分量的重大概念，意义深远。习近平文化思想擘画了促进我国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蓝图，其中蕴含的创新观点和推动文化工作发展的先进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厚植精神力量、指明前进方向、确立行动纲领。

习近平文化思想一经提出，便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内涵、理论意义与实践要求等主题，聚焦“第二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七个着力”等理论要义，持续加强相关研究和阐释。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动实践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1]。有研究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概括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化建设经验等“凝练升华而成的科学的、实践的、开放的思想文化体系”^[2]，包括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文化“两创”理念、文化国际传播、文化使命等内涵^[3]。学界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意义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4]。有研究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结合”“全球文明倡议”四个方面作出概括^[5]。有研究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中的“标识性概念”^[6]。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应将这一重要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贯通地而不是割裂地加以理解和把握。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理论特征三个维度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在逻辑、发展逻辑与行动逻辑。这是做好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的重要前提。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7]这个重要观点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使强大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相匹配。精神是由文化铸造的，文化以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为一个民族提供精神支撑。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不断深化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根据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理论逻辑：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8]。党的二十大突出强调了推进理论创新的要求，将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贯彻了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求，回应了党的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9]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包含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12.

结合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 实现了党的文化理论的创新和思想观点的突破, 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深入发展谱写的文化篇。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要在中国落地, 不是采取“拿来主义”就可以做到的。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具体实践, 并从实践中得到新的升华。在这个过程中, 党也积累了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发展经验, 为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历史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 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10] 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性、体系化的思想理论, 内在包含着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的创新观点,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 是推进中华文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成果。文化建设是灵魂, 坚守文化之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理论创新之根脉,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文明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1]。在中华大地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逻辑看, 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提出之日起, 便内在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的要求。然而, 由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紧迫性,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更加突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待深入展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向文化层面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创新论断, 不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大突破意义, 而且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二个结合”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邃思考, 以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将中华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贯通起来, 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

(二) 历史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根。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说, 中国共产党有两个“老祖宗”, 一个为马克思主义, 这是思想的“老祖宗”; 另一个为中华文化, 这是历史的“老祖宗”。思想互相契合把这两个来源不同的文化连接起来, 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作为“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地打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烙印。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1]。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 显示了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奠定了基本的文化底色和深沉的民族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总体要求。进入近代, 在西方文化的强制入侵下, 中华文化开始面临文化转型发展的道路难题。面对这一文化难题, 洋务派给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 维新派试图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12], 还有一些人士则提出了全盘西化或文化复古的文化主张。但是, 这些方案都没能解决亡

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作出的文化选择，妥善处理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于适应现代要求和现实需要的传统部分予以继承，对于不适应的部分有选择地予以转化和发展，以中华文化的精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致力于“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3]，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到新中国成立后推进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保护，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尊重历史，自觉承担延续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作出丰富阐述，内容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文明特性与传承路径等。这一系列精辟论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在继承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诉求，在创新现代文化中汲取传统资源，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创新发展的文化自觉。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践行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方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扬弃”为途径批判性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包含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思想理论。传统之所以必须扬弃，是因为文化需要经过历史筛选。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明总是随着时空变化而演进，如果不与时俱进，曾经璀璨的文明也会黯淡失色，曾经辉煌的文化也会落伍衰落。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处理好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关系的重点，形成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思维与创新原则，揭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路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科学态度继承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实践逻辑：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14]。这个战略任务的提出是基于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来自中国的发明创造与经验积累通过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深刻影响了世界走势、人类发展”^[15]。中华文明的强烈吸引力曾经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造就了“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恢宏气象。但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在和西方工业文明的竞争中，中华文化遭遇了挫折，一时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便是背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而生的，“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13]，为重焕中华文明荣光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积极建设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3] 706}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6]，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繁荣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迈出全面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在各方面都强起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搞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17]。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12.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背景下,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取得创造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 呼唤新的文化思想的指导。

习近平文化思想适应了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要求, 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 文化现代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没有现代文化不可能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8]。“旗帜”就是思想理论, 指引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 集中体现为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系列新理论新理念新战略指导文化建设, 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篇章。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开放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强调“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的重要论断, 到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九个坚持”提出宣传思想工作新任务, 到党的二十大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设工作, 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辟概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和深刻论述“两个结合”的内涵机理, 再到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路呈现不断延伸拓展的发展轨迹。基于“结构—过程—功能—使命”的分析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理路可做如下概括。

(一) 结构: 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组成部分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的要求^[19]。做好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 应把握这一思想的体系结构, 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加以深入研究。

首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该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续写了该科学体系的文化篇章。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等一起, 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丰富并发展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系统性成果。文化是根, 是精神支撑, 是最深沉的力量。“文化对社会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进步都可以发挥引导作用。”^[20]新时代党的最新理论成果都要从文化中汲取力量, 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均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21]的重要定位, 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厚重分量。

其次, 就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身而言, 其诸多思想观点组成的理论系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 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思想引领实践, 理论指导行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呼

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系统中，包括意识形态工作、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等丰富内容。“四个自信”“九个坚持”“两个结合”“七个着力”以及新的文化使命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实践路径、目标任务等重大问题。

再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具体实践中，不仅指导文化建设，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关乎国运、民族命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并且文化中包含的治理智慧、德治观念、廉洁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与借鉴的重要内容。“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22]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在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各方面，文化都发挥着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铸魂，能够在各项建设中发挥助推器、导航灯的作用。

（二）过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实践孕育科学理论，伟大时代诞生先进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体系，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实践而丰富发展。文化发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契合、互相成就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2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全方位地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历来是中国的显著标志，现代之中国理应是中华文明现代化之中国。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使命任务，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紧密相连。“任何一种现代化形态或者现代化模式，都包含着文化层面的追求。”^[24]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文化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时代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路径，建立在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传承和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攻坚期，新征程新使命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新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显著的国家标志。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引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是新时代最为重大而生动的实践活动。在这项伟大事业和实践活动中，文化建设处于突出位置。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繁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找到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12.

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结合处, 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三）功能：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增强把握历史主动的能力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把坚定文化自信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 构成“四个自信”的完整表达, 并将其视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使命”。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政党等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与强大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 指出“坚定文化自信, 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18] 536}。习近平总书记从这样的高度对文化自信作出强调, 提升了文化的战略地位。文化具有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的功能。自信自立、历史主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 涵养于文化之中。

在“四个自信”中,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8] 536}这六个“更”的话语表达传递着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文化发展的坚定态度和巨大决心。文化自信建立在优秀的文明成果、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基础上。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近代以来, 中华文明在和外来文化冲突中蒙尘受辱, 民族自信心一度受到打击, 有人甚至产生“月亮也是外国圆”的迷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中重拾信心, 在建设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中不断焕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斗志, 收获了文化建设的硕果, 创造了一系列文化成就, 增强了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 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19]。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 是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道理、中国经验, 是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来的中国理论, 不仅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力量, 而且开启了文化建设进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 “有了文化主体性, 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1]。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党的思想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前瞻性, 促进全民族更加坚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心, 更加坚定对中华文化、革命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豪感, 使全民族的精神面貌更趋自信昂扬。

（四）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相对应, 两个概念反映时空意义上的区分。然而, 历史是不能隔断的,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天的中国由过往的中国演进而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化, 是在传统文明基础上实现的版本更新、文明迭代、文化飞跃。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态度。古与今、陈与新点明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联系和区别。现代文明是在传统文明的母版上发展起来的, 是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现代文明是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文明, 是传统文明的现代版本。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要求。“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7] 3-4}近代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实践探索中长期面临“中西之争”的历史课题，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曾机械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划出一条鸿沟，认为西方文化代表着新文化，中国文化代表着旧文化，有人甚至以“全盘西化”抹杀中华文明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3] 706}，“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3] 709}。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党中央以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使命，自觉地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入发展中拓展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空间；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遵循“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化发展规律^{[18] 537}，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提升文化建设的思想自觉和精神主动增添了新动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创新实践的文化指向，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文化形态。作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基因影响着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实践的价值取向。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既由社会制度、国家性质决定，同时又受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历史文化传统并非水火不相容，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验智慧，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民本思想、道德观念、政治追求、国家理想等思想资源，并将其融入新时代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国家治理和党风廉政建设之中。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创新实践催生了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使命所在、目标指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担负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19]。其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集中表达和主要任务，锚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进目标，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是这个时代社会精神的写照，都带有这个时代鲜明的烙印。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握时代特点、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要求、承担时代使命，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展开，彰显了守正创新的发展特征、人民至上的人本特征、系统科学的辩证特征、自信自立的引领特征以及胸怀天下的开放特征。

（一）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特征

守正创新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特征。“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1]守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基础，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动力。在守正、创新的双向驱动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展开，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12.

实践中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

坚持守正必须正本清源。“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以正本清源坚持守正，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正”的问题。繁荣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必须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文化建设不断创新发展十分重要，但是只有坚持固本培元、正本清源，才能守住魂和根。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阐述，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开拓新境界提供了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

坚持创新必须与时俱进，如果墨守成规、刻舟求剑，人类社会就不能进步。以与时俱进坚持创新，把握时代脉搏是前提。从文化进步的角度说，中国共产党有两个优势，一是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二是具有创新创造的民族禀赋。两个优势构成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强大力量，也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有利条件。守正是为了推动创新，创新是为了巩固守正。守正释放创新能量，创新激活守正动力。作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创新促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新，反映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要求，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大势，提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新的文化使命，鲜明体现了发展特征。

（二）人民至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本特征

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基本要求和最终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孕育诞生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带有鲜明的人本特征。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时强调，“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19]。以文化人、教育人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要求。“文化即‘人化’”，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22] 295}。党的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文化利益，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民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实现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坚守的立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源自人民，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效由人民评判。早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毛泽东就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创作导向。2005年，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时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为本，基本要求是“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最终目标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2] 298}。进入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习近平在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时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例如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文艺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这些导向回答了繁荣文化“为了谁、依靠谁、造福谁”的重大问题，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特征。

（三）系统思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这一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理论严谨、逻辑严密、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融通传统和现代、贯通历史和

现实、着眼全局和长远，立足本民族、放眼全世界，始终以系统思维谋划文化建设。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便提出“文化大省”的建设目标：“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个强省’”，实现文化大省和“四个强省”一体建设^[22]²⁹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两个大局”，将新时代文化建设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进行统筹思考与战略谋划，将文化自信列入“四个自信”体系中，将文化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机联系起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水平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整体性思考。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立足全局部署文化工作，又要着重把握文化工作的主要方面；坚持既抓全面又兼顾局部，着力抓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强调“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同时强调“加强文化建设要有主心骨”^[17]¹²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是文化建设的主心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极端重要”一词来揭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战略地位，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并提出要以“七个着力”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19]。“七个着力”凸显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态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社会号召力、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基于力量传递机制，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效能将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社会动员和国际影响的优势。

（四）自信自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特征

自信自立是主体精神独立、精神主动的一种积极状态。自信才能自立，自立方能自强。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发展史中生生不息，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根本原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成为当今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靠的是自信自立。自信自立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也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必须坚持的宝贵精神。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精神特质，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自信自立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正是在自信自立的精神引领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发展完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往往因丧失自信而难以自立，缺乏自信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自信不足的政党同样难以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发展。文化发展从来不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体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1]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发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巨大潜力，坚持文化自立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坚定不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自信自立为精神引领，提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树立起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面光辉旗帜。

齐卫平, 郑天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12.

（五）胸怀天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开放特征

马克思主义素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突出地表现为胸怀天下的世界担当和全球视野。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其胸怀天下的思想特征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和中华文化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熔铸了中国共产党人开阔的眼光、开放的态度和包容的胸襟。

习近平文化思想胸怀天下的开放特征具体表现为文化“引进来”与文化“走出去”两方面的齐头并进，坚持传播中华文化与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相结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观点。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世界文明的一贯态度，保持尊重态度才能做到文明共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双向互动的。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上，文化“引进来”就是要博采众长，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外学来的科学真理。”^[25]文化“走出去”就是要兼济天下，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惠及世界各国。回溯历史，人类社会的进步曾受益于中华传统文明。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分享文明成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现代文明观，开放特征彰显胸怀天下的世界取向。

四、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体系，聚焦新的文化使命，回答了新时代繁荣和发展什么样的文化、怎样继续繁荣和发展新时代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怎样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等实践课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创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文化主体性的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诞生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极大地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内在逻辑、发展逻辑的深刻把握转化为坚定的行动逻辑，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两个结合”，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不断谱写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沈壮海.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引领 [N]. 光明日报, 2023-10-27 (11).
- [2] 刘成, 李建军.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 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31016.0954.002>.
- [3] 胡钰.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内涵 [J/OL]. 青年记者. <https://link.cnki.net/urlid/37.1003.G2.20231024.1411.002>.
- [4] 郝立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N]. 学习时报, 2023-10-27 (1).
- [5] 陈金龙, 何希贤.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N]. 光明日报, 2023-10-17 (6).
- [6]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 [J/OL].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8.C.20231030.1134.010>.
- [7]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5.
- [8]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丁薛祥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10-29 (1).
- [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64.
- [10]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是, 2023 (20): 4-9.
- [1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12] 康震.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8): 4-9.
- [1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62.
- [15] 齐卫平, 樊士博.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回应、文明破解与世界意义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24-3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1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99.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5.
- [19]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20] 曹一飞. 从新文化到新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0-109.
- [2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6.
- [22]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293.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88.
- [24] 樊士博.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精神界标 [J]. 红色文化学刊, 2023 (3): 17-20.
- [25]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2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93.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侯勇 柯增金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 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文化实践,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的发展过程, 并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 从本体论上回答了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 从价值论上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什么要建设文化强国; 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么建设文化强国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围绕文化建设的地位价值、使命职责、政治任务、形势要求、功能作用、基本遵循、战略安排、世界格局等方面展开。相应地,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由文化价值观、文化使命观、文化任务观、文化认识观、文化功能观、文化发展观、文化实践观、文化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6.002

作者简介: 侯勇,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柯增金,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论”(22FKSB028);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创新”(2021SJZDA068)

引用格式: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世界观等有机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建设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坚定文化自信，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方法是坚持“两个结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发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以推动人类文明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对新时代文化理论观点的集成性创新，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原创性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0；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6-0013-13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在 2023 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文化新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文化实践的智慧结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深入阐发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生成逻辑，系统阐释其思想体系，深刻认识其原创性贡献，有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形成团结奋斗合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这一重大理论成果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已经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分别从思想内涵、形成发展、价值意蕴、鲜明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阐释。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内涵。学界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思想的内涵、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曲青山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等 11 个方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了解读^[2]。刘成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形成、内涵、特征等方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概念进行了学术化阐释^[3]。黄伟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包含文化问题域和文化主义论、方法论、知识论、功能论等在内的系统化的文化理论^[4]。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学界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分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过程。胡佳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逻辑分析了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指引，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文化”的内在价值逻辑，提出“传承、弘扬、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选择^[5]。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蕴。林国标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树立文化自信确立了价值坐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推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6]。魏崇辉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文本，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并从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等角度阐明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方法路径与制度保障^[7]。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学界从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多对哲学范畴及其内在关系分析了这一思想的特征。陈金龙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传承性与创新性”“文化主体性与多样性”“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民族立场与国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际视野”的有机统一体^[8]。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宣传层面, 系统化、学理化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工作有待加强。为此,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依据, 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原创性贡献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任何创新性的理论成果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习近平文化思想也不例外。这一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实践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经历了从“思想萌芽”到“实践探索”再到“形成确立”的动态发展过程, 是一个不断丰富、日渐完善的思想体系。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文化实践,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沃土。

1. 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

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重视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践, 还重视对无产阶级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建设。关于文化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 文化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上层建筑, 文化属于思想意识, 但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 而是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文化作为上层建筑, 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 思想文化的“精神生产力”将“一经掌握群众”的理论转变为“物质力量”, 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关于文化的产生, 马克思认为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实践, 即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0]。在生产实践中, 人们逐渐学会使用、制造并优化劳动工具, 以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 并逐渐形成文化。关于文化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类社会在发展运动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社会形态, 所形成的不同文化, 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总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其服务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列宁根据俄国的革命实践, 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 聚焦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灌输”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并最终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他认为要发挥文化的“唤醒”作用和“振作”功能, 构建无产阶级的文化意识; 在文化建设主体上, 要为无产阶级群众提供丰富多样、根植于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立场;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正确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为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

础。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伟大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就有了精准的认识。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2]党领导人民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纲领，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文化在革命前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在革命过程中，是凝聚统一战线的思想法宝。”^{[12] 708}。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明确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3]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文化建设方针，并制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文化原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14]，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培育“四有”公民，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14]社会主义文化。胡锦涛提出“和谐文化观”，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提出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15]的文化发展目标。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如何凝聚和调动文化建设的多样力量，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3. 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资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自己也非常喜欢文化典籍，直到现在，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16]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是重视精神和思想的民族，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仅诞生过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大思想家、哲学家，还留下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宝贵文化遗产，形成了释、儒、道、法、墨等众多思想流派，其中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最大。孔子、老子更是被评选为世界史上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王阳明、朱熹等一大批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至今依旧熠熠生辉。这些思想家留下了他们独特的精神产品，构建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形成了鲜明的精神标识。集体主义文化、爱国主义文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仁、义、礼、智、信”的文化价值共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精神，“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的邻里邦交思想，“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美好愿景等，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为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两个结合”在 21 世纪中国的具体文化形态呈现，是中华优秀传统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动表达。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离不开党的十八大前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以及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的具体实际和丰富实践作出的理论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前，习近平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他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和中央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准备。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正定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他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都是硬任务”^[17]。习近平在宁德、福州等地工作期间，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有了新认识。他指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18]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既强调文化传统的特殊作用，又明确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文化传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双创”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根基。习近平在工作中谈到，要建设“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讲到“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19]。习近平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20]。在上海和中央工作期间，习近平进一步深化了对思想文化建设的认识。他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1]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努力成为学习型政党，而且要以自己的示范行动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的思想品格。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3]；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做了进一步概述，集中体现在所提出的“九个坚持”之中，强调了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提出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写入2035年的远景目标。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特别是强调“第二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为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明确中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

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论断，表明其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2023 年 6 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出“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并从“结合”的前提、“结合”的结果、“结合”的根基进行了深刻阐述；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创新观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呼之欲出。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提出“七个着力”重要要求；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要求以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作出的一系列部署、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内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文化实践的结晶和理论创新的成果。这一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梁八柱”。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围绕着文化建设的地位价值、使命职责、政治任务、形势要求、功能作用、基本遵循、战略安排、世界格局等方面展开。相应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由文化价值观、文化使命观、文化任务观、文化认识观、文化功能观、文化发展观、文化实践观、文化世界观等有机组成。

（一）文化价值观：“三个事关”论断突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极端重要”的定位充分表明，党中央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来的。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地位的深刻认识，是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归根到底是思想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理所当然要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统一领导，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价值取向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24] 148}。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二）文化使命观：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指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引领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紧跟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26]，“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一是继续推动文化繁荣。近代以来，一段时期内，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遭遇启示我们，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时代要求，也是民心所向。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继续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做好文化传承是先决条件，加强文化发展是必由之路，要在传承与发展中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二是建设文化强国。新时代新征程上，以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必然；建设文化强国，是其中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曾提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同理，在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精神贫瘠也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要回答、解决这一时代命题。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是连续性的文明，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国。我们要建成文化强国，还需要进一步激活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髓，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25] 228}。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对传统的抛弃，而是对传统的继承、转化和再造，既是对古老中华文明的赓续和传承，更是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的转化和更新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新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刻阐明了新的文化使命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三）文化任务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任务观就是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以科学理论引领社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24] 53}，要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24] 36}，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2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学习教育，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在全党全社会开展了多次主题教育活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新时代新征程上，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在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不少风险与挑战。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把“总钥匙”。其包含的“六个必须坚持”“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深刻回答了思想文化建设的实践之问，为建设文化强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推动人类文明事业指明了方向。

（四）文化认识观：回应时代所需，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观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面对世情、党情、国情的深刻变化，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思想文化是激发创造性的动力因素。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发生深刻变化，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意识形态斗争越发激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期，需要更好

发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凝聚共识、振奋人心的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6] 328}的宣传工作职责；确立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宣传职责；强调“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26] 311}，把“最大公约数”做得更大，把“最大同心圆”画得更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拓展宣传思想工作领域，要求“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26] 318}。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管好用好网络，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引导权，打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网络生态环境。文化认识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的思维方法，突出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凝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合力、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为形成大宣传、大文化、大发展的良好局面提供方法指南。

（五）文化功能观：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思想保证、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功能观表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职责任务是围绕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使命任务而展开，着眼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聚焦中心任务，打牢共同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以“两个结合”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让中华文明达到新的高度。在国际视域中，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4] 36}，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更为全面、立体、真实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4] 38}，加快形成与大国竞争要求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职责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功能观既立足于当下中国实际和发展任务，又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格局，发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大功能，为新时代党的中心工作和使命任务凝聚磅礴力量，创造有利文化条件，打牢共同思想基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六）文化发展观：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观是新时代文化建设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是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4] 536}他提出：“只有自信的国家 and 民族，才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26] 248}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为什么要坚定文化自信、怎么坚定文化自信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秉持开放包容。开放包容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精神品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23] 228}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28]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一种文明“活的灵魂”，也是驾驭文明成果的精神力量和显著标识。所谓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28]。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观从根本制度、根本要求、领导力量、文化主体性等方面，鲜明回答了何为“守正”、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为何“守正”，何为“创新”、如何“创新”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七）文化实践观：“七个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七个着力”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为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提供科学指引。在“七个着力”中，党的领导居于首位，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是由党的宗旨和党的初心使命所决定的。“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规定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担负的使命任务。“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广泛共识，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方面。“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是涉及党治国理政的大事，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关键。其要求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重视传播手段和传播形式的推陈出新。“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要求坚持以文化事业强国和文化产业强国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突出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兼顾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益，加强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求提升中华文明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宣介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更好更快走向世界。

（八）文化世界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民族的，也是当代的、世界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24] 48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什么贡献、还要作出什么贡献。”^[29]“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4] 280}他强调要坚持互鉴、包容、对话的新型文明观，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文化霸权与文化独裁，而是倡议对话、交流、合作，创造丰富多样的世界文明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以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和平发展的文明发展理念推动形成新的世界文明，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了来自中国文化的智慧方案。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博大的文明情怀，这一思想回答了文化发展的世界之问，为世界文明增添了新的精彩篇章。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本体论上回答了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即文化使命观、文化任务观。从价值论上，它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什么要建设文化强国，即文化价值观、文化认识观、文化功能观。从方法论上，它回答了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么建设文化强国、怎样处理同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即文化发展观、文化实践观、文化世界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深刻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在要求，有力回答了“古今中外”之争，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传承和发展、本土与外来等关系提供指引。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原创性”包含了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创新理论思维、变革理论内容等，其核心是提出新观点、新命题、新概念，对事物发展运行规律有新论断、新见解、新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坚定文化自信，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方法是坚持“两个结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发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以推动人类文明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一）提出文化建设的前提基础是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文化自信”并将其作为“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举措。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文化理论以“文化自觉”为主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并把坚定文化自信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将“坚定文化自信”上升为文化建设所需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充分体现了“坚定文化自信”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认识发展，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历史主动精神回应文化建设的时代化之问与现代化之需。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的力量之源。它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轴线、以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理论创新为灵魂、以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产生活为依托，坚持人民至上的工作导向和理念原则，成为解答新时代文化建设诸多问题的思想武器。只有自信才能自强，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是心理基础和前提条件，文化自信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弘扬民族精神。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加基础、更加广泛、更加深厚的自信，为其他自信提供思想准备和情感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文化部分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为题，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阔目标，对文化自信赋予了更高意义。文化自信是一种基本原则或方法论，始终作为提振和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与要求，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朝着实现文化转型和文明更新的道路迈进。

（二）提出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坚持“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明确了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突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维度和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根本。“两个结合”不仅是根本方法，也是发展必然。它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的科学方法，让文化主体性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从为什么能“结合”、为什么要“结合”、怎么“结合”、结合成“什么”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观点。在为什么能“结合”方面，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契合性和“结合”的可能性。在为什么要“结合”方面，他论述了“结合”的必要性，即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唤醒其生机活力, 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结果来看, “结合”是相互成就。“第二个结合”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必须”, 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可能”。“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属于马克思主义, 也属于中国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两个结合”的结晶和理论成果。从价值维度上,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 打开了创新空间, 巩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

（三）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制度稳则国家稳, 制度强则国家强, 制度优势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义理根据、实力支撑和持久势能。建设文化强国, 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确立一个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上升为根本制度, 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这一制度的确立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它使党的文化领导权更加稳固, 使党心、民心更加团结, 使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更好发挥作用。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来自其自身的人民性、实践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力,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的一项战略任务, 也是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这一根本制度的确立, 使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根本性变革, 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深入人心, 凝聚起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思想共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 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精神旗帜, 以马克思主义统领文化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确立这一根本制度, 顺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文化立场。这一根本制度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 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

（四）明确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呼应,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30]。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创新发展的文明、兼收并蓄的文明、和平发展的文明, 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31]。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等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提出伟大建党精神, 强调历史文化的传承, 并对保护文化遗产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 “文明”是“现代化”的目标之一, 也是其本质规定所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过程, 不仅意味着要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技力量, 也需要有现代化的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文化素养和现代化的精神生活, 这些因素共同标识着人类文明的嬗变和跃升。“现代化”本身就必然蕴含着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协调发展的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孕育产生, 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两个结合”根本要求一脉相承, 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

建构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形态，经由“结合”而凝聚的新特性丰富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内涵，经由“结合”而提升的新高度夯实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五）发出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人类文明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表达了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以及友好交流互鉴的态度。“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提出的又一国际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的中国答案，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发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沟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24] 568}文明因交流而更加多彩，因互鉴而更加丰富。文明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互鉴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博大胸襟，坚决摒弃文化霸权主义，将和平共处发展原则延伸到文化层面，强化世界多元文化主义共识。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完善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担负着凝聚共识的责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各国平等发展的权利，彰显大国形象与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彰显人类文明进步新气象，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这一思想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哲学高度，突出了文化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注重发挥文化建设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价值，强调文化建设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作用，揭示了文化建设对于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象的重大功能，深刻阐明了精神文明的重大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实现了对新时代诸多文化理论的集成性创新，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五、结语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征程。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通达真理、逻辑严密的科学性，通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实践性，服务大众、凝心铸魂的人民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它从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上回答了文化建设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世界之问。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能够为前进道路上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能够激发人们的文明担当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凝聚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3-25.

-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2] 曲青山.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N]. 学习时报, 2023-10-23 (1).
- [3] 刘成, 李建军.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31016.0954.002.html>.
- [4] 黄伟. 习近平文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31030.1032.002>.
- [5] 胡佳, 田探.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选择——基于对“三大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发展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31024.1728.004>.
- [6] 林国标.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弘扬 [J/OL].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2310.0366>.
- [7]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 [J/OL].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8.C.20231030.1134.010>.
- [8] 陈金龙, 蔡馥.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101.002>.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07.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2.
- [11] 孙士聪. 列宁文化领导权理论再阐释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 (6): 65-70.
- [12]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664.
- [13]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44.
- [14] 江泽民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7-18.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59.
- [16] 汪晓东, 李翔, 宋静思. 总书记这样和大学生谈心 [N]. 人民日报, 2021-12-01 (1).
- [17] 习近平. 知之深 爱之切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17.
- [18] 习近平. 摆脱贫困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5: 149.
- [19] 习近平. 之江新语 [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49.
- [20]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317.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 [G]. 北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252.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53.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68.
- [2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7.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53.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2.
- [27]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4.
- [2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09.
- [30] 田凯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80-89.
- [31] 陈金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8): 16-21+204.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团结与凝聚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

康秀云 梁志勇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以先进文化团结人民、凝聚思想共识，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方式。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发挥文化的团结与凝聚功能。团结与凝聚人民不仅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课题，而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观照与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的团结与凝聚功能，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主张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以文化认同促进国内人民团结，以文明交流促进世界人民团结，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社会的使命追求。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注重以党的文化思想为指导团结与凝聚人民，塑造了充满团结与凝聚伟力的文化叙事——以文化革新推进社会变革，以文化改造和建设谋求统一思想、正本清源，以文化繁荣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文化自信彰显民族精神气质与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团结与凝聚人民的理论观点，包括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四个讲清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文化认同夯实民族团结的根基，以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和平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密团结与凝聚人民，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握文化身份建构，赓续党的精神谱系，促进话语创新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由人联合体；大团结大联合

中图分类号：G120；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6-0026-12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6.003

作者简介：康秀云，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梁志勇，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一般项目“新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2VSZ147）

引用格式：康秀云，梁志勇. 团结与凝聚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6）：26-37.

“大团结大联合”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文化认同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持续构筑的理想样态,也是党领导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部署均强调团结与凝聚人民。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2]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了党领导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包括“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3]。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分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4]。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5]。可见,团结与凝聚人民不仅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实践课题,而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观照和目标指向。

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献主要从价值效用、鲜明特征等方面展开研究。就价值效用而言,有研究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实践遵循^[6]。就鲜明特征而言,有研究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7]。现有文献多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点位式研究和思辨性阐释,而深耕实践价值的文献相对少见。笔者认为,应当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探究运用这一思想团结与凝聚人民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功能,以更好把握党的创新理论内蕴的思想张力和实践伟力。本文尝试从实践动因、实践演进、实践主张和实践选择等四个方面,回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团结和凝聚人民的理论必然性、历史支撑性、现实必要性,探讨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团结与凝聚人民,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

一、团结与凝聚人民是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社会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的团结与凝聚功能,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主张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自由人联合体”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组织制度和生产活动方式的理想勾勒,既与中国共产党致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张一致,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生成逻辑的一致性、价值逻辑的一致性和实践逻辑的一致性”^[8]。以文化认同促进国内人民团结,以文明交流促进世界人民团结,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社会的使命追求。

(一)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文化向度

“联合体”意指基于相同利益或共同立场形成的组织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运用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出场和阶级使命，以“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描绘未来社会的宏伟蓝图。“联合体”主张经历了从空想家们感性幻想、理性思辨与改良试验视域的“虚幻的共同体”，到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视域下“自由人联合体”的转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路径不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密谋家主张的革命政变，而是人民群众自我解放。这种自我解放包括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等经济维度的解放，“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9]；也要求消除文化隔绝，将人的自由解放的进程置于文化交往、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当中，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谋求全人类的解放。

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时代走向工业文明时代，裹挟着加剧阶级紧张关系及其不平等状态的价值因素和生产要素。固有文化隔绝导致文化发展的非均衡性，“文化中心主义”会无限放大自身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排斥外来文化的进入，消解文化平等对话的基本条件，更难以形成阶级的实质联合。受制于文化隔绝的现实境况，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难以将自营散处的共产主义运动联合起来，构成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的基本运动形态。依据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需求，结合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后的生存方式，既要求突破地理障碍、文化藩篱等客观因素，也内在地要求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紧密交流，以工人联合、区域互通的集体形式，超越地域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增强文化发展驱动力，凝聚共识并形成世界文化的联合。

（二）“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文化实践

帝国主义时期作为资本全球扩张和殖民的新阶段，导致资本剥削与压迫的普遍化，进而催生世界范围内人民群众利益与命运的日渐紧密。在领导创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列宁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资源以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也积极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批判第二国际抽象的共同体思想，指导共产国际的人类解放事业。

列宁辨识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文化争论，系统考察西方社会文化样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俄国文化的优势与落后性，探索社会主义国家通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列宁反对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注重利用优秀文化遗产，尖锐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人类文化遗产的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0]同时，列宁高度关注共产国际的人类解放事业，认为第二国际思想家提出的“革命护国主义”实际上呼应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理论。资产阶级以“民族文化”掩盖了文化的阶级性，掩盖了各民族中已经觉醒的、但尚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列宁主张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认为“国际主义”文化“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11]。帝国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也促使世界人民走向利益的共同化。列宁以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文化”理论，践行和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

（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赓续发展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

义条件下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审视与批判。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划分为三个演进阶段, 即依次经过从最初的“人的依赖性”阶段, 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最后达到“自由个性”阶段(自由联合体)。人类社会早期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虽然代表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但是并未兼顾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 个体存续的价值和意义完全由共同体赋予。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共同体取代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后, 契约和货币成为维系共同体关系的纽带, 社会关系日趋简单, 整个社会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自由”“平等”成为资产阶级掩盖剥削的口号。马克思主义描述的“自由人联合体”中, 人类将突破自然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 摆脱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 极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使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主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推动协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价值趋向上与“自由人联合体”呈现一致性。对内, 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注重发挥文化认同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 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12]。对外, 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解和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积极创造世界整体繁荣的条件。基于新型文明观,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建设、同向同行。

二、中国共产党团结与凝聚人民的文化叙事

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 注重以党的文化思想为指导团结与凝聚人民。党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深刻剖析与科学揭示文化本质,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13], 促进党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相统一。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14]不断巩固, 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筑牢人民团结、万众同心的文化根基。整体而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塑造了充满团结与凝聚伟力的文化叙事。

(一) 以文化革新推进社会变革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为人们提供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批判的理论武器, 也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考文化兴衰的决定因素、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首先, 推动文化革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 民族文化的复兴不是向传统文化形态的简单复归, 也不是沿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亦步亦趋, 而应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新, 促进人的思想和精神解放, 从根本上动摇、摧毁旧文化赖以存续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根基。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有政治革命的鲜明色彩, 也具有文化革新的历史诉求。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斗争、广泛动员的形式将文化启蒙运动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学说论争扩展至广泛的社会大众中间, 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凝聚。其次, 建立文化统一战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渗透,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大力开展文化统战工作。1936

年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出，组建一个包括文化界人士在内的各抗日爱国团体合作的联合抗日阵线。1936年11月，毛泽东指出，文学艺术家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中负有很重大的任务。1938年3月27日，依据毛泽东的相关谈话和《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纲领性文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标志着全国性的文化统一战线组织初步形成。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对外敌侵略，结成了文化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最后，发展人民文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群众文艺事业，艾青、吴伯箫、周立波、冼星海、华君武等诗人、作家、美术家、戏剧家、作曲家、电影艺术家，创造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和生产生活主题的戏剧秧歌、诗词诗歌、小说散文、歌曲曲艺、木刻漫画等。从领导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到领导苏区、陕甘宁边区、解放区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从提出和推动文化革新到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化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文艺，团结群众、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符合中国特点、以文化团结凝聚人民的道路。

（二）以文化改造和建设谋求统一思想、正本清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生国家政权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新道路。这时，我国需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面临着如何继续巩固既往文化建设成果，巩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础，进而统一思想、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任务。首先，进行文化改造。从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过渡时期，党积极革新的教育事业，发展新的文化事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和普及占领思想文化主阵地，以有步骤地改革旧学校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从而为新的社会变革提供必需文化条件和智力支持。其次，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主要包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即“一个方向”和“两个方针”。尤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以出版、广播、电影业为例，1956年，全国出版图书2.8万多种，17.8亿多册。全国电影制片厂、电影放映单位、电影观众数量成倍增长，1956年全国共摄制影片176部、译制片238部。最后，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目标。继“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5]，正式把科学文化现代化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奋斗目标。这一时期，党领导文化改造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力破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矛盾与冲突。中国共产党以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具体思想观点作为批判、评价的焦点或者改造对象，替代一般性的问题阐释、宽泛性的政治宣传与灌输，进行对旧有思想的改造和批判。这种做法适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旨在引导党内外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结成新的统一战线格局。

（三）以文化繁荣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6]，成为全党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首先，治理思想战线的模糊认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调整和消除“左”

倾错误酿成的社会紧张态势, 以批驳“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治理思想战线的模糊认识, 将文化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 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抵御境外思想入侵。其次, 确立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工作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原则,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工作理念, 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以文艺发展为例, 新时期我国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 还是从创作理念到表现手法, 都丰富多彩、异彩纷呈。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篇小说每年增加1万至2万部, 短篇小说年增量近1万部。“茅盾文学奖”设置以来持续推出众多风格多样、大气磅礴的长篇小说。在电影方面, 中国电影呈现繁荣景象, 数量与质量远超以往任何时期, 涌现出《巴山夜雨》《秋菊打官司》《大决战》《大转折》《红河谷》等一批代表性作品。最后, 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推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崭新形式和内容、鲜明时代特征和内在本质规定, 体现了“三个面向”和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其中, “面向现代化”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中国共产党践行培养“四有新人”这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通过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思想道德建设、宣扬时代主旋律, 解决人民群众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问题,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 以文化自信彰显民族精神气质与品格

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 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4]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重视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坚决反对文化虚无主义, 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 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新形势下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往往以较为隐晦含蓄的方式沉渣泛起。文化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蔑视精神文化财富, 否认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割断民族历史文脉, 漠视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传承, 矮化文化人文教化意义的负面社会文化思潮”^[17], 影响着民众的价值塑造、审美取向以及行为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中, 不单在学理和舆论上开展话语斗争, 还注重将党的先进文化涵化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 把加强思想文化教育和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相结合, 使人民群众在利益的切实满足中增强获得感, 筑牢抵御文化虚无主义思潮隐性渗透的思想防线。其次, 弘扬革命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作出重要指示, 将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尤其是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中国共产党以常态化长效化的教育实践,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与青年群体重温党史, 以史为鉴, 科学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推进“两个结合”, 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价值共识。最后, 明晰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要求全党在新的起点上肩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4]。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团结与凝聚人民的主要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团结与凝聚人民的理论观点。

（一）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也是党始终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法宝，贯通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1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以一系列学习教育实践使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强化情感认同，推动理论武装入脑入心；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理论武装的精神动能”^[19]。理论学习、理论武装永无止境。加强全体党员的理论武装和广大人民的理论教育，彰显思想伟力，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首先，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体系。这一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作出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其次，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把握党的创新理论，要求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正确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科学理论不局限于也不满足于改造对象的观念世界，更趋向于将理想化构造变成现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既指向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指向和影响人的客观世界，旨在引导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运用科学理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重改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二）以“四个讲清楚”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一方面，“四个讲清楚”明晰了文化发展意义。立足世界的变革和调整，把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优势讲清楚，实质上是以高度文化自觉透析纷繁复杂文化攻诘与诋毁、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侵蚀等现象，树立文化传承的主心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延根续脉的精神基因，蕴含和体现着民族的历史心理、文化个性和精神

特质, 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得以显现的重要纽带。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政治生态清明、经济景象繁荣、社会整体和谐的内生力量, 也是团结与凝聚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支撑力量。讲清楚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 “四个讲清楚”明确了文化传承态度。就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而言, “四个讲清楚”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态度, 即明晰历史根基, 延续传统文化从观念形式聚合成为思想体系的历史脉络; 彰显当代价值, 挖掘传统文化涵盖的理想信仰、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社会风俗等各个层次; 立足国际视野, 从中国和西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框架和比较视野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优势,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三）以文化认同夯实民族团结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0] 首先, 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文化认同体现“大认同观”。作为一种以文化为媒介的认同模式, 对文化认同内涵和本质的解读视角呈现多元化。从民族学视角来看, 文化认同被视为一个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和赞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文化认同倾向于表达人的社会属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 文化认同指代个体与文化创新互动的心理过程。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化认同, 以推进精神文化进步为发展指向, 以培育和形成健康的文化主体为目标依归, 包括自我身份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大认同观”, 交融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之中。其次,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观蕴含重大现实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实际上是以各族人民共同持有的文化符号、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文化特质, 激发团结奋斗的内在动力。在历史沉淀和实践磨砺之中, 这些文化特质具有和呈现的文化吸引力、思想感召力和社会动员力, 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赋能。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观, 正确诠释、解读民族团结的生成基础与两者关系, 即强调各民族群众对国家和文化的认同, 并依托这种文化建构生存发展的环境与保障; 文化认同是滋养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 增强着个体行动的目的性、稳定性与方向性。最后, 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文化认同增强领导力。回顾党的建设历程, 中国共产党注重通过掌握文化领导力来增强政治领导力, 注重形塑人民群众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 即以思想认同作为价值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 以价值认同作为思想认同向意识形态认同转化的情感催化剂, 并且以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必然结果。“三大认同”共同支撑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21]。

（四）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和平发展

人类历史是文化发展、文明融合的历史。文化的交流融合、文明的碰撞互促为人类社会提供多重发展的可能性。首先, 中国共产党主张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22], 是必须把握好的重大课题。把握好该课题, 在探索如何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独特性、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和对待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示, 扩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调节社会关系

和鼓励向上向善的内容。其次，以文明交往促进人类文明多元共存。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和谐共生等理念，为全球文明发展倡议的生成与制定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内容，以“文明互鉴”的文明观抵御、消解西方“普世主义”价值观引发的文明扩张及导致的文化殖民主义、文明冲突。全球文明倡议彰显开放包容姿态，致力各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制造的全球治理垄断格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架构不同文化、文明交流对话的桥梁，坚持运用团结化解分裂、合作替代对抗、包容更易排他，破解“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文化霸权话语体系，跨越“文明冲突”的陷阱、摒弃意识形态纷争，着力促进人类文明多元共存。

四、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团结与凝聚人民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有利于紧密团结与凝聚人民，以大团结大联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握文化身份建构，赓续党的精神谱系，促进话语创新发展。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2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首要的即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首先，提升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认识高度。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的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涉及的理论创新、宣传、教育，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壮大做强主流舆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一切工作的领导。其次，努力增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本领和能力。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精神，还应有谋事成事的本领和能力。党团结和凝聚人民要以坚强组织体系作为支撑，依靠党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最后，澄清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认识误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虽然强调坚守根本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绝不是随意进行宣传动员，导致用权任性。党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以大宣传工作格局协调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各个领域的法治建设、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深度融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把握文化身份建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出现新的变化，新一轮全球秩序演变的核心将围绕身份认同问题展开。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人民文化认同紧密相关，涉及党的政权稳固、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从身份认同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对文化身份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其具有归属性、规范性和关系性三重属性”^[24]，据此可将文化身份分为归属性身份、规范性身份和关系性身份三种类型。首先，建构文化的归属性身份。归属性身份的核心特征是文化身份的最高性和完整性：最高性是指全体公民超越地域、民族、爱好、性别等其他认同，将文化认同视为最深厚的身份认同；完整

性是指所认同的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 积淀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基因和精神标识,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提供精神力量。其次, 建构文化的规范性身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规范性身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 二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优势^[2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样态, 回答时代课题、应对世界变局的理论聚变,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发展铺垫了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倡导与弘扬的义利观, 规约资本恣意放纵逻辑; 弘扬和培育团结一致、奋起直追的民族精神, 彰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继承和赓续革故鼎新的传统, 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最后, 建构文化的关系性身份。文化的关系性身份无法像前两种身份那样进行统合归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 将被党、国家和人民普遍承认的全局性角色视为最重要的关系身份。文化的全局性角色对文化的局部性角色、议题性角色、情景性角色往往能够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影响。

（三）赓续党的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后发现代国家产生的政党, 历史积淀与回应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使命任务、行动自觉与理想预设等构筑起了自身的精神谱系。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与凝聚人民, 需要赓续自身精神谱系, 形成强大精神纽带。首先, 紧扣党的精神谱系的奋斗主题, 团结各方力量。党的百余年历程中, 精神谱系作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将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串联起来, 内嵌于社会发展实践的底板, 表现出团结奋斗的内在属性。新时代新征程要紧扣团结奋斗的精神主题, 把握党的精神谱系蕴涵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结构内核和思想张力, 以高度的政治自信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其次, 提升对党的精神谱系的政治认同, 塑造党的形象。精神谱系的内生品格作为塑造党的形象的符号, 深刻蕴含在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了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形象, 以人为本、勤政亲民的公仆形象,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民族形象, 胸怀世界、兼济天下的大党形象。党的精神谱系传承与形象塑造, 既依托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先进文化群体、榜样典型的引领垂范。最后, 发掘精神谱系的传播载体, 用好红色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26] 比如, 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创设“全景式”“沉浸式”的仿真体验情境, 为观众提供体验伟大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场景, 更为形象、更为直观地赓续精神谱系。

（四）促进话语创新发展

话语作为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言说符号, 具有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价值。话语包含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 能够形塑认知历史进程的观念依据和切入维度。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团结与凝聚人民, 需要推进话语创新转换。首先, 厚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话语的历史底蕴。一种话语的生成与建构离不开文化资源的供给与支撑, 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话语更是如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话语创新应当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道德规范、人文精神, 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厘定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话语之间的契合之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观念、哲学思想内含的智慧启示, 仍是当前话语

创新的宝贵资源。其次，站稳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话语的人民立场。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的高频词汇和执政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人民至上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追求。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话语创新，应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以解决和满足人民需求为实践导向，最大程度发挥话语的凝聚共识功能。最后，促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话语的有效转换。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既遵循一般话语的生成规律，也发挥着建构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的功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话语创新发展，要破解以往理论话语独存局面，实现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融通构建。

五、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理论上的新创新、新突破，在文化工作布局上的新部署、新要求，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加深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握，以“凝心铸魂、领航掌舵”增强事业发展的实践伟力，表明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达到新高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团结和凝聚人民，要始终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破解“失语”“失声”“失能”的传播困境，将抵御极端思潮渗透的篱笆织得更密更实，巩固与保障文化安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初衷和实践立场，树立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思路，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众文艺，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文化提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同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3-08-21 (1).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3.
- [3]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王沪宁主持 [N]. 人民日报, 2018-08-23 (1).
- [4]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5]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6] 方世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J/OL]. 学术探索. <https://link.cnki.net/urlid/53.1148.c.20231011.1057.002>.
- [7] 陈金龙, 蔡馥.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101.002>.
- [8] 方杲.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逻辑一致性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3): 179-186+235.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78.
- [10] 列宁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85.
- [11] 列宁全集: 第 2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26.

康秀云, 梁志勇. 团结与凝聚人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26-37.

- [1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13]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61.
- [14] 侯惠勤. 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 (12): 5-12+157.
- [15]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379.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1.
- [17] 王凯全, 闫方洁. 新形势下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隐性渗透及应对理路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 (6): 83-88.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433.
- [19] 商志晓.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入新境界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3 (3): 4-9+157.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85、279.
- [21] 梅景辉, 周洲. 中国共产党党文化认同的思想逻辑及当代发展 [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2 (6): 8-15.
- [22]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 24 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5 (2).
- [23] 方涛.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深刻意蕴 [J]. 新视野, 2023 (5): 27-32.
- [24] 刘雪莲, 康喜顺. 新时期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中的国家安全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 (10): 174-185.
- [25] 孙来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8): 65-76+168.
- [26] 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 [J]. 求是, 2021 (10): 4-1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

——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

俞佳奇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统一战线是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 兼具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等广阔面向。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统一战线从战略策略、工作手段等“形而下”之器上升为思想、精神、价值等“形而上”之道的表现形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统一战线以团结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时代任务, 推动统一战线全面嵌入文化强国的整体架构, 更加凸显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按层次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行为文化形态, 在来源上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成, 具有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等特征。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涵同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重叠共生, 即形成“起”于伟大团结精神、“承”于伟大创造精神、“转”于伟大奋斗精神、“合”于伟大梦想精神的价值结构。面向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 需要科学统筹本体论、认识论、矛盾论和价值论四重向度的实践路径, 建构嵌入政治实体、践行治理视界、运用辩证精髓和明确根本目标的总体性方案。在走向文明史深处的历史分界点上, 统一战线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3.06.004

作者简介: 俞佳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引用格式: 俞佳奇, 秦宣.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38-52.

文化形态以团结筑进步之基、以团结汇力量之源, 推动实现中华文明大一统精髓的现代转化和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历史超越, 具有赓续中华文明、重构人类文明的文明史意义, 愈益展现出助力走出当前世界变局、塑造未来世界文明的世界历史效用。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统一战线; 统战文化; 文化统战

中图分类号: D613;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6-0038-15

一、问题的提出

统一战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嵌合的历史进程。工具意义上的统一战线体现为政治层面的战略策略和方式手段, 价值意义上的统一战线是文化层面的观念外显和精神印刻。两者在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运行轨道上深层次地影响着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态及发展轨迹, 都具有持续在场的战略必要。比较言之, 工具意义上的统一战线通常因其服务中心工作、面向实践场景等应用功能而更受关注, 文化视域下的统一战线由于其相对抽象而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鉴于统一战线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政治属性与文明属性的统一体, 我们不仅要关注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践过程, 也要关注统一战线的价值面向。统一战线实践作为政治联盟的具体展开, 本身反映人们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团结互助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的集合体构成了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广义上, 统一战线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 展现出不同民族和国家力图化解冲突、消除隔阂、增进理解的共同思路 and 一致方向, 承载着人类文明谋求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包容、实现和合共生的基本主张和共同价值。在狭义上, 统一战线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摒弃私利、积极协作、团结一致的共同特质。无论是广义的统一战线还是狭义的统一战线, 从来都不单单是一种政策实践样态, 更是一种体现人类基本价值追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综合价值追求的文化形态。可以说,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统一战线作为手段的进阶形态, 强调统一战线从工作实践层次上升至文化价值层次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 体现统一战线观察视域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跃迁和聚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用主流意识形态凝聚人心、引领社会, 重视发挥文化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在部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更加强调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支撑, 更加注意调动思想文化的团结功能。2022年10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时, 把建成文化强国、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2023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2023年10月,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3]。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凸显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加强团结、深化合作等功能，契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目标追求。统一战线既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涉及思想文化工作交叉的领域，又以文化形态独立存在，成为繁荣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需要。

此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将统一战线视为政治联盟及工作策略，基本没有专门论及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既有相关研究主要就统战文化与文化统战等问题进行探讨，且主要讨论统战工作各具体领域的文化元素。比如，余源培提出开展文化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4]，陈喜庆侧重阐述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系^[5]，贺善侃提出统一战线的文化力量即统战文化力由体现统战实质、目标和功能的统战文化软实力、整合力和领导力构成^[6]，杜青林从核心灵魂、鲜明特征、丰富内涵和价值作用四重维度理解和把握统战文化^[7]。相关研究成果具有启发意义，但主要体现狭义的统战文化观，没有从文化形态包罗之宏富、涵盖之广大的整体视域考察统一战线。鉴于此，本文将统一战线从政策实践、具体领域的统战文化元素上升到整体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高度，以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为独立研究对象，明确建立认知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基本内涵的系统框架，力图在分析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价值意蕴的基础上开掘其实践面向的集成路径。

二、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

任何文化均有其存在形态，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将统一战线视为文化的整体性存在并展开理论论说的规范性概念。一般而言，文化来源于实践活动、服务于实际需求，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集合，文化形态则是关于文化的内部结构、外部要素及其内外交互状态的抽象提炼和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内部结构的立体化层次解析、外部要素的全方位来源阐释及其内外交互状态的多维度特征审视，构成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涵。

（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层次

文化属于相对宽泛的概念，既可以内在地把握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本质，取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等范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的狭义理解，也可以拓宽文化的诠释学边界，作文化渗透至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等领域并产生特定文化内涵的广义理解。在综合狭义与广义两种认知路径的基础上，文化形态的内部结构由四个层次组成，物质文化处于外围，制度文化介于中间，思想文化居于内核，三者最终落脚于行为文化。就此而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产生和积累的物质实存、制度安排、精神财富以及与之相耦合的行为取向的体系化总和；在内部结构上大致可界分细化为物质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行为文化形态。

上述四者具有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形成彼此联系、相互呼应、内在统一的逻辑整体。第一，从物质层看，物质文化形态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发展的基础形态，直接体现为统一战线的遗迹、遗址、遗物等物质载体，属于外显的、有形的、可见的表层系统。第二，从制度层看，制度文化形态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发展的保障条件，包含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规则等规范体系，属于连接物质层与思想层的中层系统。第三，从思想层看，思想层亦可称为心理层、精神层、价值层、

观念层等, 思想文化形态构成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内核, 如统一战线的思想、精神、意识、观念、理念、智慧等, 属于内隐的、无形的、相对不可见的深层系统。第四, 从行为层看, 行为文化形态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其成员行为表现、行动逻辑等方面的呈现, 凝结于统一战线活动中无数现实的个人采取各种行动所塑造的“历史合力”中, 具有贯通表层系统、中层系统、深层系统的显性表征。概括言之,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层次既梯度分明、相对独立, 又衔接紧密、协同联动, 隐含着势不可挡、坚不可摧的强大文化力量。

（二）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来源

纵览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作为生成于实践、赓续于历史、发展于时代的产物,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由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共同塑造,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兼容并蓄、凝练升华。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来源不是相互割裂、孤立存在的机械求和, 而是既密切联系又各具特点的有机加总。

第一,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1] 28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深植厚培的文化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 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 天下共治理念, ‘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 ‘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 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 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2]从这个角度看, 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淌于统一战线的血脉之中, 已经成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最基本、最强大的优质基因。

第二, 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一方面, 从质的规定性意义看, 统一战线最初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为建立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的阶级联盟所采取的策略,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与革命文化在强调斗争性的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革命文化形塑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精神底色。另一方面, 在党领导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 革命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各具时代特征的精神谱系, 共同蕴含着坚守理想、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等特定文化内涵, 构成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独具特色的重要源泉。

第三,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毛泽东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9]。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包含并积淀着统一战线展开过程及其结果的全部历史规定, 而且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要求, 浓缩并体现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的全部文化创造成果, 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注入蓬勃旺盛的创造活力。

第四, 以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镜鉴。马克思认为, 由于各民族狭窄地域性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已转向世界历史时代,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

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 404}。在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中，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不是在封闭静止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而是在理论上吸纳人类文明创造的关于合作、团结等理念主张在内的一切有益思想文化资源的筛选和融合中探索出来的，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轨道中开创出来的，其效用和意义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

（三）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

基本层次和基本来源是从内部与外部的直观意义上把握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具体呈现样式的前置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探析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从抽象意义上理解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属性的必经之途。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第一，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文化形态，又遵循一般文化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政治性而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根本属性即无产阶级的政治属性。相较于人类社会其他形式的政治联盟，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8] 419}；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8] 434}。无产阶级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等要求，熔铸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独特的精神标识。就科学性而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厚重的理论根基，遵循一般文化形态源自实践、来自理论的客观规律，既是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孕育和升华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质料，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发展相关，是总结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智慧创造。

第二，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孕育而生，又根植于现实基础、服务于现实需求。就历史性而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积蕴于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史，与一定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具体任务密切相关。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涵括“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10]的价值取向，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发挥独特历史作用、标定关键历史坐标，繁衍扩展、交织叠加为“大历史”的脉络与面貌，具有厚实凝重的历史感。就时代性而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回应时代关切中应运而生。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围绕联合与斗争的主轴，主要表现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and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等精神风貌。建设时期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反映“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11]的时代任务，在稳定人心、巩固政权、建立制度等方面延拓新的文化内涵。改革时期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聚焦大统战工作格局和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凸显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文化优势。

第三，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内容上实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在形式上不受时空场域的局限、不受传统成规的约束。就一致性而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具有相对稳定的精神内核，既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铸就热爱祖国、矢志报国的强大精神纽带，又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造就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强劲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多样性而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物质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形态、思想文化形态和行为文化形态的有机融合体，并保持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化品格，广泛容纳统一战线涵盖的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港澳台海

外等不同领域的丰富文化内涵, 逐渐形成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精神向导。

第四,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烙刻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本土化印记, 又在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昭示重大世界意义和广泛国际影响。就民族性而言,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确立和巩固坚守本土立场、扎根中国大地的文化主体性, 运用文化自信自强的积极精神力量应对和解决影响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实际问题, 其底色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创造巨大民族性价值。就世界性而言,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基础上敞开拥抱世界文明的博大胸襟, 倡导各国合作共赢、文明交流互鉴, 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团结合作等重要价值取向作为文化养分, 在与人类文明整体图景的交融互动中发展和壮大, 具有胸怀天下的世界历史意蕴。

三、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意蕴

文化形态是经过漫长历史演化形成的价值结晶, 隐含观念世界的价值目标、道德准则、伦理规范等, 在确立价值原则、引领价值选择等方面发挥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差异,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虽在不同时期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 但就其作为共享的价值系统而言,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涵同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重叠共生。进一步地看, 其在整体架构上以团结凝聚人心共识的伟大团结精神为价值枢轴, 通过以团结促进创造的价值桥梁、以团结驱动奋斗的价值引擎、以团结实现梦想的价值纽带, 紧密契合团结铸就历史伟业的伟大创造精神、团结战胜艰难险阻的伟大奋斗精神、团结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精神。由此,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起”于伟大团结精神, “承”于伟大创造精神, “转”于伟大奋斗精神, “合”于伟大梦想精神, 于起承转合之际勾勒出逐层嵌套、融为一体的价值图景, 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精神感染力和时代感召力。

(一) “起”于伟大团结精神: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提供团结凝聚人心共识的精神引领

伟大团结精神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枢轴, 提供团结凝聚人心共识的精神引领。从“起”的角度看, “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 靠团结而兴”^[12],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历史性出场以团结为序章、以团结为主线, 伟大团结精神在实质上构成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硬核”。回望党的百余年来光辉历程, 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诞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危机时代, 没有团结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就无法承担起对外打倒帝国主义, 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早在 1925 年, 毛泽东就提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 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3] “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揭示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初始含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 毛泽东重申, “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9] 444}, 即必须积极发展拥护团结的进步势力、努力争取可能团结的中间势力、坚决孤立反对团结的顽固势力, 在逐渐解决团结的基础力量、目标对象等问题中赋予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更丰富的团结意蕴。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指出“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 团结全党,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

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4]。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要求“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15]。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团结意蕴与时偕行、应时而变。

可见，统一战线的团结内容服务于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与此伴生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所凝聚的伟大团结精神是历史的、具体的，其核心内涵是以团结凝聚人心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2] 608}经过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积淀，伟大团结精神逐渐成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枢轴，进而整合思想导向、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熔铸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筑牢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与党同心、与国同行的思想政治基础，坚定最大程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意志，标识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特质。

（二）“承”于伟大创造精神：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提供团结铸就历史伟业的精神滋养

伟大创造精神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桥梁，提供团结铸就历史伟业的精神滋养。从“承”的角度看，以团结促进创造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价值结构上由“起”至“承”的具体化、具象化展开。始于创造、孕于创造、成于创造，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基于历史独创性而展开的逻辑环节，与实践相榫接的伟大创造精神标明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旨归。回望党的百余年光辉历程，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增添富于创造的思维特质和文化禀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通过阶级联盟团结凝聚革命力量，“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16]，创造性地完成团结救国的历史性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团结凝聚建设力量，通过建章立制“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16] 10}，创造性地完成团结兴国的历史性任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统一战线通过拓展政治联盟团结凝聚改革力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创造性地完成团结富国的历史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团结凝聚奋进力量，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必将创造性地完成团结强国的历史性任务。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性任务，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的历史逻辑中深嵌伟大创造精神。

这充分说明，伟大创造精神作为团结与创造相互联结的价值桥梁，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宝贵精神财富。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反映在以团结促进创造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推动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展露出敢于革新、善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三）“转”于伟大奋斗精神：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提供团结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

伟大奋斗精神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引擎，提供团结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从“转”的角度看，以团结驱动奋斗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价值结构上由“起”与“承”向更深层次递进的题中应有之义，深蕴团结奋斗的伟大奋斗精神挺直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脊梁”。回望党的百余年光辉历程，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始终以团结的姿态坚定接力奋斗、顽强奋斗、共同奋斗。在接力奋斗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一切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联合战线的洞见，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告诫“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17]，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再到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连续性和阶段性相协调的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造就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基调一致、风格各殊的团结奋斗意涵。在顽强奋斗上，由于党在幼年时期对统一战线还没有清醒透彻的认识，曾经面临“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13] 157}的严峻考验，但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没有放弃团结奋斗，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13] 157}中迎难而上，逐渐掌握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磨难中日益壮大、在挫折中走向成熟，顽强奋斗构成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重要精神表征。在共同奋斗上，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不是仅靠单枪匹马解决问题，而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军，提出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策略方法，动员广大群众形成团结奋斗的广泛统一战线，在大团结共同体上标定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共同奋斗的新内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18]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伟大奋斗精神作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引擎，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艰难险阻、实现宏伟目标的精神动力，有效防止和克服精神“缺钙”的“软骨病”，彰显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激扬斗志、鼓舞士气的精神气概。

（四）“合”于伟大梦想精神：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提供团结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伟大梦想精神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纽带，提供团结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从“合”的角度看，以团结实现梦想的发展逻辑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价值结构上历经“起”“承”“转”的环节并最终落脚于目标设定和精神激励的归宿。面向美好未来、憧憬宏伟愿景的伟大梦想精神，标志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达到新的价值高度。回望党的百余年光辉历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在不懈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壮大和发展的，在战略定位上总体服从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不同任务、呈现不同内涵。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二大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9]的政治纲领，逐渐建立近代以来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高度的团结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赋予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团结追梦的基本内涵。新中国成立后，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方式团结民族资本家，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支持，

成功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保持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同时，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团结筑梦的意涵夯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努力探索爱国统一战线的新模式，将统一战线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强调“中国梦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要用来团结中国人民、团结中华民族”^[20]，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百川归海的中国力量，提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团结圆梦的中国精神。当前，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正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齐众心、汇众力、聚众智，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21]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尽管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具体目标不尽相同，但就其主题看，均归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22]。其中凝结的伟大梦想精神作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精神支撑，始终围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目标，以脚踏实地、志存高远的态度凝聚团结追梦、团结筑梦、团结圆梦的磅礴力量，昭示出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自信自强、砥砺前行精神底气。

总括起来，在价值内涵及其功能的指认上，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价值意蕴具体展开于伟大团结精神统领并串联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整体结构。这充分说明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具有特定意涵的实践创造物而不是远离现实、高悬书斋的抽象存在物，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凝练概括密切相关，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提供强基固本、涵养正气的精神资源。

四、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实践面向

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 140}。新时代新征程，站在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历史关口，必须从文化传承发展纵贯古今、横接中外的总体性视角出发，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矛盾论和价值论等宏阔理论视野，系统谋划统一战线文化形态面向实践的集成路径，推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9] 663-664}，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一）本体论面向：嵌入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政治实体

文化发展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邓小平指出：“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23] 无论是从理论根基生长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属性看，还是从实践根据来自于无产阶级政党结成政治联盟和推进强国建设的性质看，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确立与证成的过程，归附于刚性的政治逻辑并显露出独特的政治意涵，彰显统一战线在本体论向度上作为政治形态的原初样貌和存在实体。就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时代语境而言，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已经处在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相契合、相适应的发展轨道上，其在本体论之维的关切焦点集中于政治性意蕴的逻辑规定，必须有力地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一是深植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道路

之根。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发展演进与中国共产党关于道路探索的发展演进高度一致。推动统一战线有机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需要从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汲取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的智慧, 不断解答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立场、根本动力、政治保证等重大问题, 把更好巩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二是筑牢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理论之魂。统一战线从工具形态上升到文化形态, 在本质上涉及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文化主体性, 服务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推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必须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深刻挖掘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发展寓于“两个结合”必由之路中的历史经验, 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最终聚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文化优势。三是拓展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制度之道。统一战线通过充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一整套制度体系, 凝结向心合作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推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打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团结的价值主张及道义优势,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制度设计, 推动以同心圆方式展开、团结联合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的团结理念、团结智慧等独特价值标识更加鲜活鲜明。运用统一战线将“众星拱月”的制度优势转化为高效治理的良好局面, 塑造吸纳广泛多样性的政治共同体, 努力在促进国家团结和政治秩序优化的基础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探究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创新机制, 不断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底蕴。

(二) 认识论面向：践行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治理视界

认识具有指导实践、改变世界的巨大能动作用。在毛泽东看来, “一个正确的认识, 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由精神到物质, 即由实践到认识, 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 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24]从认识论维度的哲学界域出发, 统一战线的“治道”之义即“在依法治国框架下形成新政治规则、创建新政治文化的意义上越来越受到重视”^[25]。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作为特殊的观念形态, 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具有一致性, 共同体现统一战线的价值精髓, 将在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先导。一是遵循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创新理念。创新是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内生动力, 不断赋予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崭新内涵并更新其表达形式。推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创新理念作用于文化治理现代化, 必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深刻变革、社会阶层结构深刻变动等条件下进行长远谋划和顶层设计, 不断探索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度、载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创新, 最大限度地拓展统一战线促进文化治理内部各层次、各要素、各主体配置形成合理结构并发挥合力作用的途径与方法。二是遵循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协调理念。协调是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的首要前提,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展现协调同与异、分与合等关系的智慧之道。推动统一战线文化

形态的协调理念作用于文化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在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警惕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出现的鸿沟与藩篱，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文化治理现代化中的恰当结合点，加快形成不同文化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良性秩序，促使文化治理现代化保持平衡与稳定的状态。三是遵循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绿色理念。绿色发展本质上追求的是包容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推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绿色理念作用于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弘扬合作共赢等核心要义，审慎剖析多元文化、辩证审度外来文化、坚决抵制落后文化，采取以主导聚合多元、以本土融通外来、以先进规制落后的策略，坚持兴利革弊、激浊扬清，消解文化领域喧嚣刺耳的杂音噪音。四是遵循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开放理念。开放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必由之路，推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开放理念作用于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重点突破文化发展的空间壁垒，从开放遗址遗存等统一战线物质形态构筑的物理空间，到垒筑统一战线纪念仪式、艺术作品等塑造的人文空间，再到开发统一战线话语数字化表达、智能化传播、智慧化分发打造的虚拟空间，加快推动物理空间、人文空间以及网络虚拟空间等不同层次意义世界的互构与重组，营造从固态走向活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方位现代化文化空间。五是遵循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共享理念。推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共享理念作用于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促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协调发展，不断拓展人民精神生活的文化空间，消除处于相对弱势的主体在文化层面所感知的“被剥夺感”“被排斥感”，让文化权利诉求各异的主体充分共享更加充盈饱满、公平正义的精神世界。

（三）矛盾论面向：运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辩证精髓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作为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并不仅仅是统一战线领域文化意蕴的积累集聚，而已经关涉当代中国乃至当今世界发展整体样态的复杂问题。在矛盾论向度上，需要坚持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反映的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整体、发展的观点，从处理客观世界一与多、同与异、动与静等关系展开逻辑界说。一是运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辩证把握客观世界一与多关系。从文化多样性看，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是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优秀文化与腐朽文化、进步文化与落后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杂然纷呈的文化价值领域中处理一与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一方面，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历时性维度上表现为稳定连续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和群体共享的思维模式、行为规范，运用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趋向相对确定的方向和目标，有效提升对于统一战线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一”即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刻认识“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社会的分化和裂变导致的思想混乱”^[26]，必须在拥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认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 147}，掌握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理解“多”提供科学观察视窗和强大思想武器。另一方面，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共时性维度上表现为协调多样性乃至冲突性的规律性探寻和实践性解答，既要包容异质文化的产生，又要依凭独树一帜的价值辨识度，帮助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明晰自我确认和自我定位的标准。“多”即要求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品格，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妥善处理党内与党外、中央与地方、社会与个体、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国

内与国外等之间的关系,但“多”绝非毫无原则底线,必须划定底线、明确红线,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二是运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辩证把握客观世界同与异的关系。同与异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在的固有的基本矛盾,也是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基本矛盾。统一战线文化形态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又不完全同于上述文化形态的本相。因此,统一战线实践乃至新时代的一切实践,都不是简单延续大一统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母版,基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大一统文化生态和救亡图存的近代历史需求已经发生改变,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无产阶级联盟进行阶级斗争的模板,基于阶级对立的思维定势难以适应和平建设时期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共同体的治理需求,必须争取团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不是国外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翻版,基于自由主义思潮和资本逻辑的西方政党政治的联盟经验无法照搬照抄,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地在同与异之间打开新视角、扩展新目标。三是运用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辩证把握客观世界动与静的关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并塑造矛盾的复杂性和变更性。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是动与静的同频共振,既有“不变”的静态性和稳态性,又有顺势产生变化、发生更迭的动态性和非稳态性;既要有全局视域中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紧迫感、危机感和机遇感,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认识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发展环境快速变化、发展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牢固把握变化过程中深化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的一般属性和个性特征,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

(四) 价值论面向:明确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根本目标

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明确历史的真正主体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在价值论向度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27]。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扎根人民、团结人民、凝聚人民,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建基于人民、服务于实践,是人民群众伟大精神风貌的凝聚和升华。面向实践的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必须清晰认识到——“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28],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守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根本立场。一是观照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发展性。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始终处于生产与再生产循环往复、持续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一方面,发展文化事业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必须坚持文化发展为人民的工作导向,不断完善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现所有统一战线相关历史遗迹、纪念场馆的免费开放。另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必须持续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激活各类文化产业样态,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大胆创新、精心设计有关统一战线的文具、挂件、配饰、盲盒等文创产品,创作生产更多以统一战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为主要内容载体的文艺力作,使文化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观照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超越性。统一战线不仅立足于物质生产及其利益分配的现实场域,协调满足不同个体的基本物质需求。其文化形态更是旨在探索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显现出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原则和价值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18] 309-310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作为一般文化的特殊表现，能够在上述领域发挥文化力量转化为发展能量的杠杆撬动作用，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谋发展、促发展，始终保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得以最大化实现。三是观照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统摄性。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能够在共同体之中辨识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边界并有效勾连两者之间的关系，汇聚起人类社会倡导合作、协商、包容等共通性价值，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必须运用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等人类普遍追求引导社会个体自觉认同和主动遵守共同体的相关价值规范，注重把国家内部的团结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团结发展统一起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协同互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对于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认可度，以部分团结为整体团结提供契机，以外部团结为内部团结开辟出路。

五、结语：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文明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 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深度诠释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历史逻辑和时代价值，应当致力于走向文明史的深处。据此而论，整体关切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深层结构，离不开来自文明史视角更富于开拓性、更事关人类性的考察。在中华文明史上，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发轫于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标志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有力证明。“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9] 从中华文明层累积淀的发展史看，“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30]。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坚持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机保存大一统的精神内核和永恒价值并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型，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延续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凸显中华文明在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应对世界之变、回应时代之问的观念前提。“只要中国处于政党政治时代，只要中国共产党要保持整个国家的多元一体，就内在地需要统一战线”^[31]，就内在地需要统一战线文化形态，这是在中华文明史意义上溯源而知的结论。

在人类文明史上，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凝缩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价值共通之处，标志着人类社会由价值对立走向秩序整合、由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景，这是人类文明具有内在协调性的重要基础。历史上文明重心的转移通常是价值对抗、文化角力、思想分化的结果。“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功用，是让不同群体的人们相信己方的至上和正确，并竭力在气势上精神上乃至肉体上压倒对方，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文化的使命，则是使人们知道人类已经

俞佳奇, 秦宣.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38-52.

创造了哪些经验、知识和价值, 并且努力去保留它们、光大它们, 并努力使自己与其相配。”^[32] 现时代的文化使命强烈呼唤更富统合力、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的文化形态, 寄望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人类社会基于整体发展利益展开对话交流、化解矛盾冲突提供价值基质。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史看,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以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主要内容, 以“追求人类最大限度的共同目标和利益为最高宗旨”^[33] 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主要平台, 有效破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模式, 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宰制和渗透非西方国家的软性暴力行为, 闪烁着人类文明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的智识火花, 将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历史位阶, 这是在人类文明史意义上远眺而观的结论。

总之, 面向文明史的世界历史前景中,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在赓续中华文明、重构人类文明的协同共进中具有现实性、可行性, 以团结纾发展之困、以团结汇协作之力、以团结聚创新之势、以团结拓和平之路、以团结谋天下之福, 将深刻影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整体格局和人类进步的发展方向, 具有助力走出当前世界变局、塑造未来世界文明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0-35.
-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3]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4] 余源培. 论新时期的文化统一战线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2): 13-21.
- [5] 陈喜庆. 对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几点认识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1): 5-7.
- [6] 贺善侃. 论统战文化力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3): 60-63.
- [7] 杜青林. 大力加强统战文化建设 [J]. 求是, 2012 (7): 7-9.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69.
- [9]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10]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51.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145.
-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09.
- [13]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 [14]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14.
- [15]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669.
- [1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8.
- [17] 毛泽东文集: 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75.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4.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33.

- [20]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33.
- [21]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22 年 12 月 30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2-31 (2).
- [22] 林华山.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图景——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1): 19-26.
- [23]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2.
- [24]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21.
- [25] 陈明明.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 策略、战略与治道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6): 5-14.
- [26] 秦宣. 分化与整合——谈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J]. 教学与研究, 2012 (2) 5-11.
- [27]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12.
-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95.
- [2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09.
- [30]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 基础与发展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 24.
- [31] 肖存良. 大一统: 中国统一战线的文化基础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5): 35-43.
- [32] 王逸舟.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 (增订本)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97.
- [33] 莫岳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12): 45-53.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何旗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植根中国土壤、体现中国智慧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多党合作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并形成了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包含丰富的思想内涵,以“植根本土论”“党的领导论”“制度优劣论”为精髓要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问题。植根本土论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源的精到阐述,标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诞生的历史坐标系、文化营养剂、时代路向标。党的领导论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特征的深刻揭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是何种领导、领导什么、谁来领导、怎样领导等重大问题。制度优劣论从纵向历史、横向国别比较的视野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既饱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定自信,对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美好前景的展望,也为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键词: 政党政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多党合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6-0053-14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6.005

作者简介: 何旗,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革故鼎新: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研究”(22FDJB009)

引用格式: 何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53-66.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支柱力量，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乃至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植根中国土壤、体现中国智慧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和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值此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 5 周年、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宪法 30 周年之际，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对深刻把握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方针、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和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近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创造性、优越性及其时代价值被纳入学术视野，由此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囿于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性研究，鲜有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专题研究。鉴于此，本文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制定颁布的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文件，系统梳理和多维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以期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一种新视野。

一、植根本土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源头活水

长期以来，由于政党及政党制度均起源于西方，人们一度普遍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也必然是移植或模仿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然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等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1]同理，任何一国政党制度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形式，都是本国历史文化长期沉淀和孕育的产物。那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哪里来？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刻理解和把握，2018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2019 年 9 月 20 日，他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 265} 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以“中国土壤”一词来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其来有自。土壤是事物立足、发育、繁茂的根基，而一种政治制度的生长，也总是与社会土壤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植根中国土壤”这一论断贯通古今，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源的精到阐述，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社

何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53-66.

会条件及发展规律。

（一）对“植根中国土壤”的精准定位，标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诞生的历史坐标系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反映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不能隔断历史”^[3]。从历史视角看，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效仿欧美国家议会政党制度，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从1912年到1928年间十易国家元首，组阁45届，总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者不超过一年，最短者不到一天，总统、内阁、国会、宪法变换频繁，政治乌烟瘴气，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不止。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这个历史教训时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4]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一党训政的破产以及民主党派中一部分人走中间道路幻想的破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对旧式政党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进行历史性反思，寻找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党制度。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的662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国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适应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相关重要文件，并将这项制度载入宪法，使其长期存在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概括出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准则”。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总结近70年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作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和理论概括；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基本职能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发逻辑充分表明，这一制度不是凭空飞来的，既不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遗产的继承，也不是从其他国家移植过来的“盆栽”，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无数仁人志士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惨痛教训后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从中国自己的社会土壤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内生性政党制度。

（二）对“植根中国土壤”的精准定位，标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的文化营养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契合。从文化视野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扎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沃土，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政党制度与传统文化的耦合逻辑出发，精辟论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传统文化养料。他指出：“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2] 229-230} 中华文明灿烂悠久、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

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比如，古人在宇宙秩序上讲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社会关系上强调“忠恕仁和”“合群睦众”；在艺术审美上突出“五色调和”“八音克谐”；在为人处世上讲究“执其两端”“和而不同”“中庸之为德也”；在治国理政上总结出了“谋及庶人”“询于刍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等重要经验。在五千多年的文化浸染、熏陶中，先贤倡导的这些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早已作为文化基因熔铸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因此，从古及今中国人就把万物万事中不同方面的共存、共荣视为当然，对待不同的事物要求秉持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态度，遇到问题或冲突时主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提倡通过协商讨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适中的办法。近代以降，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充分吸收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合理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 282}，“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3] 286}。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孜孜追求中，衍生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通力合作、团结和谐”“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等政治智慧，从而结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果实。这一果实正是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浇灌而成，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新型政党制度在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民众等多重关系上呈现的特点与优势，都能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寻得文化传承的基因与密码。”^[5]

（三）对“植根中国土壤”的精准定位，标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长的时代路向标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境遇和文化沉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取决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3] 286}因而，他认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时必须注重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3] 285-286}。针对西方所谓“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3] 286}，另一种是“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3] 286}。在他看来，政党制度不能生搬硬套，离开了本国土壤的支撑滋养，任何设计都是镜花水月。只有扎根所生存的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政党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政党制度离开了适宜的土壤，难免“橘生淮北则为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就是因为它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养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反观一些国家在政党制度选择上，不顾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盲目模仿别国模式，轻者造成无效治理，重者导致国家动荡。比如，这些年世界上一些国家盲目“移植”或“被输入”西方政党制度模式，从发生“颜色革命”的一些原苏联国家，到爆发“阿拉伯之春”的一些西亚北非国家，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造成“民主之殇”。现实昭告我们，历史不同、文化相异，必然政道分殊、政制有别，“飞来的”政党制度必然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葬送国家的前途命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6]鉴于此，他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1] 262}。

何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53-66.

橘生淮南淮北虽叶徒相似, 然味不同, 根源就在于“水土异也”。知所从来, 思所将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 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 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如果亦步亦趋模仿别人、不能坚持自我, 丢掉了自己的传统和本色, 最终只能沦为邯郸学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 决不能自失主张、自乱阵脚”^[7], 坚定制度自信, 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二、党的领导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

领导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关系, 是在人类共同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社会中, 有社会共同体就有领导关系, 有集体协同行动就有领导行为。政党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政治支柱, 需要协调好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从政党关系来看, 在西方多党竞争中, 各政党作为独立政党开展竞争, 不承认政党之间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也没有一个西方政党公开声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 只有当一个政党在竞选中获胜并成为执政党时, 其他政党才承认其为国家的领导者。在我国的多党合作中, 多党存在就意味着多个政治主体的汇聚和并立, 如果没有集中有力的领导, 进行有效的多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一个乐队要进行大合唱, 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 “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 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8]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确立新型政党制度时, 便旗帜鲜明地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 这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根本标志。进入新时代,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 面对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的新变化,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 面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 我国要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行稳致远, 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 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多次阐述和强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党的领导论”, 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 90},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6] 34},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 强化政治引领, 完善制度机制, 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9]; 而且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是何种领导、领导什么、谁来领导、怎样领导等重大问题, 极大深化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特征的规律性认识。

(一) 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性质, 即“何种领导”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明确各民主党派是享有组织独立和法律平等地位的参政党, 形成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对多党合作的领导, 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 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10]。那么,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性质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了明确答案, 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 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

导”^{[3] 303}。这实际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性质，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组织或行政上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12}他强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方向”^{[2] 11}，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只有落实好这一实践要求，多党合作才能行稳致远。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党外人士的管理，也不意味着事无巨细地包揽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两种现象：一种是“不重视思想引导，对党外人士思想活动不关注”^[11]，如有的同志对无底线的言论开绿灯，以为这就是发扬民主、政治开明；另一种是“把民主党派组织当成下属单位，对民主党派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包办代替”^[11]。这两种现象都会影响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重点了解掌握其政治表现、思想状况、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和个人重要事项变化情况，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态度。”^[1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强调“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职能、积极发挥作用”^[13]，从而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把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与支持民主党派独立履职结合起来，既申明了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明确了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多个政治主体的科学意蕴，使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内涵更加清晰明确。

（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内容，即“领导什么”的问题

“任何领导权，都具有相应的领导内容，不及或超过都会产生严重后果。”^[14]科学确定领导内容是实行有效领导的重要条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全面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15]为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党的领导掷地有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审议制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重大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政党协商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统一领导、统筹安排，切实纳入决策程序，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16]。《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专设“组织领导和职责”一章，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协商工作的主要内容。该《条例》第六条规定：“党中央对政治协商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制定政治协商工作大政方针，研究决定事关政治协商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保证政治协商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党中央组织开展中央层面的政党协商，领导和支持全国政协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做好政治协商工作。”^[17]这些具体规定细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工作的领导，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落到了实处。

（三）阐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主体，即“谁来领导”的问题

领导权的实施，还必须有相应的领导主体。针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谁来领导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3] 303}。这一论述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施领导的主体是中共党委而不是党委部门。

何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53-66.

特别是中共党委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而是受中共党委委托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和开展民主党派工作的职能部门。对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制定《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时, 在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负主体责任的同时, 都明确了党委统战部、党委有关部门、政府有关部门等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联络员”“协调员”“组织员”“保障员”等职责, 如“联系民主党派”“牵头协调无党派人士工作”“受党委委托, 组织开展政党协商”“为本单位本部门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政协委员参加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件, 提供必要保障”等。另一方面, 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施领导的主体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在现代领导活动中, 任何领域的领导主体都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集体。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周恩来就曾指出: “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 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 不是个人领导。”^[18]当然, 党是由每个党员个体组成的, 党的工作也要由党员个人来做, 因而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通过党员个人体现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突出强调在党的领导活动中坚决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领导、实际上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坚决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 做到“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 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 该集体研究就不擅自表态……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19]。

（四）阐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方法, 即“怎样领导”的问题

领导方法是领导者为达到预期目标和达至确定方向而对被领导者采取的手段、方式和途径的总和。“事必有法, 然后可成。”方法是措施和手段, 是打开问题之门的钥匙。方法得当, 才能打通预期目标向实际结果转化的通道。在长期的多党合作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独特领导方式。进入新时代以来, 各民主党派的队伍构成、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性质和职能定位都发生了新变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加强对多党合作的领导, 也要讲求工作方法和技巧。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时代特点和规律, 对民主协商、照顾利益、联谊交友、教育引导、率先垂范等以往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进行了新的提炼和新的实践, 使之更富有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有力提升了新时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际效果。在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 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3] 303}他强调指出, 搞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 要善于多交挚友诤友, “想交到这样的朋友, 不能做快餐, 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3] 305}。他要求全党: “对党外人士, 要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 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 不随意伤害对方自尊心, 不以势压人。同党外人士交朋友当然会有私谊, 但私谊要服从公谊。要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 不能把党外人士当成个人资源, 而要出于公心为党交一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3] 305}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提高合作共事能力……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 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 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2] 95}。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民主协商的基本要求: “‘发扬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优良传统, 广开言路, 集思广益, 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 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 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 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 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2] 268}在教育引

导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学理论、学政策、学历史为切入点，提出“要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统一战线历史、人民政协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全局观”^{[2] 269}。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引下，2013 年以来各民主党派相继组织开展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以及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在率先垂范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带头”，即“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12]。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至 2022 年 7 月底，党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 185 次，其中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 42 次，就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20]，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三、制度优劣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在一段时期内，当人们谈论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时，“言必称西方”成为一种习惯；美国更是自诩其政党制度的所谓“先进性、民主性”，鼓吹两党竞争是通向有效的民主政府最简便最可行的道路。他们带着偏见和傲慢，长期对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歪曲和抹黑，致使一些人产生误解。而我们也总有一些人一度喜欢拿着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评判中国的政党制度，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自家的肉不香，人家的菜有味”。针对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质疑、抹黑和误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讲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6] 74}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从实效性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五个有效克服”的优势：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11] 76}。以此论述为基础，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时进一步以“三个有效避免”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即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 229}。习近平总书记的“五个有效克服”“三个有效避免”重要论断，不仅集中阐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供了比较政党制度优劣的对象和标准。制度总是在比较中定新旧，在实效中分优劣。从纵向历史、横向国别比较的视野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西方国家议会政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一）利益代表之“优”

政党是民众利益的代表者，民众的利益能否充分地表达并得到实现，既是实现“多数人统治”

何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53-66.

这一民主政治的实质所在,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制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很重要一条就是“人民群众能否顺畅表达利益要求”^{[2] 82}。从历史与现实看,无论是中国近代史上旧式的议会政党制度、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抑或是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在民意表达上都是相当有限的,都仅仅只是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表。民国初期的政党多为封建军阀、士绅们应对国会选举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松散集团,其所实行的议会制政党制度代表的无非是封建军阀和部分士绅阶层的利益,普通民众不过为“群众演员”。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只有一个合法政党即共产党存在,强调“党控制一切、党即政府”,高度垄断了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曾经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逐渐蜕变成由少数官僚组成的权贵集团。苏共失去政权后,人民群众针对“苏共究竟代表谁”这一调查给出的回答——“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干部自身利益的占85%”——便是对这种一党制下民意丧失的准确注脚。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中,为了赢得选举,各政党便极力宣称要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然而实质上他们代表的仍是极少数人尤其是大财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其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早已异化为“金钱选举”。对此,美国学者 G. 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一书中通过列举大量数据和案例揭露了公司富豪左右美国选举和支配政府决策的事实。在“金钱政治”主导下,哪一个公司财阀、利益集团的声音大、影响政党决策能力强,政党和政客就会极力满足其要求。而尽管有利益诉求,普遍民众尤其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除了在选举时能够得到政党的注意外,其余时刻很难引起政党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深刻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2] 98}

相比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利益代表性、包容性和统筹性,能够最广泛、最真实、最充分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利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就要求执政者在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际,也要统筹兼顾好不同方面的具体利益。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又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而在利益代表和利益实现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广泛参与、包容体谅为原则,承认差异、正视差别,具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调各方关系的优势。在这一政党制度架构下,各利益主体通过有效的政治合作与充分的民主协商对待处理来自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既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又照顾各党派的具体利益。各党派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会议、调研、视察、调研报告、大会发言、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途径,不仅使自身的利益诉求都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得到充分表达,并且使国家资源分配中各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够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得到充分照顾,构筑出了代表和实现不同方面最广泛利益的最大同心圆,“因而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7] 123}。

(二) 结构功能之“优”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政党制度的结构类型与其角色功能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结构类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角色功能。当今西方社会普遍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的政党制度,不同的政党为了竞争执政地位,必然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恶性竞争,不同程度地陷入

了各种形式的纷争和内斗之中，经常出现彼此攻讦、相互拆台现象。这种政党之间的恶性内斗在美国两党制中尤甚。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内斗不仅体现在竞选过程中，更是体现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为了将对手赶下台，不惜开展旷日持久的“斗法”，揭丑、抹黑甚至暴力与恐吓等各种卑鄙手段层出不穷。近几年来从希拉里的“邮件门”“健康门”到特朗普的“通俄门”“避税门”再到“国会山骚乱”，美国两党恶斗愈演愈烈。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虽然避免了西方国家两党或多党轮流坐庄的激烈恶斗，但也因为缺乏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而产生了各种与现代政治文明相背离的现象，如权力过度集中、党的领导人独断专行、政治腐败、特权现象泛滥、民众权利被限制和侵犯等。

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旧式政党制度类型，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之间不是竞争倾轧、相互拆台、相互掣肘，而是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合作。就监督来说，主要是各民主党派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民主监督的内容包括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以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为政清廉等情况。民主监督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民主监督的目的是“促进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13] 17}。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座谈时，用两句古语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民主监督氛围，即执政党“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参政党“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并指出“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21]。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并通过有效的制度机制保障民主党派的监督权利，与各民主党派成为知无不言的挚友、过失相规的诤友。例如，2000至200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教育、监察、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先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等担任特约监察员431次，就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廉政建设等进行监督^[22]。受中共中央委托，2016年至2021年8个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份开展为期5年的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这种民主监督强化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监督功能，推动执政党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促进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就合作来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合作共事，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携手并肩。例如，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才荟萃优势，支持党外代表人士发挥作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共有15.2万余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44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2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64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2585人^{[13] 16-17}。他们积极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参与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参与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视察和执法检查等国家事务，共同推动国家政权建设。再如，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各民主党派积极行动、建言献策，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应对“非典”、汶川特大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6月，共有6万余名民主党派、无党派医务工作者投身抗疫一线，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报送意见建议近4000件，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无党派人士捐款捐物合计人民币51.08亿元”^[20]，充分体现了中国特

何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53-66.

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这与美西方国家的政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相互甩锅、推诿扯皮形成鲜明对比。

（三）治理效能之“优”

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不同的政党制度具有不同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6] 10}，“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起到决定性作用”^{[3] 288}。这一论述告诉我们，看一个政治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是否有利于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一种政党制度是否有优越性，最终要从这种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实际效果来判定。考察各类旧式政党制度的治理特点可以看到，在实行一党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治理是执政党一党治国理政，执政党不仅是国家的领导者，而且是政府和社会的直接管理者、控制者和干预者，由于缺乏合作、竞争和监督，独断专行、无所顾忌、高压手段等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治理的基本特点，很难避免决策和实践失误，难以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而在实行多元竞争政党制度的西方国家，虽然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可以起到互相监督、权力制衡作用，但同时造成了互相掣肘的国会分裂、府院对立状况，重要的社会改革推动迟缓，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治理绩效无从谈起。这在美国尤为突出。近年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利用各自在参众两院占多数的优势相互否决，致使两党制下的联邦政府出现决策低效甚至无效的现象，涉及医改等诸多国家治理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受党争影响，联邦和一些州政府罔顾民意大幅放松枪支管制，导致枪支暴力致死人数屡创新高，种族歧视恶化，暴力冲突不断。可以说，两党制下的美国“近年来进一步陷入制度失灵、治理缺位、族群撕裂、社会动荡的泥潭”^[23]。同样实行政党轮流坐庄的英国，执政党与反对党围绕“脱欧”议题展开了错综复杂的争斗，呈现出政党博弈白热化、政治格局碎片化、政治运行无序化的演变趋势，其间伴随而来的还有金融危机、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脱欧”后的英国面临政治认同、经济衰退、社会失序等国家治理方面的诸多挑战^[2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各政党相互争斗，不仅很难干成什么事，而且造成社会政治动荡不已”^{[1] 352}。

与上述政党制度的低能治理状况截然相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共同为中华民族发展谋划、协商、努力。在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商量民主”这一民主新形式避免政党之间的无谓内耗，遇事多商量、好商量、会商量，避免了否决政治造成的国家治理低能，奠定了国家团结稳定的坚实基础，凝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合力，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合作共治格局。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历次抗震救灾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的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同心协力稳定局势，做了大量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想一下，如果民主党派等统一战线成员不是同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是同我们党唱不一样的调，甚至跑到我们党的对立面去了，那我国政治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不会有政局稳定。没有政局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1] 352-353}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围绕三峡工程、农村税费改革、大力营造民营经济良

好发展环境、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促进就业创业、创建农村社保体系、生态环境保护、京津冀协同发展、脱贫攻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一大批重要建议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有效彰显了多党合作在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7] 124} 这一论断是对包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效能的最有说服力的诠释。

四、结语

20 世纪 80 年代末，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意指“除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已没有其他制度可挑选”。无独有偶，1989 年美国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提出“历史终结论”，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已成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福山的言下之意是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将一统天下，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终将改弦更张，很快寿终正寝”。然而，30 多年过去了，中国给出了有力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但没有终结，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包括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富含中国底蕴的新型政党制度，并在一次又一次风浪考验中彰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深刻改变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正如学者们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势书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民主优势，积极回应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价值，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真理力量，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26]，用事实“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6] 7}。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过去热衷于“西天取经”转而寻找“东方宝典”，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呈现出“由西向东看”的新趋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对比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7] 坦桑尼亚革命党前总书记基纳纳表示：“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个重大创新，为深陷西方选举式民主制度陷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28]

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这既为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广阔舞台，也对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需要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时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坚持和完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纳入党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行稳致远、发

何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53-66.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 既饱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定自信, 对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美好前景的展望, 也为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指明了前进方向。40 多年前, 邓小平在展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前景时满怀信心地指出: “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29]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 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2]¹⁷⁹ 寄望将来, 我们更有理由坚信, 随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攀升,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增强,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底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必将在世界政治文明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其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贡献也必定会在更为广阔的视阈下得到充分彰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79.
- [2]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29.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85.
- [4] 孙中山. 三民主义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121.
- [5] 王新影, 温林森. 新型政党制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成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40-52.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9.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2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384.
- [9]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10]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汪洋王沪宁丁薛祥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1-17 (1).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60.
- [12]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 (1).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5.
- [14] 陈喜庆. 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领导的几个问题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5): 5-18.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272.
- [16]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EB/OL]. (2015-12-10) [2023-11-07]. https://www.gov.cn/xinwen/2015-12/10/content_5022453.htm.
- [17]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2-06-21 (1).
- [18]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420.
- [1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43.

- [20] 杨昊.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取得新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彰显独特优势 [N]. 人民日报, 2022-08-17 (2).
- [21]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新春的祝福 俞正声张高丽出席 [N]. 光明日报, 2017-01-23 (1).
- [22] 中共中央统战部. 伟大的政治创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203.
- [2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22 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EB/OL]. (2023-03-28) [2023-11-07].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8/content_5748720.htm.
- [24] 周淑珍.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 (2021—2022)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 6-7.
- [25] 虞崇胜.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秉赋: 超越制度优势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J]. 探索, 2020 (5): 56-70.
- [26] 臧秀玲, 康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性、优越性及其时代意蕴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2 (2): 68-77.
- [27] 章念生, 吴乐珺, 胡泽曦, 等.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 [N]. 人民日报, 2018-03-07 (3).
- [28]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N]. 光明日报, 2018-10-19 (16).
- [29]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37.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从“谋一域”到“谋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在地方的孕育和实践

卢建华 颜晓峰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领导和从事地方侨务工作的实践中孕育和不断发展的，经历了从“谋一域”到“谋全局”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都能从其在地方领导和从事侨务工作的思考和实践探索中找到源头。该重要论述明确并高度肯定了海外侨胞的地位作用，这主要源于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对华侨华人历史传统和所作贡献的深刻认识。该重要论述明确了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这主要源于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对华侨华人企盼祖国强大和希望能为民族复兴伟业奉献力量的深切感悟。该重要论述明确了“根”“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这主要源于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对民族文化凝心聚力作用的深刻理解和对华侨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深刻认识。该重要论述明确了“三有利”的新时代侨务工作原则，这主要源于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所提出的“三有利”侨务工作思路。该重要论述明确了“大侨务”的新时代侨务工作格局，这主要源于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所确立并着力倡导的“大侨务”观念。该重要论述明确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侨务工作重点，这主要源于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对华侨华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高度肯定，对华侨华人融入并回馈住在国的积极倡导和对华侨华人为世界和平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6.006

作者简介：卢建华，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颜晓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国侨联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探索研究”（22CZQK209）

引用格式：卢建华，颜晓峰. 从“谋一域”到“谋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在地方的孕育和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67-80.

发展作贡献的殷切期待。该重要论述明确了“贴心人”“实干家”的侨务干部队伍建设要求，这主要源于习近平在领导和从事地方侨务工作时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要求。

关键词：习近平；侨务工作；海外侨胞；华侨华人；“根”“魂”“梦”；福建；浙江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6-0067-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对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深刻论述和重要指示，形成了以“七个明确”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这一统战思想原则，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四海一家”和“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思想精华，继承了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断发展着的实际所形成的侨务工作理论，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和侨情的准确把握和在地方工作时的侨务工作实践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侨务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新时代我国侨务工作和海外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当前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容体系和原创性贡献研究。有学者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内容丰富、体系严密，涉及华侨华人资源的战略作用、侨务工作宗旨、侨务公共外交、侨务工作理论与方法等多个方面，并将其概括为“爱国贡献论”“侨务资源论”“‘根魂梦’论”“统一动力论”“友好桥梁论”“维护侨益论”等^[2-5]。二是理论和实践来源研究。相关研究指出，该重要论述的理论和实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战工作的思想和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侨务工作探索实践的总结经验总结，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地方领导和从事侨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关于华侨华人历史传统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6-7]。三是地位和作用研究。相关学者认为该重要论述既能为改革开放服务、促进国家统一、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又能助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8-10]。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的侨务论述和实践探索研究。部分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率先提出的“大侨务”理念和“三有利”原则、在浙江提出的“以人为本、为侨服务”宗旨及他在地方的侨务实践探索进行了梳理和研究^[11-14]。

既有文献多围绕该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体系结构、核心内容、理论特征和地位作用进行宏观研究，而专门对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的涉侨文献和涉侨工作的研究不多、不够深入，对习近平在地方领导和从事侨务工作的探索实践与后来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关系研究更少。习近平总书记曾长期在福建、浙江、上海等新老侨乡工作，有领导侨务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在地方工作时关于侨务工作进行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重大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全面回顾、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理念、系列文献、重大实践，对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更好地理解把握、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好新时代的侨务工作和海外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多次撰文称赞海外侨胞的重要贡献” 到“明确并高度肯定海外侨胞的地位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并高度肯定了海外侨胞的地位作用。这根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华侨华人历史和传统的深刻理解, 体现了他在地方工作时对华侨华人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作贡献的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长期以来, 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 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不忘祖国, 不忘祖籍, 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 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并重视海外侨胞的地位和作用, 在对外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总是抽出时间看望慰问当地的华侨华人, 称赞他们为祖国发展和统一作出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知侨”“懂侨”“亲侨”“爱侨”的工作作风与他长期的侨乡工作经历密切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第二大侨乡福建工作长达 17 年半, 对海外侨胞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传承与坚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历史贡献等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1991 年, 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 出席了黄乃裳开垦“新福州”9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他在讲话中指出, “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积极为祖国贡献聪明才智, 或捐资捐物, 兴办公益事业; 或投资合作, 促进经济繁荣; 或穿针引线, 致力于中外合作; 或推动海峡两岸的接触和交往, 起了积极作用”^[16], 高度评价称赞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所作的贡献。1999 年, 习近平在为《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一书所作的序中赞许广大海外侨胞“始终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经贸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中最积极、最热情的一部分……为我国经济以及公益事业的发展,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7]。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 经常不辞劳苦、亲自出马, 带领有关部门和县区领导赴东南亚考察, 广泛接触侨胞、台胞和外商, 欢迎他们到福州投资建设。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冠捷集团、三菱汽车等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在福州落户, 为福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大大改变了福州经济落后的状况^[18]。2000 年,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我们的海外华侨爱国爱乡, 凝聚力很强, 寻根意识浓厚, 不忘造福家乡, 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福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成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9] 2002 年, 习近平在为《浓浓赤子情》一书所作的序中再次指出, “海外侨胞历来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优势, 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和资源”, 并称赞“他们捐赠社会公益事业, 回馈社会; 他们引资引智, 造福桑梓; 他们促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 为着祖国的繁荣富强, 不遗余力”^[20]。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崛起的新侨乡, 浙江的海外侨胞分布在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2 年, 习近平调任浙江后, 更加重视侨务工作, 强调广大海外侨胞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6 年, 习近平率团访美时参加纽约华人华侨社团举行的欢迎晚会。他表示: “长期以来, 勤劳聪明的旅美浙江乡亲,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吃苦耐劳、顽强拼搏、敢为人先、团结互助, 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 事业有成, 卓有建树, 在维护华人华侨的正当权益、传播中华文化、反对‘台独’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促进居住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开展与家乡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 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作出了积极贡献, 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誉。”^[21]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老侨乡多年的工作经历，使得他能够耳闻目睹海外侨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使得他能够亲身感受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和家乡的血肉联系。在深入了解海外侨胞生存发展的历史现状、深刻认识海外侨胞衷心希望祖国强盛和民族兴旺的基础上，习近平对如何把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情结、实现自身事业更大发展的愿望和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三者有机结合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就新时代侨务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并高度肯定了海外侨胞的地位作用，强调要积极引导海外侨胞致力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称赞并重视海外侨胞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还是在进入新时代后希望海外侨胞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海外侨胞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

二、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海外侨胞强大的精神支柱” 到“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这主要源于他在地方工作时对华侨华人企盼祖国强大和希望能为民族复兴伟业奉献力量的深切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15] 64}近代以来，海外侨胞在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备尝国家贫弱、民族落后所带来的艰辛与屈辱。惨痛的经历让他们深感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自那时起，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侨务工作，结交了很多华侨朋友，对广大海外侨胞希望祖国繁荣富强、民族兴旺发达的爱国情结可谓知之甚深、铭感于心。

2002年，习近平在为《浓浓赤子情》一书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尽管海外侨胞“本人或上几代人在境外居住，但寻根谒祖、乡土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心灵中蕴蓄很深很深，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海外侨胞强大的精神支柱”^[20]。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位福建安溪的老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的感人故事：这位老人回乡出资数千万兴办教育，而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仍然用着几十年前的电风扇。习近平指出，海外侨胞捐物捐资的善举，有传统积德行善的心理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受尽屈辱，殷切希望中国早日强盛，发自内心的‘教育为本，科技为先，实业兴邦’的爱国情怀”所激发的。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时指出：“华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爱国爱乡。他们在异乡历尽艰辛、艰苦创业，顽强地生存下来，站稳脚

卢建华, 颜晓峰. 从“谋一域”到“谋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在地方的孕育和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67-80.

跟后, 依然牵挂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有一块钱寄一块钱, 有十块钱寄十块钱。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心。”^[22]

1999年至2001年,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连续3年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在任期间, 他不愿挂空名, 尽职尽责、注重调研, 先后7次到集美大学。习近平对陈嘉庚先生和嘉庚精神有很深的情怀, 曾在一次访谈中深情指出, “陈嘉庚先生是倾其所有来办学, 不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而且影响了所有的海外赤子, 我们福建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华侨、华人、海外乡亲捐资助学蔚成风气, 都是受‘嘉庚精神’的影响”^[23]。集美大学是根据陈嘉庚先生的遗愿组建的, 特色之一是华侨办学和海外乡贤办学。因此, 每次参加校董会, 习近平总是主动与参会的海外校董沟通交流, 以联络情感、加深友谊。2014年10月17日, 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也是陈嘉庚先生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 深怀爱国之情, 坚守报国之志, 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 共圆民族复兴之梦。”^[24]

在地方工作期间, 习近平经常带队出国考察, 广泛接触海外侨胞, 做好内引外联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激发了海外侨胞回乡投资兴业的积极性, 极大促进了所在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0年,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近观20年改革开放, 福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能跃居全国前列, 实际利用外资能始终排名全国第三、四位, 公益事业保持十分强劲发展势头, 是与我省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对我省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作出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19]正是基于这种深刻认识, 2017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要以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 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5]。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要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26]。这标志着新时代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侨务工作主题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发展。

三、从“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 总有丢不掉的‘中国情’、忘不了的‘中国缘’” 到“明确‘根’‘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根”“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这主要源于他在地方工作时对民族文化凝心聚力作用的深刻理解和对外侨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 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 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 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 明确了联系凝聚广大海外侨胞, 尤其是新生代侨胞的情感之纽带、精神之依托、动力之源泉, 是新时代开展侨务工作必

须牢牢把握的主线。

1999 年，习近平在为《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一书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处于什么时代，全世界华侨华人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始终与祖国同步发展，始终是祖国革命、建设的重要力量。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但广大华侨华人无论身处何地，总丢不掉深深的中国情，忘不了生养自己的那片热土，即使几代人在海外，还是忘却不了他们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缘。”^[17]海外侨胞长期在海外生活和工作，如何加强这份“中国情”、增进这种“中国缘”？如何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就已开始关注。他认为，“爱国并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种感情……是几千年来中华优秀文化的积淀滋哺着全世界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结。”^{[20] 1-2}这种爱国之情植根于侨胞对祖国山河和历史文化地了解、熟知和由衷热爱。所以，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不但时常主动出国联络海外华侨华人代表，还总是想方设法请广大海外侨胞回祖国看看家乡的发展变化。1992 年，在马来西亚诗巫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下一次大会的举办地。当时，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想争取这个机会，但本身规模和实力有限。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得知此事后，果断指示我方参会人员“把大会接回来，就由香港主办，福州来承办，请大家到福州来”。事成后，他亲自担任大会顾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大会的筹备工作，主编《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一书并为该书作序。1994 年 10 月 29 日，规模空前的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在福州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福州乡亲、各社团负责人、代表共 3 000 多人参加大会。大会期间，习近平专门安排时间会见参会的各个代表团，并到代表们下榻的宾馆、酒店逐一看望拜访。大会结束后，他还组织福州各县区把参会侨胞代表们接回祖籍地，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增进他们和祖国乡土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增强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27]。

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再次重申了“根”“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并进一步指出，“中华文明有着 5 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15] 64}。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生生不息几千年，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增进海外侨胞与祖国联系和感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所在。新时代的侨务工作以“根”“魂”“梦”为主线，正是因为团结统一的民族意识和中华文化的烙印最能增强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的清晰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地方工作期间扎实的侨务工作经历，以及对不同世代华侨华人的深入了解和情感共鸣。

四、从“在‘三有利’前提下充分发挥‘侨’的优势” 到“明确‘三有利’的新时代侨务工作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三有利”的新时代侨务工作原则。这主要源于他在地方工作时所提出的“对投资者有利、对所在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的“三有利”侨务工作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 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希望他们“运用自身优势和条件, 积极为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 更好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15]⁶⁴。一方面, 广大海外侨胞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商业人脉、丰富的智力资源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 海外侨胞在为中国与住在国各领域合作牵线搭桥的同时, 也将搭乘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便车”, 既能实现侨胞自身事业的新跨越, 又能推动住在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同时, 海外侨胞既有国内外人际关系又有不同文化交流经验, 是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中外民众相互理解的天然使者, 有利于营造互利共赢的和平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贯彻了“对海外侨胞有利、对住在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的“三有利”工作原则。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就对引进海外侨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 提出“鼓励海外乡亲回乡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交流, 通过引资兴业健全‘造血’功能, 增强发展后劲”的政策主张。改革开放初期, 大批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兴业, 带来了急缺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于是, 全国掀起了“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招商引资热潮。一些地方为了争取侨资, 甚至不顾地方实际, 只讲竞争、不讲合作, 将本地侨胞视为私有资源, 尽可能避免本地侨胞与其他地方接触。而习近平却在这股争抢侨资的热潮中较早清醒意识到, 互利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准则。早在1995年, 他就撰文指出, 海外侨胞回国投资“既有对故土的眷恋、回报之情”, 更有“在家乡兴业发家的商业动机”, “投资者往往更重视市场、资源以及投资地环境优劣的选择, 而不是主要以祖居地为选择标准”。因此, 在制订利用侨资政策时, “要遵循价值规律、经济规律, 不能急功近利”, 要“开明守信, 让投资者有利可图”, 要“本着‘先予后取’‘从长计议’的原则, 制订完善一套吸引外资、侨资的开明政策, 努力营造一种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环境”。所以, 他认为新时期侨务工作要“努力跳出以往侧重迎来送往, 联络感情, 接受捐赠等常规做法的局限, 立足于互惠互利, 着眼于长远发展。这既符合广大侨胞的利益, 也是我们扩大开放、发展经济的现实要求”^[28]。基于此, 习近平提出了“对投资者有利、对所在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的“三有利”侨务工作思路, 强调新时期侨务工作要更加注重从海外侨胞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 做到互利共赢、互惠合作、成果共享。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期,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整体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这一时期的侨务工作侧重于强调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兴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在当时就敏锐地注意到海外侨胞自身经济利益的问题, 并将之与凝聚侨心、可持续利用侨资统一起来, 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投资者有利、对所在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的“三有利”侨务工作思路。进入新时代, 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已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 解决中国的问题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的大格局, 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新时代的侨务工作已由“立足国内”向“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 在指出海外侨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力量的同时, 更多论述海外侨胞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国际这个大局的分量

明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出访与海外侨胞谈话时，总是谈三点希望：一是希望他们积极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二是希望他们抓住中国发展机遇，实现自身事业的跨越；三是希望他们主动宣介中华文化，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两国的友好合作牵线搭桥。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对海外侨胞有利、对住在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的原则，而“三有利”的侨务工作原则可以从他此前在地方工作期间的思考和实践中找到源头。

五、从“‘大侨务’观念的确立”到“明确‘大侨务’的新时代侨务工作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大侨务”的新时代侨务工作格局。这主要源于他在地方工作时所确立并着力倡导的“大侨务”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改革实践，始终将侨务工作放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形成了“大侨务”的新时代侨务工作格局，并对侨务工作的体制格局进行了深刻变革。2016 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和对新形势下侨联改革作出的部署，党中央批准并印发了《中国侨联改革方案》，提升了侨联服务大局、服务侨界和群众的能力和水平。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侨务工作要“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2018 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由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海外统战工作，管理侨务行政事务。2021 年，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再次明确由统战部统一领导和管理海外统战和侨务工作，强调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的“大侨务”观孕育于他在新老侨乡工作时的观察和思考，根植于他在地方领导侨务工作时的探索和实践，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在长期的侨务工作实践中，非常注意研究、总结和创新侨务工作方法策略，积累了丰富的侨务工作经验，升华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侨务工作理念。1995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系统总结 10 年来侨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大侨务”观念的确立》一文，指出“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正式提出并倡导新时期侨务工作要坚持“大侨务”工作观念。具体来说，“大侨务”观念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工作力量。习近平认为，新时期的侨务工作应破除过去偏重于让侨务部门或统战部门“单打独斗”的部门思维，应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要强化党的统一领导，这就要求地方一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支持侨务工作，必要时领导还要亲自做有代表性的侨商、侨裔的工作。在具体侨务工作实践中，习近平领导福州市建立了市级领导同海外 200 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福州所辖的县（市）区党政领导也都建立了海外乡亲联系制度。

第二，工作内容。习近平指出，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从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充分发挥“侨”的优势，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地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能再局限于走亲串友式的迎来送往、联络感情、坐等捐赠，而要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大局，通过引资兴业健全“造血”功能。在具体侨务工作实践中，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率团出访国外，主动开展经贸活动

和科技、文化交流, 介绍改革开放政策, 向海外华侨华人传递乡情与友谊, 坚定了他们回祖国投资兴业的决心与信心。

第三, 工作对象。习近平认为, 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从主要做老一代华侨的工作, 转向同时重视新一代侨裔和华侨新移民的工作, 尽快弥合部分年轻华侨对故土亲谊感情上的断层。他还特别提醒, “现在海峡对岸也在争取侨心, 从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大局出发我们切不可把争取二、三代华侨这块阵地让出去”, 体现出其非凡的战略观和全局观。在具体侨务工作实践中, 习近平通过老一代华侨牵线搭桥, 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在福州的不少侨资企业就是由老一代华侨投资兴办, 然后逐步过渡到由新一代华侨经营管理的。

第四, 工作范围。习近平从地方侨务工作实际出发, 强调新时期的侨务工作不能仅囿于在本乡本土华侨中交朋友, 要放开眼界, 主动把侨务工作扩大到本乡本土以外的华侨华人群体中去。在具体侨务工作实践中, 习近平非常注重广泛联络交友, 使得很多非福州籍的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在福州投资兴业。

第五, 工作方式。习近平认为, 侨务工作的基础在国内, 而侨务工作的主体却在海外。所以, 新时期侨务工作应把重点从国内转向国内国外兼顾, 既要做好国内归侨、侨眷、侨属的服务工作, 又要做好海外华侨华人, 尤其是在海外政治界、经济界中较有影响的华侨华人的服务工作。在具体侨务工作实践中, 习近平既建立了市(县、区)各级领导与重点侨商挂钩联系制度的长效机制, 还制定了有目的、有计划的年度出访计划, 直接上门做联谊工作。习近平最后总结认为, “从‘小侨务’到‘大侨务’体现了新时期侨务工作的重大发展和必然”^[28]。

2000年, 已升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 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有“大侨务”观念, 要胸有全国大局, 要在推进传统侨务工作的同时, 积极拓展侨务工作的视野和领域^[19]。2005年, 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深入研究了浙江侨情和侨务工作实际, 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侨工作方面的五个关系, 即侨务工作为浙江发展大局服务与为侨服务的关系; 国内侨务工作与国外侨务工作的关系; 立足浙江籍侨胞与面向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关系; 侨务工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调动涉侨部门积极性与发挥侨务部门职能作用的关系”^[29],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大侨务”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广阔视野, 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坚持将侨务工作放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来谋划, 最终形成了“大侨务”的新时代工作格局。

六、从“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到“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侨务工作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侨务工作重点。这主要源于他在地方工作时对华侨华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高度肯定, 对华侨华人融入并回馈住在国的积极倡导和对华侨华人为世界和平发展作贡献的殷切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中国梦,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 也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利益和机遇。”^[30] 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是相通的, 国家好、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 世界好, 中国才会好。因此, 他希望广大海外侨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加强内引外联、牵线

搭桥，积极为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好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较多强调海外侨胞对祖国和家乡的贡献，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作用，而较少关注和宣传海外侨胞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这就难免给住在国政府和人民造成海外华侨华人“只知道落叶归根”“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很难被当地社会同化”以及“华人的贡献主要在中国”等印象^[31]。这种对海外侨胞的定位偏差和对海外侨胞作用的不全面宣传所形成的舆论氛围，对海外侨胞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就特别关注海外侨胞自身安全和利益及其对所在国的贡献和作用，提出充分发挥“侨”的优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对海外侨胞有利、对侨胞所在国有利。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要立足互惠互利、着眼长远的战略眼光，与他后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多次撰文宣传和称赞海外侨胞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重要贡献。1991年，习近平在黄乃裳开垦“新福州”9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认为黄乃裳将侨居的诗巫从不毛之地变成繁荣市镇的不朽功绩，是华侨的楷模和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16] 90}。1995年，习近平在为《华侨历史论丛·第八辑》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广大海外华侨通过长期艰苦奋斗，惨淡经营，逐步发展，使华侨华人经济与当地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关系，水乳交融，是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32]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的宝贵资源，更是其住在国的宝贵财富，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很大，但更主要、更直接的贡献是在住在国。习近平熟悉华侨发展史，深知海外侨胞对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更明白对海外侨胞地位和作用片面化的宣传不利于其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每每谈及海外侨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时，他总会同时强调海外侨胞积极融入、回馈住在国的种种事实和重大贡献。不仅如此，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通过以侨为桥，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日益增多，这些双向的交流推动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28]他已极具前瞻性地看到了海外侨胞所拥有的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贸易网络和金融网络，将成为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看到了海外侨胞对促进中国和住在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对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都具有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基于此，习近平才特别指出，海外侨胞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际经济接轨铺路的同时，还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高度评价了海外华侨华人对住在国作出的突出贡献。2013年9月25日，在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艰苦创业，拼搏进取，积极融入住在国社会，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在事业上取得长足发展，为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30]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招待会上深情回顾一百多年前旅美华工的牺牲和贡献。他指出：“150年前，数以万计的华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参与建设这条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他们拿着简陋的工具，在崇山峻岭和绝壁深谷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往美国西部的战略大通道，创造了当时的工程奇迹，带动了美国西部大开发，成为旅美侨胞奋斗、进取、奉献精神的一座丰碑。”^[33]海外侨胞是受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波动影响最直接、最敏感的群体，他们更能亲身体会到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外侨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忠实信仰者、积极践行者和有力推动者。2018年8月29日, 受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赵乐际代表党中央在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致词。赵乐际在致词中说: “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要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 发扬光荣传统, 勇担新时代使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大作为、展现新风采。”^[34]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新时代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强调要引导华侨、归侨、侨眷“致力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5]。这是党和国家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将华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 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从在地方工作时提出海外侨胞能够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到新时代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侨务工作重点, 习近平对海外侨胞重要贡献和侨务工作重要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

七、从“主动上门释疑解惑, 以诚待人” 到“明确‘贴心人’‘实干家’的侨务干部队伍建设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了“贴心人”“实干家”的侨务干部队伍建设要求。这主要源于他在领导和从事地方侨务工作时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新时代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 希望侨务战线的同志们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 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毛泽东同志说: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36]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 “光有思路和部署, 没有优秀的人来干, 那也难以成事。”^[37] 当好“贴心人”、成为“实干家”, 就是新时代侨务工作好干部的具体化标准。习近平曾回顾说: “我到福建16年, 工作中都有一个‘侨’字, 也可以说从事了侨务工作16年。”^[19] 在地方领导侨务工作期间,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并随着实践不断成熟、升华。新时代明确“贴心人”“实干家”的侨务干部队伍建设要求, 可以从他的地方工作经历中找到源头。

习近平认为, 海外侨胞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外, 对国家政策理解不深, 因此很有必要主动上门释疑解惑, 以诚待人, 才能建立信任感。在福建工作期间, 习近平就很善于同海外侨胞沟通交心,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2019年6月, 福建省委原副书记袁启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 “有一位拥有跨国集团的华侨, 祖籍是福州的, 他的家族情况比较复杂, 父亲是地主分子, 土改的时候曾错误地遭到批斗”, 这位华侨对此耿耿于怀、心存芥蒂, 根本不愿回国, 更没有回国投资的打算。习近平听说之后, 亲自前往这位华侨所在的国家做他的工作,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希望他回到家乡走走看看。经过他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 这位华侨转变了对中国、对共产党的看法, 回到福州投资, 为福州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他自己的企业也受益良多^[27]⁶⁶。习近平能够设身处地从海外侨胞的角度考虑问题,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缅甸华侨吴庆星回国投资创办的仰恩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具有颁发国家本科学历证书和授予学士学位资格的民办大学。在大学兴办之初, 吴先生与教育部门就一些事项总是协调不好, 市里和省里多次派人协调, 都谈不拢, 局面一度搞得很僵。习近平听说之后, 亲自带队到吴先生家拜访。他们谈话很投契。习近平要了纸和笔, 问吴先生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吴

先生说一条，他就记一条。一一记下之后，习近平一条一条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需要配合做什么工作……，很短时间，就把所有问题交待得清清楚楚，双方都很高兴地把问题解决了^[38]。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密切关注这场风暴对海外华侨华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采取有力帮扶措施解决侨资企业的暂时困难，帮他们渡过难关。这极大增强了海外侨胞回国投资的信心。对海外侨胞的真心关怀和贴心服务让习近平收获了很多侨界朋友。曾和他共事的同事回忆说：“他总是能用真诚、贴心的语言，赢得其他国家的的朋友、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们和各国侨胞的心。他亲切、亲和、拉家常一般朴实无华接地气的语言，总是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无形之中就被他折服了。”^[39]习近平还非常重视对海外侨情的掌握和分析，因为只有充分掌握了海外侨胞的真实情况和实际诉求，侨务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他曾花很大精力建立了福州市三级侨情资料库以及“市级领导同海外 200 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28]，对福州籍和在福州投资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具体情况了然于胸。在他的领导下，福建省侨办制定了各级政府领导对 138 家重点侨资企业的跟踪服务挂钩制度，完善了地方政府为侨资企业服务的 7 项工作制度等^[40]。这种贴心的服务和实干的作风，感染了一大批海外华侨华人，他们纷纷赴闽投资兴业，极大地推动了福建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侨务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是以心换心、以情动情的工作，没有对侨胞的深厚感情，没有对工作的热忱付出，是交不到真友铁友，也是干不好侨务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交朋友的面要广，朋友越多越好，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想交到这样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41]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凡遇有海外乡亲来访、重要侨领回乡省亲或兴办项目都尽力安排时间亲自会见，凡因工作外访都将看望拜访海外侨胞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真正成为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在浙江工作时，他每次出访都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抓住一切时机开展拜访、会见、座谈、邀请等涉侨联谊活动。比如 2006 年赴美访问，仅两天时间，他就密集出席了近 20 场公开活动，会见了美国 31 个华人华侨社团的 200 余位侨领。他还曾对同事说：“我们到国外去，那些接待过我们的华人华侨如果到浙江来，一定要跟我讲，哪怕我没时间请他们吃饭，也要在办公室见见他们。”^[42]习近平这种重情重义、真性情的性格感染了很多海外侨胞，赢得了他们的认可与支持。习近平在地方领导侨务工作期间，对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创设并完善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侨务工作制度，是当之无愧的实干家。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对海外侨胞一直满怀深情，对侨务事业始终满腔热忱，是值得侨务干部永远学习的鲜活范例和生动典范，为新时代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

八、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领导和从事地方侨务工作的实践中孕育和不断发展的，经历了从“谋一域”到“谋全局”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都能从他在地方领导和从事侨务工作的思考和实践探索中找到源头。从内容结构来看，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侨务工作的思考和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重

卢建华, 颜晓峰. 从“谋一域”到“谋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在地方的孕育和实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67-80.

要组成部分; 从生成逻辑来看, 习近平在地方期间关于侨务工作的思考和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孕育和发展的试验田; 从发展必然性来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其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侨务工作的思考和实践在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延续。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关于侨务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理念、生动实践和重要讲话精神,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实践探索中孕育、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特色侨务实践相结合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 必将紧密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国侨联党组. 新时代侨联工作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J]. 求是, 2018 (16): 19-21.
- [2] 张国雄. 习近平侨务“大局观”的继承与发展 [J]. 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1): 6-10+15+93.
- [3] 陈云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49-59.
- [4] 李其荣. 习近平侨务论述的主要内容和构成体系 [J]. 八桂侨刊, 2017 (1): 42-48.
- [5] 陈云云. 习近平侨务思想探析 [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7 (2): 4-9.
- [6] 张克兵, 黄清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研究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1): 4-14.
- [7] 张春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之实践与理论渊源探析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9 (3): 1-7.
- [8] 李其荣. 凝聚侨心侨力 同圆共享中国梦——新时代习近平侨务思想阐释 [J]. 丽水学院学报, 2021 (1): 1-8.
- [9] 贾梦茜, 金新. 中国共产党侨务政策的百年演进: 历程、机理与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51-59.
- [10] 林琳. 以习近平侨务论述为指导 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J]. 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1): 1-5+93.
- [11] 任贵祥. 习近平关于侨务问题的重要论述及丰富内涵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8 (2): 31-39.
- [12] 李夕菲. 从地方实践到国家战略: 习近平“大侨务”观再认识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 16-23+168.
- [13] 吴元. 以侨引侨: “大侨务观”在福建的实践与探索 [J]. 八桂侨刊, 2020 (3): 57-63.
- [14] 董立功, 邹文韬. 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关于侨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5-9.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63.
- [16]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习近平侨务工作论述摘编 [M]. 内部资料, 2016: 90.
- [17] 杨学漪. 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1.
- [18]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福州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120-122.
- [19] 凝聚侨胞爱国心 抓好侨务促发展——访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10-11 (2).

- [20] 杨学滨. 浓浓赤子情 [M].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2: 1.
- [21] 习近平在纽约华人华侨欢迎晚会上说, 浙江发展必将为侨胞带来美好发展前景 [N]. 浙江日报, 2006-05-09 (1).
- [22] 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在广东考察纪实 [N]. 人民日报, 2020-10-16 (2).
- [23] 本书编写组. 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 上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2: 365.
- [24] 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 [N]. 福建日报, 2014-10-22 (1).
- [25] 孙立极.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李克强作出批示 [N]. 人民日报, 2017-02-18 (1).
- [2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3.
- [27]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福建: 上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 177.
- [28] 习近平. “大侨务”观念的确立 [J]. 战略与管理, 1995 (2): 111-113.
- [29] 浙江贯彻胡锦涛重要指示 对侨务工作作出新部署 [EB/OL]. (2005-09-27) [2023-08-07]. <https://zjnews.zjol.com.cn/system/2005/09/27/006316578.shtml>.
- [30] 习近平书信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13.
- [31] 刘芳彬. 习近平涉侨论述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4): 62-66.
- [32] 杨学滨, 梁康生, 蔡仁龙, 等. 华侨历史论丛: 第八辑 [M]. 福州: 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编印, 1995: 1-2.
- [33] 习近平. 在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的讲话 (2015 年 9 月 23 日, 西雅图) [N]. 人民日报, 2015-09-25 (2).
- [34] 赵乐际. 为新时代凝聚侨的力量 谱写民族复兴的新篇章——在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2018 年 8 月 29 日) [N]. 人民日报, 2018-08-30 (2).
- [35]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 (1).
- [36]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26.
- [37] 习近平.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020 年 6 月 29 日) [J]. 求是, 2020 (15): 4-9.
- [38]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福建: 下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 141.
- [39]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厦门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177-179.
- [40] 赵健. 侨务系统为侨资企业服务见成效 [J]. 侨园, 1999 (4): 14-15.
- [4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304-305.
- [42]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浙江: 上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 166.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坐标、场域与进向

何玉芳 张晓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文化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部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化传承发展、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 都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紧密关联起来, 勾勒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维度和文明向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既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 又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对抓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时性维度上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纽带, 在共时性维度上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情感基石, 在即时性维度上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源泉, 为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织牢民族团结之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意味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由“文明传承”的历史场域转换到“文明复兴”的现实场域。这一场域转换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向度上提出继承守护、创新发展和精神指引三个方面的时代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引导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 以“第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6.007

作者简介: 何玉芳,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晓,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00后’群体的思想特征及引导规律研究”(L22I200010)

引用格式: 何玉芳, 张晓.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坐标、场域与进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81-92.

二个结合”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指引中华民族在推进文化创新中由“自在”走向“自觉”；以“兼收并蓄”涵养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民族”走向“世界”。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新的文化使命；文明复兴

中图分类号：D633；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6-0081-1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文化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部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化传承发展、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时，都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紧密关联起来，勾勒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维度和文明向度。就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2]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2023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4]。

这些重要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多元到一体的意识凝聚，承载着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寄托。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基础，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与时代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因此，从文化向度上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互动关系，不仅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央相关重要会议精神的理论要求，也是推动中华民族成为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的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要求。

当前，学界以文化为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从文化记忆角度认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元素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展^[5]，成为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文化基础^[6]；从文化自信角度强调，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具有丰厚精神文化基础的民族^[7]；从文化认同角度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之根^[8]，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9]。笔者在文献梳理中发现，少数研究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生成的^[1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

族根基^[11];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精神纽带和身份标识, 能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的文化自信^[12]。可见, 从文化角度系统化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 本文从新的文化时空场域出发, 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时序坐标, 系统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功能定位, 并提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明实践场域转换中的时代要求, 进而探析新的时空场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未来进向与方法路径。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坐标锚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推动中华民族成为更加凝聚、认同度更高的共同体, 在历时、共时、即时三重时序坐标上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发挥建立精神纽带、奠定情感基石和提供动力源泉的能动作用。

(一) 历时性维度: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立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一直作为一个连接历史与现代、个体与集体的牢固纽带, 连接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经验和民族集体记忆。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共同”总结了这一精神纽带: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3]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 我们需要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追求相结合, 强化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 为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织牢民族团结之网。

其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联结历史与现代的精神纽带,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将中华民族拥有的丰富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与现代追求相结合, 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历史传统的核心要素, 一直高度重视集体和团结, 认为民族的力量来源于团结和共同体意识。在历史发展中, 中华民族凭借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团结一心、战胜困难, 在多次化解外部冲突和内部矛盾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团结就是力量。中华民族对共同体理念的追求, 蕴藏在各民族关于团结的谚语中。比如, 土家族谚语说“单丝不成线, 单竹不成排”; 哈萨克族谚语说“力量不在胳膊上, 而在团结上”; 赫哲族谚语说“爬山越岭要互助, 渡江过河要齐心”。这些谚语反映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团结观念,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坚实的人文精神。

其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联结个体与集体的精神纽带,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化了民族联系。在中华民族史中, 个体与集体、地方与中央、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文化、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这种联系不仅仅是物质的, 更是精神的、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精神纽带, 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协作, 为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来看, 这种纽带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将个体归属于集体的结构观

念,可以使个体更好地融入集体,个体与集体共同分享利益和责任,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和谐共生。从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来看,这种纽带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尤为明显。在行政管理、政策制定的互动中,这种纽带使得地方与中央可以更好地协调和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从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来看,这种纽带促进了中国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造就了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精神相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精神纽带极大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增强各民族政治互信、促进各民族手足相亲的战略功能^[14]。

合羹之美,在于合异。在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我们立足现代解读中华民族历史提供了关键视角,为强化民族联系与促进民族团结搭建了平台,使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

(二) 共时性维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情感基石

如何从现代维度确认精神命脉,增进文化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发挥着情感基石的深厚作用,是各民族间观念聚合、相互认同、交流共进的精神家园。在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念共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

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拉近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强大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各民族间共同性不断增强、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结果。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培育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比如,在政治心理、文化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各民族间的互动联系日益加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过来滋养着各民族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使得各族人民具有天然的亲近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为中华民族塑造了稳固的文化内核。例如,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联合实施的“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边疆行计划”(“春雨工程”),推动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向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兴文化”的文化内核塑造,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了情感支撑。

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正向互动的社会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进“五个认同”^[16],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7]。“五个认同”为各民族团结奋斗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石。特别是中华文化认同具有强大的整合凝聚功能,使得各民族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坚实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各民族之间守望相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坚持以法治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制度保障。有力的制度保障能够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互助,营造一个正向互动的社会环境。通过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努力打造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环境,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中将各民族塑造成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和谐正向的民族情感基础。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这种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同坚固的“精神锚地”,使得每

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与中华民族的情感联结, 帮助中华民族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价值取向,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即时性维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动力源泉

在文化建设的目标中, 以何种深层次的因素驱动这一宏大的文化使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由各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所融合塑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能够鼓励人们超越个体的局限, 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坚定信念、不懈奋斗。

其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四个与共”鼓励各族人民为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奋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深刻诠释^[18]。休戚与共作为中华民族利益交融的共同体意识, 可以激励各族人民将中华民族集体利益放在首位, 在推动 56 个民族共同富裕的进程中, 牢固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具体利益彼此交融的共同体理念。荣辱与共作为情感相通的共同体意识, 可以塑造各族人民彼此共享的身份认同, 进而衍生出共膺荣耀、共抗屈辱的情感共鸣, 为中华各族儿女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情感依托。生死与共作为生存共担的共同体意识, 形塑了各族人民彼此承担族际共生的责任意识, 进而帮助各族人民协调自身行动以契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外在行为规范。命运与共作为共生发展的共同体意识, 赋予了各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使命感, 指引各民族整合力量从共同发展的高度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行审视, 进而有效整合各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

其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有了这种自信, 中华民族在与其他文明交流时, 既不会盲目崇拜, 也不会自卑, 而是能够平等、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文化, 并从其他文明中学习有益的经验 and 智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继承创新中持续进步, 在文明交流中不断发展, 在应时处变中凝练深化。以进取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既注重对话与沟通, 又注重实践与合作的交流方式。同时, 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大思政课”,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 能够坚定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文化自信, 为中华文明发展开辟崭新境界。

万物有所生, 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延绵至今, 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持续的动力。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取长补短、包容进步, 还有助于在世界文明交流融合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场域转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 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 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 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19]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 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场域转换, 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文明传承”的历史场域转向“文明复兴”的现实场域。这种转变不仅是时间的延续, 更是对中华文明内涵的重新审视和未来规划。这个新的文化场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新要求, 即如何在继承守护传

统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提供精神指引。

（一）“文明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场域

从中华文明史来看，文明传承的历史场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社会土壤和历史经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特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这既是对古老的文化符号、仪式、艺术和思想的传承，又是对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文化源流。

其一，在“文明传承”的历史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特征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对古老的文化符号、仪式、艺术和思想的尊重和传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生动展现。对于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20]。这些文化符号，如甲骨文、伏羲、河西走廊、兵马俑等，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对它们的尊重和传承，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特征中更为深刻的，是对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的价值观、精神和智慧的珍视。在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统合力的作用下，外族的文化、思想等都会被纳入中华民族文明体系之中^[21]。在先秦时代，部分非华夏族的图腾、祭祀和音乐等文化元素融入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元素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观、精神和智慧是中华民族对自我、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和诠释，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灵魂。

其二，在“文明传承”的历史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优势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文明作为一个跨越数千年的文化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包括成就和挫折。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如古代的科技发明、文学创作、哲学思考等都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资源。中华文明历史上遭遇的挫折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坚韧和深厚。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13]，在外部压力导致的民族危机和内部变革引发的思想启蒙的双重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强大凝聚力，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各族人民接续奋斗，采取改革开放、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等一系列措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文明传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体现在中华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是中华民族对自己文明命运的自觉把握。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深化和升华，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文明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场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22]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在文明复兴的现实场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主动融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科学新技术、现代新文化的有益方面，向世界展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中国理念。

一方面, 科技在中华文明复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 更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各个领域, 无论是航天、生物技术还是信息技术, 中华民族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更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强大助力。高铁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网络最为发达的国家。交通的便捷加强了各民族地区的联系, 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持。科技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抛弃, 而是与之在许多领域进行有机结合。比如, 中医药学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普及, 中华医学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此外,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还体现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比如, 故宫博物院利用现代技术对文物进行数字化存储, 使得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长久保存, 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观赏方式。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许多传统的文化元素得以用新的方式(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另一方面, 现代文化在中华文明复兴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互动日益频繁。这不仅为中华文明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且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应该盲目地模仿和追求外来文化, 而是应该在尊重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合理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 使之与传统文明元素相结合。例如, 国家大剧院虽吸收了许多现代的建筑设计理念和技术, 但在设计中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 使其现代外观设计与周围的古老建筑形成了和谐的对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守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要主动融合现代文明中的有益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既要重视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和保护, 又要注重对现代科技、文化的吸纳和创新。这种创新是思想观念的革新, 旨在保留中华文明独特性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现代元素, 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浩渺行无极, 扬帆但信风。“文明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深厚, 体现在中华民族对其文明遗产的继承与发展, 对现代文明的自觉创造, 以及对文明复兴的追求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在继承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和吸收融合现代科技文化的思想精华两个方面不断发力, 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能。

(三) 守护、创新、指引: 场域转换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激活其生命力, 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23] 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向度为中华文明复兴提出了继承守护、创新发展和精神指引三个方面的时代要求。这三个要求也是场域转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文化要求和实践指向。

其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继承守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根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文化活力的生动反映。这种连续性为文明复兴在历史深度和内容广度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现出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中

华民族不惧挑战、勇于进取的表现。这种创新性使得中华文明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文明连续的前提和结果。这种深厚的文化基础为各种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系，使其能够在多样性中找到共鸣，进而形成一个更加和谐的文化体系。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独特魅力的生动体现。这种文化的包容性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开放性和进步性，更是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的关键因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生动体现在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的外交理念中。这种基于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外交策略，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也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方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精神元素的注解，彰显文明创造主体的自信自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阐发是基础工作，这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理解其内涵和价值的基础上挖掘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意义，并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精神元素的注解是一个深度的文化探索过程，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再将其与现代的社会实践和价值观念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意义和价值。彰显文明创造主体的自觉与自信，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要求。只有当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才能为全人类的进步和繁荣作出独特的贡献。

其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时代条件，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规定性的自觉生成，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以新的文明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中国智慧。这种现实场域规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使命：一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二是为人类社会指明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坚守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更要讲好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愿景^[25]，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文明建设的场域转换中，激发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我们在继承守护好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根脉的同时，要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方法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舞台，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未来进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2]在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引导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指引中华民族推进文化创新从“自觉”走向“自为”，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民族”走向“世界”。

(一) 从“多元”到“一体”：以“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2]“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又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树立共同的精神文化。以“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引导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依托，是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

首先，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综合体现。“多元”与“一体”是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性的两个核心词汇。“多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一体”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团结性。在长期的交往中，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统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与其他民族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促进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交往与合作，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次，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机制。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各民族间的交往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不仅基于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而且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不仅是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融合，更是情感、价值观和理念的交汇。这一过程在培育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和共同精神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近年来，国家民委及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更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组织推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作出了积极探索。

最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是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突出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为人民塑造了一个精神共通的意义世界，即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种精神意识和情感表达相融合的精神家园，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引导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由“多元”走向“统一”。多元性为各民族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交流融合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一体性则为各民族指明共同的目标和方向，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多元”到“一体”再到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是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突出成果。

多元一体，百川归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各民族共同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逐步引导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价值共识、塑造文化认同。

（二）从“自在”到“自觉”：以“第二个结合”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第二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生命，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内在机理，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推进文明复兴中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在推进文化创新中由“自在”走向“自觉”。

首先，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机制和内在原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建设层面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形式、中国形态之后，还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它蕴含了一种新的文明观和大历史观^[26]。这种观念摒弃了西方文明冲突论，确立了更加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文明观，形成了能够古今贯通、源流互鉴的历史认知论。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自觉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动力。

其次，以“第二个结合”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来看，“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路径，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大的动能。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不仅来自其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而且来自中华文明的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精神追求。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得到了弘扬与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华民族主动地、有意识地创造文明。这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是一个文化思想的解放。这一解放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自在”转变为“自觉”，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提供了主体动力。

最后，以“第二个结合”激发中华民族对文明的传承和创新由“自在”走向“自觉”。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传承与创新始终是其文化发展的两大动力。“第二个结合”使得中华民族对文明的传承与创新由“自在”走向“自觉”。如果说“自在”是对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无意识、无目的、无方向的接受和继承，那么“自觉”则是对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有意识、有目的、有方向的选择和发展。这种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华民族不仅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够更好地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创造一种既有传统底蕴又有现代气息的新文明。这种新文明不仅能够满足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需要，还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和选择。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中，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无穷的潜力，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三）从“民族”到“世界”：以“兼收并蓄”涵养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扬弃与超越。这就需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兼收并蓄”涵养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推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开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中华文明新叙事。

首先, 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中华文明以其兼收并蓄的传统智慧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独特的魅力。从古至今, 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化流派和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在相互竞争中也相互吸纳, 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哲学体系。这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得中华文明在哲学、艺术、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比如, 汉字在与其他文字系统的交往中, 吸纳了部分外部文字的形态和结构, 形成了今天的汉字书写系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底蕴, 使得中华文明始终充满了生命力。

其次, 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塑造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既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无数的文化交流与碰撞都证明了兼收并蓄的价值。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近代的文化交流, 中华文明始终展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 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华大地上, 众多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都实现了和谐共生。这种和谐共生正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精神品格的生动体现。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时, 始终能够保持内部的团结稳定, 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固的内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使得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形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最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兼收并蓄中构建符合人类文明走向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始终能以兼收并蓄的智慧吸纳有益元素的关键, 是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兼收并蓄”作为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是一种对内部多元文化的尊重和融合, 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中华民族视多元文化为一种财富, 认为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都可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这使得中华文明在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 形成了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帮助人类形成一种立足世界本身、超越自我中心的文明格局, 这种格局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兼收并蓄”的民族智慧, 强化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 不断涵养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品格, 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其他文明互联互通、互学互鉴, 开启更加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中华文明新叙事, 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四、结语

循大道, 至万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创新发展, 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 是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篇章的行动指南, 为中华文明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以文化主体性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标识,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续发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3]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5] 王延中, 宁亚芳, 章昌平, 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9): 1-9.
- [6] 陈桂清, 吴晓芳. 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1): 36-43.
- [7] 邹绍清.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学理建构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20-35.
- [8] 黄伟. 习近平文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 [J/OL].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31030.1032.002>.
- [9] 黄小玲, 冉凌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热点主题与趋势展望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3 (2): 20-31.
- [10] 陈金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8): 16-21+204.
- [11] 李包庚.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逻辑 [J]. 探索, 2023 (5): 163-176.
- [12] 曹一飞. 从新文化到新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0-109.
- [1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7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4-7.
- [14] 田凯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80-89.
- [15] 李静. 民族心理学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80.
- [16] 何星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任务、途径与方法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29-38.
- [17] 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5-08-26 (1).
- [18] 张新, 毛嘉琪. 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辩证分析 [J]. 学术探索, 2023 (4): 1-8.
- [1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N]. 人民日报, 2023-07-02 (1).
- [20] 新华通讯社.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述评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23: 16.
- [21] 韩昇. 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 321-400.
- [2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7 月 1 日) [J]. 求是, 2021 (8): 4-20.
- [2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5 月 17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40-541.
- [25] 孟维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理路 [J]. 理论与改革, 2023 (5): 26-36.
- [26] 张志强.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 [J]. 哲学研究, 2023 (8): 5-14+127.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方正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作为数字信息资源配置的技术方案, 智能算法建构了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信息输出模式, 成为数字传播域的主导逻辑。智能算法的嵌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 将使其宣传教育工作发生诸多有益变革: 多主体内容供给结构可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流动性; 个性化信息分发机制为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精准靶向; 生活化的叙事逻辑以“润物无声”的柔性方式实现了更优的教育成效; 超时空的链接场景建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拟态意象。智能算法构造的数字生态亦可能诱发潜在风险: 个性定制与价值分化可能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向心力散佚; 真实遮蔽与虚假蔓延可能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召力消融; 严肃解构与娱乐泛化可能会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权威性瓦解; 理性退场与情绪支配可能引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性离散。未来, 我们应在技术风险的化解、制度缺隙的弥合、平台功能的激活、认知能力的塑造等维度发力, 使智能算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人工智能; 智能算法; 意识形态风险; 数字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6-0093-15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观战略视野, 指出“各族人民亲如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6.008

作者简介: 方正,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ZK20230231)

引用格式: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要“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就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和“纲”开展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2]。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引发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领域对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根据中国知网的主题词检索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7 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共计 3 600 余篇，相关研究呈现持续升温的整体图景。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部分研究者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视野转向了数字化领域，其成果主要围绕着数字技术的双重意识形态效应进行逻辑展开。从数字技术的积极效应来看，数字技术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路径^[3]，民族意象的数字化表达可以增强数字用户的情感共鸣^[4]，算法推荐等技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精准靶向^[5]。从数字技术的消极效应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化传播面临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侵蚀^[6]、“数字茧房”会导致中国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交流障碍与价值冲突^[7]、数字信息的驳杂难辨可能削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性^[8]等风险。从数字技术的规制路径来看，要通过创新传播形式^[9]、加强数字立法^[10]、搭建交流平台^[11]等方式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性。

综而观之，当前学者们已开启了数字互联网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研究，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功能主义范式分析数字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并提出了诸多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尤其是特定数字技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效应研究尚较稀缺，数字技术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逻辑机理尚未厘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互联网是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12]，“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12]²⁹；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面，明确要求“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13]。无论是“主阵地”的属性定位抑或“最大增量”的功能定位，都已表明数字互联网作为当代人的重要生存空间，必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新实践场域。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做好党的民族工作的关键性环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数字传播领域，以智能算法为基础架构的智能媒体重新确立了数字信息传播的秩序框架，并具有了重构思想宣传范式、形塑个体价值图式、调适社会价值秩序的数字权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数字化转型中的“最大变量”。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就智媒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范式转换^[14]、价值塑造模式创新^[15]及其法治规制路径^[16]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实现智能算法由“最大变量”向“最大增量”的有效转化，尚须深入至智能算法技术运演的核心原理中，破解并明晰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变革性逻辑。在此基础上，方能更准确地研判智能传播结构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潜在风险，在辩证认识“机遇”与“风险”中科学地制定应对策略，开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一、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

智能算法具有信息数据化、供给智能化、链接场景化等诸多特质，它重新建构了信息传播的基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本范式, 并成为意识形态数字化传播的关键变量。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是适应信息技术变革下数字化传播规律的必然选择, 并将在其内容供给、信息分发、叙事方式、链接场景等四重维度产生重大变革。

(一) 内容供给变革: 单一性内容生产转向多主体内容共构

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范式下, 主流媒介的意识形态内容生产有着固定的制度流程, 内容素材选择、内容结构排布、内容生成范式遵循着严谨的意识形态要求。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 作为前数字社会唯一性权威信源的主流媒介在制度化的信息生产流程下, 建立了相对单一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范式。相对集中、单一的意识形态内容生产, 使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始终处于不确定性的传播效果中, 但主流媒介高度的信息覆盖能力弥补了这一不足, 可以将其信息送抵全社会的每个角落。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有力支撑使主流意识形态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中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在开放性的数字环境中, 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破除了由社会政治与文化精英主导的传统范式。意识形态不再局限于思想家生产创制的产物属性, 多元化的生产主体共同构塑了数字时代的主流价值体系。多元化的内容供给主体“释放了网络的力量, 并使权力分散了, 事实上它打破了单向结构和垂直的官僚监控的中央集权的逻辑”^[17]。权威性的信源结构转向多元化信源结构的过程中, 意识形态内容供给链条下的数据生产、价值附着、信息服务与意见反馈等系列环节散落在了不同数字主体之上。数字用户凭借闲置的技术、时间、资源能够成为数字化内容生产的自发性主体。智能算法以强大的数据集采能力与数据规整能力, 将多维无序的数字信息纳入系统联结、动态调适与协同过滤的数字传播模式中, 构筑了开放性、多层次的数字化信息生态。多元化内容生产主体构成了多维数字网络上的信息供给节点, 为不同节点链条上的受众提供不同的数字信息内容。

数字化传播四通八达的网状内容供给模式, 将主流意识形态从单一性的内容供给结构中释放出来, 拓展了主流价值的空间流动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化转型亦是在网状内容供给模式中展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信息可以布散在多维度的结构层次中, 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将满足身处不同社会结构的受众群体的信息需求, 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字信息由“变量”向“增量”转化。网状布展的信源结构改变了传统内容供给的强“主-客”逻辑: 在权威性传播结构下, 受众作为信息的接受者不具备内容的选择权, 而单一性的结构也并不要求信息生产者关注其供给内容的可接受性; 数字信息的无限再生性与多元化供给模式, 实质上建构了一种弱“主-客”的关系范式, 数字用户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拥有了数字内容的选择权利。在弱“主-客”逻辑结构下, 内容生产者若想达到理想的传播效能, 必须获得数字用户对其内容的认可。类市场化的内容供给模式, 充分激活了多元化数字生产主体的创新智慧, 推动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突破固化的宣传形态, 向更具活力的传播范式转型。更趣味化、接地气的内容唤醒着数字用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在此过程中, 智能算法赋能可让数字网络节点上的不同内容生产者更高效地定位其“专属”受众群体, 迅速建立起拥有同类认知结构的传播社区。在具有相同趣缘结构的数字社区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应内容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二) 信息分发变革: 普遍性信息灌输转向精准性信息投喂

传统媒介时代的信息分发模式以信息的抵达为中心要求, 通过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便可以将意识形态内容送抵其地理界域的覆盖范围。尽管电子媒介的出现让信息内容的呈现不再局限于物质性

的文本形态，并可以通过虚拟化方式表达，但实质上并未根本上改变信息获取方法。在电子媒介的信息分发模式下，受众仍旧需要利用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检索功能，锁定与关键词匹配的内容，以此获取想得到的信息。尽管人工检索的方式可以获取相关主题的信息，但信息的适配度仍旧存疑，人工信息过滤效率也不尽人意。数字互联网时代，人类信息获取方式的实质性变革源自人工智能的应用。人工智能介入数字传播领域，颠覆了过往的数字信息分发机制。具言之，传统媒介下广域性的信息漫灌方式，导致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度无法测度，也因受众的认知水平不同而无法达到均质的传播效果。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在不同受众群体中呈现出畸轻畸重的不平衡样态。智能算法的信息分发机制，可以借助大数据的数据痕迹追踪功能，将数字用户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与认知偏向有效统合。比用户更“了解”其本人的“数字画像”，能够实现信息分发的个性化精准匹配。精准的信息投喂，破除了普遍性信息灌输系统下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风险，受众可以轻而易举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尤其是权威信息不再局限于传统宣传范式下固化的信息形态。无论信息是长视频、短视频、文字文本抑或其他类型的呈现形态，智能算法都可以依据受众的偏好来设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本质上是主流价值的传播工作。通过个性化信息匹配机制，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将具有精准的靶向。在对数字用户历史性数据的检索与整理的过程中，智能算法的用户分析系统“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并更加精确地定义自己的需要，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来让自己感到舒适”^[18]。智能分析系统对用户的全方位数据解析将有效传导至信息分发模型的建构中，通过精准定位特定受教育群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同教育内容可以高效传递给相应的受众群体甚至个体。人工智能的可训练性与深度学习能力，让智能算法系统的运作有了循环调适的功能，即受众群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应宣传教育内容的意见反馈数据，可以再次被算法数据库有效收集并整合，重新流入算法模型。算法模型根据新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调适。用户的数据量越大，用户分析系统的优势就越明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的靶向能力也就越强。在精准化信息匹配机制的循环作用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个性化信息将持续趋近受众的心理预期，真正成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样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将破除传统留滞于浅表性、口号式的宣传模式，真正抵达受众的心理或情感结构中，成为数字用户自发认同的意识形态。精准的个性化信息与普遍性宣传内容的有机结合，将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统一。

（三）叙事方式变革：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微观的生活叙事

“意识形态不仅是整合的媒介，而且也是一种‘解释规则’。”^[19]意识形态通过对宏大社会政治图景的擘画，发挥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被视作“整合的媒介”。自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以来，经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与列斐伏尔等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开掘，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属性逐渐显露，并成为以文化为表征的隐性意识形态的作用场域。政治面向与文化面向由此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体两面，在宏、微观不同领域产生着各自的社会效用。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以“日用而不觉”的意识形式，发挥着潜隐性“解释规则”的功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结构下，相对封闭的环境决定了外显的政治属性占据主导地位。在开放性的数字化传播环境中，意识形态的宏大政治面向无法完全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与阶层分化的加速，让当代人的个体意识不断增强，关涉个体利益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更深层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次的渗透力。这意味着,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话语面临着向微观生活话语转向的现实问题, 而智能算法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在以迎合受众为基本逻辑的算法机制中, 贴近数字用户的生活化需求是其技术运演的根本方向, 这就要求算法信息的叙事话语必须紧贴受众的生活实践。因此, 智能算法的运演逻辑与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活化转向高度契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意涵, 但在向意识形态话语转化的过程中, 若始终以抽象的理论性样态或政治性叙事呈现, 便无法有效切入受众的日常生活。不经转化的宣传范式难免会停留于大众认知的浅表结构, 无法深入受众的情感世界。肤浅的认知容易入脑却难以入心, 无法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期愿景。智能算法赋能下, 政治议题向日常的生活化议题转向、政治话语向日常的生活话语转化、严肃说教向日常的生活化交流转变。进言之, 算法信息内蕴的意识形态价值将在全方位贴近生活化的过程中, 浸润在数字用户的精神世界中, 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任务。相较于传统意识形态宣传范式鲜明的说教意味, 智能算法赋能下的意识形态生活化叙事以“润物无声”的柔性方式实现了更优的教育成效。智能算法的意识形态偏向具有潜隐性特质, 其运行形态通常以非意识形态化的面貌呈现, 看似不含价值偏向的方式能获得更高的受众接受度。智能算法的柔性化嵌入, 其实质是在数字用户的无意识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内置”于算法信息的价值结构中, 并赋予受众个性化的意义理解空间。当个性化的意义空间与主流媒介宣传范式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性价值建构不期而遇, 将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情感共鸣, 实现个体精神与总体性价值的共在与互嵌, 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意识与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亦由此被有机地统合为一体。例如, 在 2019 年中美贸易争端中, 《新闻联播》的严肃报道经由数字文化平台 B 站以“种花家(中华家)”“鹰酱(美国)”“兔子(中国)”等亚文化元素和网络语言转化, 塑造了以亚文化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话语形式, 激活了青年亚文化群体对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 深化了其对中国民族的情感认同^[20]。

(四) 链接场景变革: 抽象性文本形态转向超时空拟态场景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 “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共同体的基础, 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 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21] 在安德森的定义中, 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在于“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 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 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21]⁶。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意味着共同体成员的民族意识需要特定的媒介物予以承载, 承载性媒介可以是集体记忆、文化意象或某些特殊物品。在具有广袤地理疆域的民族国家中, 民族意识的建构则需要依靠大众媒介的传播性功能予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构的重要因素, 就在于大众媒介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意象建构能力。囿于媒介技术的内容转化能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在前数字媒介时代主要以文本形态呈现。文本形态的特质在于能够以清晰的逻辑图式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生成、文化性内涵、政治性功能娓娓道来。但文本的思维构式充斥着思辨性的说理意味, 只能在大多数共同体成员的精神世界中构造相对抽象的认知图式。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本形态的宣传教育中, 部分受众对民族意象的感知是朦胧而模糊的, 停留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表象化意识形态认知。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的赋能,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阐释从平面形态中彻底释放。智能视觉技术

通过建构更加具象且直观的民族意象，深化了民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既可以是政治叙事、历史叙事，也可以是文化叙事。其叙事资源均来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漫长文明演绎。文本媒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叙事资源的挖掘受到诸多现实限制，而数字智能技术则“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摄取、生成、存储和处理各种文化元素的能力”^[22]。在各类文化元素的数据化转型过程中，智能视觉技术将建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化数据模型。数据模型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视觉技术的复现能力，可以将一切遥远未知的文化意象、无法捕捉的幻想性意象全部摄取到虚拟景观的建构中。直观立体的场景化传播实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性意象的再现，虚拟性的立体意象充分释放了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空间。人机交互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了人与景观共在的强链接性的沉浸式体验。沉浸式体验构造了独特的“人在画中游”的具身性感受，即数字用户可以创构数字身份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虚拟景观的建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源自于中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数字用户既可以通过“时空压缩”的方式从旁观视角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轫与形成，也可以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虚拟参与中感知中华民族由盛转衰、再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趋势。智能算法与场景化传播机制的组合，建构了更加多维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场景链接方式，以更具象化、立体式、参与性的方式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未来空间。

二、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梗阻

智能算法凭借其超出过往一切媒介的文化元素摄取、处理、加工能力，产生了诸多独特的数字文化效应。智能算法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的技术性工具的功能定位，具有了构塑个体价值图式的强大意识形态功能。智能算法内嵌的不确定意识形态偏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诸多潜在的数字风险。

（一）个性定制与价值分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心力的散佚

信息定制是智能算法最为显著的功能。个性化的信息匹配机制源于其强大的算力支撑。智能算法通过对用户数字化生存数据的集采、分析与重置，建立起系统性的用户数据模型，并据此精准地勾勒出用户的“数字画像”。“数字画像”实质是在规整混乱无序的用户数据过程中，以类别化的数据群将个体标签化、结构化为可控制、可塑造、可预测的纯粹客体。用户数据的不断累积使算法运行机制得以循环往复、不断调适，数字用户成为算法运转系统中无数个动态演化的数字节点。在对主体的数据化解构过程中，“标签化”的数据构式将用户完全禁锢在了由简化的数字标签定义的信息环境中。类别化的信息结构无法完整呈现客观现实，而是潜藏着高度迎合受众心理预期的意识形态偏向，“算法无法提交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搜索结果，而且，这些搜索结果为了取悦我们的个人主义观念，往往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既有看法’”^[23]。特定的认知偏向将用户身处的数字环境构造为“悦己式”茧房，切断了与外界不同信息的沟通与交换，最终规限了其认知结构的边界。同质化信息壁垒构造的认知环境中，个体如同置身于“巨大的回音室”，受到相同意见信息的循环灌注。“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会强化原有的观点，变得极端，最后会导致群体极化的后果。”^[24]个性化的“茧房”衍化出极化的圈群结构，将偏颇的价值塑造为极化群体中的应然“真理”。

极化群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流动, 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意见碰撞, 割裂数字环境的整体价值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紧紧相抱”的“石榴籽”喻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结构。“石榴籽”式的共同体构型, “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13]。它勾勒出各民族群众以中华民族为依存轴心的向心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石榴籽”式的向心结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征形式, 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凝聚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与价值共识,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向心力。智能算法个性化定制营造出类似“孤岛”的地理环境, 将个体精神置于离散化的价值氛围中, 不断消解有效的公共交流, 使得广受认可的价值共识难以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内容作为公共性话语在圈群化的结构中被稀释, 公共性话语中内蕴的向心力也在极化价值的分化中被消解。沟壑纵横的“信息孤岛”不仅意味着无法跨越的沟通性“地形”障碍, 也隐喻着数字用户被全景化监控的价值困境。智能算法的全天候大数据集采功能掌握着个体心理变化, 信息投喂的调适机制使用户难以逃离“孤岛”。在算法中被遮蔽的受众无法接触到权威信源, 这使其对公共信息的接触意愿不断下滑, 社会价值共识的道德规约能力被潜在地侵蚀。在公共性消退的算法信息环境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共识性价值的示范与塑造功能亦会持续削弱, 干扰社会大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始终凝聚一体的向心力。

(二) 真实遮蔽与虚假蔓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召力的消融

去中心化的传播分权结构, 拓展了受众的自主选择空间, 却同样将数字用户置于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当个体淹没在大量无效、冗余、难以辨别的信息中, 从信息洪流中提取真实需要的信息变得困难, 信息过载引发了数字用户的决策困境。如约瑟夫·奈所言: “丰富的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当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在其中之时, 我们难以确定关注什么。”^[25] 过量冗余信息打破了信息摄入与信息处理间的微妙平衡, 破坏了人体生物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转, 让智能算法作为协同性过滤工具获得在场性意义。协同过滤机制通过定位拥有共同经验之群体的喜好来推荐用户感兴趣的信息, 并基于受众的反馈提取受众的信息偏向, 实现与数字用户的“意趣相投”。作为信息筛选工具的协同过滤机制, 其数据模型的建构与算法模型的训练始终以受众的趣缘结构为中心, 底层数据的来源或数据的真实性并不在可控范围内。在“众声喧哗”的数字舆论环境中, 全面权威的信息、深入理性的观点, 是社会舆论与社会心理最稳固的基础。但数字用户的生物属性决定了其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有限, “受众的关注若集中于某个维度的信息上, 则分配给其他维度的信息将会相应减少”^[26]。因此, 协同过滤机制看似给予信息过载合理的解决方案, 却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呈现与策略性的意义安排, 将数字用户导向由算法信息持续投喂而构造的失真虚拟世界。智能算法的意识形态功能由此显现: 通过操纵符号系统、选择信息内容、控制信息偏向, 塑造受众的价值感知环境。

算法信息营造的虚拟景观构塑了专属于数字用户的“楚门的世界”, 虚伪与真实的界限在智能算法客观性技术表象之下变得日益模糊。由失真与偏颇的信息搭建的数字景观, 成为数字用户获取感性经验的重要来源。泥沙俱下的数字环境中, 信息的客观与否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虚妄的谎言经过算法信息的循环反复被塑造为应然的“真理”, 正向的价值却在算法的排斥下变为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智能算法由此在虚假与真实之间制造出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模糊地带, 并将大多数受众滞留在了价值不确定性的风险中。充满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算法生态, 给予了多元化社会思

潮以暗流涌动的社会土壤。它们披着“不予置评”的中立外衣，在对客观表象的断章取义与加工融合中，在虚假与真实之间的游弋试探下，持续传导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偏向，将解构性的意义片段置入受众的精神空间。近年来，西方国家借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将民族问题政治化与工具化，在数字领域广泛散布涉疆涉藏的虚假信息，虚构诸如“强迫劳动”“新疆棉花”等民族性议题，以污名化谬论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凭空炮制“民族矛盾”“人权问题”，离间中国各民族群众之间的深厚情感^[27]。虚假信息的持续散布，可能使崇高的信念被扭曲的伪价值冲垮，应然的真理被主观臆断的偏见贬损，主流价值的感召力因虚实的错位而消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感召力来自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丰富的文化积淀、多样的民族生态，来自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中包含的价值共性。在智能算法的隐性操控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在孤立、片段、虚假的信息碎片中被解构的风险，其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可能遭到全方位虚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蕴的价值共性如被智能算法衍生的各种虚构数字意象抽离，可能失去感染与鼓舞各民族群众与中华民族共在的强大感召力。

（三）严肃解构与娱乐泛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权威性的瓦解

分权结构下的数字传播生态，使有限的受众关注成为市场竞夺的稀缺物品。能否取悦受众、增强用户黏性，成为衡量数字传播效力的重要标准。于是，“娱乐性”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下，开始席卷数字信息生产诸领域，俨然成为数字信息的标配功能。几乎不设门槛的信息生产环境中，娱乐化构成了“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28]。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休闲与娱乐本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与人的存在方式，娱乐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29]。但在数字资本规限和设定的信息环境中，“娱乐”由存在方式异化为活动目的，娱乐话语不断越界蔓延至其他社会领域，成为无所不在的信息样态，导致“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30]。娱乐话语的泛滥筑就了泛娱乐化的数字景观，泛娱乐化景观中浸染着感官欲望的涌动。娱乐话语通过对现行的理论性、规范性、系统性的符号体系和话语结构进行解构和重组，庸俗化权威性社会意识，导致崇高性下沉与庸俗性上扬，巨大的落差感制造出荒诞的谐谑效果，诱导受众产生虚假的感官愉悦。泛娱乐化以嘲讽崇高、解构经典、拒斥主流为表征，借助碎片化、娱乐性的外化形态广泛散布、渗透在数字化信息生态中，使庸俗内涵充斥着个体精神空间。长此以往，泛娱乐化可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流意识形态推至边缘化境地。“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30] 20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既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网络泛娱乐化在智能算法的推波助澜之下，不断浸透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在渐进式的思想脱敏中侵蚀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权威属性，污名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崇高意义。从泛娱乐化的衍生方式来看，“虚无一切”与“娱乐一切”构成了网络泛娱乐化的双重生路径。“虚无一切”即以虚无化的手段来拆解一切正统范式，无论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意义的抽离，还是对历史具象的扭曲、对历史背景的错置，都是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深层意识形态目的，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演进从其源流处进行虚无化，掏空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底。“娱乐一切”即以“娱乐精神”嘲讽一切高尚意义，对民族伟人和英烈的污名、对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民族灾难危机的调侃、对民族荣誉尊严的践踏,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意象从其本体上进行“平庸化”, 锈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崇高属性。当前的数字互联网生态中, 恶搞红色经典、戏谑英雄烈士等现象时有发生。比如, 《黄河大合唱》被篡改歌词, 编造黄继光“一不小心”堵住枪口、邱少云被毒蛇咬伤不能动弹等谎言恶搞英雄, 以庸俗解构高尚、将荣辱错位替换, 使得民族精神的根基受到潜在的侵蚀^[31]。从网络泛娱乐化的内在实质来看, 网络泛娱乐化的荒诞表象之下是虚无的价值内核, 它本质上是“一种在理论上‘中心稀薄的’(thin-centered)社会思潮”^[32]。“中心稀薄”的虚无化价值结构使得功利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先验地内置在娱乐表象之中。娱乐性外观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核的互嵌结构, 让泛娱乐化洪流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腐蚀能力。泛娱乐化信息浸入数字用户的精神世界, 将挤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流价值的生存空间, 耗损其作为权威性公共价值的意义属性。

(四) 理性消退与情绪支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识性的离散

在马克思看来, 现实的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33], 感性化是人的天然禀赋与“出厂设置”。人的感性逻辑常与情感或激情相关联, 会在情感的推动下有意识地转化为外在实践活动,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34]。在数字化传播情景中, 感性化认知逻辑表现为对具有鲜明情绪色彩的信息的热衷, 情绪化的信息更能够激发受众的阅读欲望。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 与不带情绪色彩的信息相比, 具有情绪意义的信息更可能引起受众的关注偏向^[35]。在信息生产权下移的过程中, 传统媒介理性化、秩序化的信息生产模式难以满足数字赋权下的受众需求, 个体的原始本能、生命冲动、情绪欲望等诸多感性元素注入了数字信息的生产结构。在引流变现的利益驱动下, 数字信息生产中的感性化趋向日益显现, 成为与理性化逻辑交织共在的重要信息导向。感性化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直观表象的知觉, 是介于无意识本能和理性之间的逻辑状态。它通常表现为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在未上升到系统、深入、全面的程度时, 直接进行不假思索式的价值判断^[3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流意识形态是在对人类历史演绎的深刻总结与现实实践活动的升华提炼中形成的科学价值, 具有系统的逻辑体系与深刻的理论内涵。情绪化数字信息的弥散实质上抛弃了“全面阐释”“精准剖析”“系统论证”等理性化特质, 以碎片化、煽动性话语将受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滞留于肤浅的表层结构。逻辑片段的截取与感性情绪的煽动, 将造成受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同维度的偏颇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性价值内涵被潜在解构。

从内容构造来看, 情绪化的信息不以理性分析还原客观事实, 而是在取悦受众的情绪冲动过程中激活了虚假的情感共鸣, 实现其夺取受众关注度的最终目的。由此, 基于受众感官体验的情绪化信息与智能算法的个性化信息匹配机制具有了内在的契合性。情绪化信息借助智能算法的技术力量, 建构了包裹着数字用户的感性价值空间。刺激性、诱导性情绪借以碎片化的片段信息结构内置在算法环境中, 潜移默化地浸染并极化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偏向, 尽管这些信息碎片一旦合为整体, 可能演化为谎言。但在激活受众感官本能、策动受众感官愉悦的过程中, 真假成为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情绪化的信息生态由此具备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拒止功能, 即主流价值在宣传教育过程中显现出的理性化逻辑结构、连续性思维图式与显性意识形态内涵, 无法有效接入算法营造的情绪化信息生态。情绪化信息经由智能算法的反复灌输, 逐渐驯化了部分数字受众的个体精神图式, 使其适应

于情绪化信息的逻辑构式，“失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和信心”^[3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将会在情绪化的信息环境中显现出结构性悖论：具有系统思维图式与科学性内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无法下沉到受众的感知环境中；极端化、诱导性的偏颇信息可以在算法生态中大行其道，为受众吸纳与接受。悖论性结构导致的最终后果便是，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感性话语与理性话语、碎片话语与系统话语之间的割裂和冲突，逐渐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理性。有学者曾指出，情绪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核心动力，“碎片化的情感系统会导致虚化历史、极端民粹等现象，带着先入为主的情感偏见编造或篡改真相，造成虚假情感泛滥和情感异化”^[38]。在此情况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共识性价值，将会被情绪化、诱导性算法信息扭曲裹挟。极端民族情绪的蔓延可能造成各民族群众之间产生情感隔阂，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大汉族主义”肆意滋长。

三、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防范

智能算法作为变革信息生产模式、传播范式与分发方式的底层技术架构，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双重意识形态效应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数字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客观审视智能算法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其衍生的数字文化效应，有的放矢地建构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方能化被动为主动，实现智能算法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效能的最大化。

（一）技术风险的化解：重置智能算法技术架构，纠偏智能算法运行逻辑

其一，明确智能算法的价值导向，以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的价值偏向。算法应用场景的持续扩张及其收获的强烈回响，意味着算法实质上已深度介入了当代人的现实生活。智能算法蕴含的特定意识形态隐蔽地嵌构在其内容生成模式、信息传播规则与个性化分发机制之中，在算法运行各个环节中不断流转的价值偏向，经由算法信息内化到受众的精神世界，产生不易觉察的意识形态风险。规范智能算法的运行机制，必须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1] 318}，将主流价值观贯穿至智能算法的运行逻辑中，为算法引擎置入正向的价值灵魂，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智能算法的意识形态偏向变幻不定，会随着不同受众群体的趣缘结构而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必须在具体应用场景中判断智能算法的价值偏向，并以正确的价值导向纠偏其运行逻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算法应用场景中，智能算法的运行机制理应以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价值依归，凸显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古老文明的独特历史印记，昭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中蕴含的美好道德传统，标识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生成的鲜明文化符号与文化象征，激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具言之，智能算法要借助强大的算力支撑，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明标识贯穿在数据采集、内容生成与信息呈现等诸多环节中，有效融入算法生态的整体建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算法的“方向盘”，让智能算法始终在正确的价值轨道上运行，真正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其二，强化智能算法的技术监管，增强算法责任机制的技术设计。智能算法的技术逻辑在于从海量信息中过滤截取受众需求的关键信息，实现信息的精准投送。在智能算法的技术设计中，须有意识地防范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强化智能算法运转的责任机制建构。在智能算法的数据采集系统设计中，要注重对数据来源的监测与检验，尽可能采用权威信源的数据信息，筛除数据源头不明确、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数据真实性模糊的问题信息, 确保受众最大限度地接触到客观准确的真实信息。在智能算法的信息分发系统设计中, 要对信息的投送排序进行更合理的设置, 尤其是要增加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投送频率, 增强数字用户对主流价值的接触意愿。在智能算法的信息匹配系统设计中, 要增加匹配不同意见的信息推送, 让受众深入了解多元价值, 避免算法信息构筑个性化“信息囚笼”。智能算法模型通常会为数量众多的数字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因而具有社会公共服务属性。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要求大型算法在运行机制中增加相应的透明度设计, 去除智能算法技术黑箱的神秘性, 让智能算法能够在相对公开的环境中运转, 使社会公众、技术机构、媒体机构都可以参与监督算法运行, 确保算法运行过程中的价值理性导向。

（二）制度缺陷的弥合：健全数字治理法规体系，完善涉民族舆情监管机制

其一，健全数字治理法规体系，维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秩序。依法治网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前提，也是获得数字空间中有关舆情话语主导权的根本保障。一方面，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完善数字治理法规制度体系。数字互联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新空间场域，新场域意味着将会产生此前宣传教育工作中未曾出现过的问题。尤其是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信息方面，各类敏感性、煽动性信息会借以全新的数字化外观规避数字信息管理，在数字监管盲区中滋长壮大，成为制造矛盾的重要源头。数字治理的法规制度体系要进行动态调适，适应危害性信息的发展流变，织牢信息监管的法治之网。另一方面，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核嵌入数字法规制度的建设中，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针对现行数字互联网法规对民族性事务处理尚缺乏价值规范与引导的问题，要将民族平等、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的价值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法条，确定数字互联网领域中各类民族事务的处理办法，确保数字空间的民族事务始终处于数字治理的制度框架内。要推动党的民族工作数字化转型在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上有序开展，实现虚实双重界域内的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实质提升。

其二，完善涉民族因素舆情的数字监管机制，净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生态环境。数字法规体系保障了数字互联网空间的基本运行秩序，但法规的滞后性使其无法完全规避涉民族因素舆情中敏感有害信息的蔓延。有效的舆情监测管理机制将弥补数字法规的滞后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借助数字智能化技术，对煽动性、敏感性信息进行动态追踪。在数字互联网领域建立智慧化涉民族因素舆情的监管平台，对网络空间中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言论和行径进行量化数据采集，动态分析涉民族因素的危害信息的基本类型和运作流程，智能匹配相应的数字法规条款，快速展开追责惩处和精准打击，为净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生态提供智能化服务。对发布煽动性、危害性涉民族因素信息的组织或个人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虚拟身份与实体身份的有效链接，将虚拟空间的法律责任传导至现实个体，对触犯数字法规的个人进行相应惩处，震慑因网络匿名而肆意发布不实信息的组织或个体。另一方面，要运用文本识别、矩阵分析、智能计算、情绪捕捉、深度分析等数字评估方式，监测数字互联网领域涉民族因素舆情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有针对性地引导涉民族因素舆情的正确走向。在涉民族因素舆情的监测管理中，要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具体研判发展走向，深入了解各民族群众所思所想，“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39]，有效防范重大危机性涉民族因

素輿情的出现。

（三）平台功能的激活：规范数字平台信息治理，提升文化产品创新能力

其一，规范数字平台的信息治理秩序，增强数字平台对用户的优质信息供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的逐利性与增殖逻辑，“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40]。数字平台作为数字资本运作的重要场域，是导致数字空间中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原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中，规范数字资本控制下的数字平台运行秩序，是充分激活数字赋能的重要保障。从数字平台的本质属性来看，拥有广泛用户群的大型数字平台对受众的信息获取与价值构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数字平台具有社会服务平台的公共属性。公共性社会服务平台的基本属性，要求对数字平台信息供给机制进行严格规范。平台信息监管要强化对低质庸俗信息的过滤功能，深入发掘涉民族因素敏感信息的内在结构与传播规律，杜绝各类煽动性、欺骗性涉民族因素信息在数字平台蔓延。平台信息监管要借助深度学习算法增强对敏感图像、语音、视频等素材的识别，防范别有用心的涉民族因素议题在数字平台出现。在平台信息的供给维度，各大数字平台应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共信息共享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信息在数字平台间流动，使不同平台用户群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公共信息。各数字平台应建立协同的信息过滤合作机制，通过编织大型平台算法模型的交互过滤网络，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公共信息的供给质量，增强平台用户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接触意愿。

其二，激活平台文化产品创新能力，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感染力。数字化赋能，不能局限于以数字化手段进行纯粹的理论宣介，而应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孕育的宝贵文化财富与资源，实现中华民族文化意象的数字化呈现。从类型上看，中华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遗存既包括非物质性的民族集体记忆，如历史传记中记载的文明始祖、远古神话、民族英雄等，也包括物质载体承载的民族文化记忆，如各类文物、古迹、遗迹、遗址等。这些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丰富文化资源。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与数字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载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资源数字化开发的重要参与方。公共管理部门要出台积极政策鼓励数字平台的文化产品创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与饮食资源等进行视觉产品转化。公共管理部门要引导数字平台开展热门 IP 资源的合作性开发，对广为流传、民众熟知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资源进行诸如动漫、电影、短视频等形式的多样态转化。公共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掘长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数字搜索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不同类型平台的优势资源，对优秀文化产品进行开发、推广与宣介，培育受众群体对有关文化产品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激活社会大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意识与文化意识。

（四）认知能力的塑造：引导数字用户感知算法，培育数字用户自律意识

其一，激活数字用户的智能算法感知，增强对算法风险的自主抵御能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算法应用场景中，有必要提升数字用户对智能算法的感知能力，增强其对智能算法生成的隐性意识形态风险的抵御能力。数字用户对智能算法的感知能力，包含了概念感知、数据感知、功能感知与风险感知等四个方面^[41]。概念感知即数字用户对算法相关基本概念的认知与理解，这可以通过算法基础知识的普及来实现。概念认知是数字用户算法感知的基本前提，能够有效祛魅智能算法的神秘性技术外观，让受众形成对智能算法的基本认识。数据感知指对数字用户虚拟化生存实践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中的数据痕迹采集的具体认识。大数据技术在何种前提下采集用户数据是合理合规的, 用户数据的流向会对受众的虚拟生存产生何种影响, 都是用户应当具备的算法素养。数据感知能力将使用户形成对算法风险的心理预期, 增强对算法风险的警惕性。功能感知是指对智能算法运行机制诸环节的具体认识。算法模型的建构与训练、用户画像的生成与应用、算法信息的匹配与分发等, 均是数字用户在具备基本算法素养后应深入了解的算法知识。功能感知将增强数字用户对智能算法运行原理的领悟。风险感知提供了关于智能算法技术性风险的具体认知。在建立数据收集、工作机制、实现功能等方面用户感知的基础上, 算法风险的原理解构将会水到渠成, 算法的隐性意识形态风险会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受众对算法风险的显性感知将有效提升其抵御智能算法价值规训的能力。

其二, 培育数字用户的自律意识, 增强对驳杂数字信息的自主过滤能力。智能算法基于受众心理体验的信息匹配机制, 将理性与客观标准置于感官刺激之下, 造就了泥沙俱下、虚实难辨的数字信息环境。情绪化的感性逻辑大行其道, 裹挟着偏颇价值的煽动信息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广泛传播。培育数字用户的自律意识, 前提在于增强受众逻辑思维与理性判断能力, 使其对信息的价值敏感性有清晰认识。尽管大多数字信息生产主体均以客观中立进行自我标榜, 但事实上“客观的理想标准是把事实和价值分离, 而这种标准最终是不能实现的”^[42]。基于辩证视角对算法信息的内在价值进行逻辑解析, 有助于数字用户系统还原客观现实, 在界分虚实与明辨是非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 系统理性的思维图式将助力数字用户更准确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 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与文明观。在具备理性思维能力的基础上, 受众要自觉抵制披挂着娱乐外衣的低质庸俗信息, “低俗不是通俗, 欲望不代表希望, 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43]。理性的逻辑思维与强大的自律意志, 将让受众破除泛娱乐化等虚假数字景观产生的感官幻象, 摆脱纯粹的感官刺激带来的数字依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中, 对泛娱乐化等价值虚无主义的破除, 能够使煽动性、情绪化的极端信息远离大众视野, 让积极正向的内容不断聚合在受众的感知环境中, 持续滋养与丰盈受众的精神世界, 推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99.
- [2]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3] 乌小花, 郝囡. 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互联网+民族团结”行动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 (4): 30-40.
- [4] 王冬丽. 网络空间铸牢各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证分析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3 (2): 26-31.
- [5] 刘博. 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力方向与传播策略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2 (6): 87-96+178.
- [6] 王林平, 高宇. 移动互联网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挑战及其应对之策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4): 169-176.
- [7] 白艳丽. 传播学视角下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析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 学版), 2022 (6): 45-51.
- [8] 庞瑜.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 关键问题与科学路径 [J]. 理论导刊, 2023 (7): 87-92.
- [9] 付科峰. 在数字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7-06 (4).
- [10] 段少帅, 武永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联网路径探析 [J].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3): 43-47.
- [11] 马惠兰. 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正向作用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 32-35.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35.
- [1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7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2).
- [14] 张利国, 于海波. 算法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多重挑战与现实应答 [J]. 民族学刊, 2023 (1): 32-41+143.
- [15] 王华华, 王永益. 局限及其规避: 智能算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运用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2): 28-36+182.
- [16] 张良, 姜凤敏. 智能媒体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J]. 江汉论坛, 2023 (4): 56-60.
- [17]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M].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3.
- [18]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 微粒社会: 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M]. 黄昆, 夏柯,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13.
- [19] 约翰·B. 汤普森.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M]. 郭世平,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14-215.
- [20] 战泓玮, 魏宝涛. 从中美贸易争端看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达——以 B 站“《新闻联播》关于中美贸易争端报道”的相关视频为考察视角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2): 43-51.
- [2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
- [22] 江小涓.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8): 4-34+204.
- [23] 卢克·多梅尔. 算法时代 [M]. 胡小悦,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33.
- [24] 凯斯·桑斯坦. 极端的人群: 群体行为的心理学 [M]. 尹宏毅, 郭彬彬,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7.
- [25] 约瑟夫·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 [M].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52.
- [26] Lang, A. The limited capacity model of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0 (1): 46-70.
- [27] 吐尔孙·艾拜. 西方涉疆“强迫劳动”谬论演变与中国应对策略——基于 2018—2022 年 13 家海外媒体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78-90.
- [28] 斯蒂芬·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代转向 [M]. 陈刚,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10.
-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281.
- [30] 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
- [31] 李丽, 童静静. 数字时代的网络公共空间: 泛娱乐化危机及其教育治理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 (8): 49-56.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93-107.

- [32] 张恂, 吕立志. 祛魅与消解: 网络泛娱乐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 (6): 72-76.
-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9.
-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53.
- [35] 王敬欣, 贾丽萍, 黄培培, 等. 情绪场景图片的注意偏向: 眼动研究 [J]. 心理科学, 2014 (6): 1291-1295.
- [36] 张梓琪. 移动互联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研究 [D].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2022.
- [37]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22.
- [38] 郁有凯. 网络民族主义图像化的出场、生成与应对 [J]. 探索, 2021 (4): 177-188.
- [39]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4月19日) [N]. 人民日报, 2016-04-26 (1).
-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71.
- [41] 刘静, 孙国焯, 吴丹. 数字原住民算法感知及作用机制研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3 (3): 80-87.
- [42] 大卫·克罗图, 威廉·霍伊尼斯. 媒介·社会: 产业、形象与受众 [M]. 丘陵,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60.
- [43]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 [N]. 人民日报, 2015-10-15 (1).

责任编辑: 龚静阳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如何“去窄化”？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朱尉 汪喆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生群体能否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根据“物理—社会—精神”教育空间理论，设计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访谈内容，采用扎根理论选取原始样本开展半结构式访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实质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调研结果显示：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空间中，存在以“适应—内生教育”为核心的关系范畴。“适应—内生教育”是一种动态转变的教育过程，表现为个体伴随教育环境的改变，不断调适自我的心理认知与发展需要，从而实现被动适应向主动适应的心理转变。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受“现代性隐忧”的影响，出现主体选择、内涵理解、平台搭建方面的“窄化”问题。对此，我国应注重挖掘意义符号、拓宽网络平台，贯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6.009

作者简介：朱尉，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喆，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研究”（2022A168）；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课题“陕西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效性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2023HZ0582）；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课题“陕西省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效果研究”（23ZD02）

引用格式：朱尉，汪喆.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去窄化”？——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108-125.

通“适应教育”的“物质—认知”空间, 实现教学资源的“去窄化”; 明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关系、开展“双向铸牢”的教育实践、打造“大一中一小”教育的纵向衔接以及“家—校—社”横向协同的合作模式, 破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辐射力不足以及家庭教育“失位”问题, 衔接“内生教育”的“认知—情感”空间, 实现该项教育实践“去窄化”。当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去窄化”实践, 不能只局限于高校视域, 而应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推进这项实践。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 窄化; 扎根理论; 民族团结进步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3)06-0108-1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聚焦我国多民族的国情与现实, 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所有工作要向他聚焦”^[1], 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作出原创性阐释。学校作为教育体系联动的中心点, 始终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 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近年来, 教育部有关工作要点指出: “要指导高校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3], 要“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中小学德育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紧密融合”^[4]。2023年10月12日, 国家民委召开专题会议, 要求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委属高校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 高度强调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培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人才, 转型升级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综合大学的重要地位^[5]。2023年10月24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指明了爱国主义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紧密结合的关系^[6], 强调了国家在促进各民族“三交”、增进“五个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意义^[7]。可见, 国家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大有可为, 亦需大有作为^[8]。

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 当前学术界以此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丰硕成果。学术界对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研究, 大致有三种类型。

其一, 在整体性研究视角方面, 学者们集中围绕“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展开, 系统剖析当前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的有效性。有学者从民族教育政策执行角度, 解释了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政策执行环境、民族社会文化等如何影响学生的民族认同^[9]。有学者运用系统思维, 聚焦教育渠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师教育能力、学生学习积极性^[10]等环节, 或是从教育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的整体关联与构建^[11]来探索如何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机制^[12]。

其二, 在专题化的学科视角方面, 学者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行专题研究, 重点开展学科理论构建的可行性分析。立足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 学者判断出大学阶段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期^[13]，可以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活动的话语支持体系与公共参与的行为自觉^[14]。学者从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16]的逻辑关联中，发现可以从协同育人理论^[17]、多元文化整合教育^[18]、文化共生观^[19]、跨文化视域^[20]等角度，开展形势教育、基本国情教育与历史教育^[21]。学者认为应将“五个认同”教育作为框范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22-23]，不断促进学生意识三态观^[24]、历史观^[25]的发展。运用政治心理学^[26]，从心理空间的生产、延伸、让渡以及规训^[27]，情感认同发展^[28]等方面，学者们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知、情感与人格方面的理论契合性和逻辑自洽性。

其三，在主体或地域研究视角方面，学者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行类别化研究，根据教育中的个体性特征分类施策。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多元主体，学者依据主体间性视阈^[29]、后主体性^[30]等理论，致力于提升高校教师素养^[31]、促进师生共同发展，实现个体、社会、国家的一体化连接。从地域视角，学者多围绕新疆^[32]、西藏^[33-34]等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开研究。也有学者结合主体与地域视角，分析我国东部地区汉族学生的族际交往态度^[35]、内地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方面的现实困境^[3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本内涵、时代价值、优化路径等方面成果丰硕。但现有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涉及影响因素之间关系以及发生机理的论述不多。关于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研究，缺乏立足学生视角考察主体感受与效果评价。因此，本研究拟在探究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空间提出优化措施。

二、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整体上，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见表 1^[37]）：

在资料收集上，采取半开放式访谈法。由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尚无成熟的理论假说和测量量表，且基于人员的复杂性、流动性和教育的长期性、潜在性等特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影响因素较难确定。因此，本文首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教育空间生产理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划分为“物理—社会—精神”空间三个维度。其次，以此维度设定相关题项构成半开放式访谈提纲。最后，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在自然条件下对来自不同省份的 61 名高校学生进行时长 20~30 分钟的访谈（部分样本见表 2）。

在资料分析方面，本研究采取改造过的经典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对转录的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扎根理论以“一切都是数据”（All is data）为原则，融入量化研究思维和方法，承认理论的客观性，关注建构理论与客观理论的对比、场景与数据的互动，使研究过程具有可追溯性，研究程序具有可重复性，研究结论具有可验证性^{[37] 65-77}。

表 1 经典扎根理论中不同类型的编码

编码类型		描述	目的
实质性编码	开放性	初级编码: 捕捉正在发生的事情 分析编码: 概念化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数据中识别产生一个或多个概念的事件
	选择性	围绕核心类别进行编码	识别核心类别的属性和维度
理论性编码		进行编码, 以建立核心类别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生成和整合理论

表 2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编号	生源地	民族	专业	年级
S-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汉族	文史类	大二
S-02	青海	回族	理工类	研二
A-01	陕西	满族	文史类	大一
W-0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哈萨克族	理工类	大三
W-02	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族	文史类	预科
G-01	河南	汉族	理工类	研一
Y-01	浙江	土家族	理工类	大三
Z-0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族	文史类	大二
M-01	西藏自治区	藏族	文史类	大四
X-01	广东	汉族	艺体类	大一

(一) 实质性编码

首先, 进行逐级编码概念化和抽象化, 对数据进行无差别的开放性编码, 在比较异同、合并同属中, 将相似的实践或活动归为同一类属, 得出概念和范畴, 为建构理论奠定基础。其次, 不断比较编码, 直到出现核心范畴。最后, 对预留的未编码样本进行选择性的编码, 比对是否出现新编码, 观察选取的样本是否达到饱和。至此, 完成实质性编码(如表 3、表 4)。

核心范畴具有核心性与相关性, 与其他数据及其属性有明显关联; 具有解释性, 能够频繁出现, 需较长时间达到饱和, 能阐释其他范畴意义; 是研究问题的一个维度, 要求在程度、维度和类型等方面差异巨大^[38-39]。基于此, 分析六个范畴发现“适应—内生教育”与其他范畴均存在逻辑关联: “从小到大的教育”“自小以来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方面”等词频繁出现且归类为“适应—内生教育”。“适应—内生教育”在多向度上与“个体发展需要”“教育环境支持”以及围绕课堂教学的教育空间等范畴产生较为稳定的关系。“适应—内生教育”是一种动态转变的教育过程, 表现为个体伴随教育环境的改变, 不断调适自我的心理认知与发展需要, 从而实现被动适应向主动适应的心理转变。在学校教育空间的支持下, 个体的认知结构、情感体验、生活行为与学习内驱力等, 能够促进个体心理实现由主动适应向内化感知的深层次变化。因此, 本文确定“适应—内生教育”为核心范畴。

表 3 访谈资料的开放性编码举例分析

代表性原始话语	概念化	初始范畴	范畴化	范畴类属
<p>在新疆,从小到大(a14)能够明显感觉到这种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贯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a1)。在文化方面体现最强(a2),就民族关系来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是越来越密切(a3)。……</p> <p>共同体意识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因为我们从秦朝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延续下来的(a10)。……</p>	<p>a1 地区氛围感知(长期性、常态化)</p> <p>a2 民族文化感知</p> <p>a3 民族交往感知……</p> <p>a10 民族历史感知……</p>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p>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全民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不能因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产生隔阂(a11)。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搞民族分裂,也不能仇视任何民族(a12)。……</p> <p>是属于我们民族自豪感以及自信心的一种体现,然后也算是我们一种优越性的表现(a13)。……</p>	<p>a11 接受民族差异</p> <p>a12 拒绝民族分裂</p> <p>a13 民族自豪感与优越感</p> <p>……</p>	<p>A1 场域认同影响</p> <p>A2 民族文化认同</p> <p>A3 民族历史感染</p> <p>A4 民族情感凝聚</p>		
<p>自小以来(a14)就接受了民族团结教育,已经明确厚植了这样的一个意识(a14)。……</p>	<p>a14 适应性教育(长期性、针对性、无意识性、常态化)</p> <p>……</p>	<p>A5 党的领导认同</p> <p>A6 社会发展认知</p>		
<p>集中统一于党的领导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全民族团结的共识。党的领导人以极强的组织领导力,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就(a19)。……</p>	<p>a19 党的领导作用</p>		适应—内生教育	物理因素
<p>中华民族一共由 56 个民族构成。不论是哪个民族都是华夏民族,尽管大家的外貌、习俗不同,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生活在一个大致一样的环境,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a21)。……</p>	<p>a21 社会发展认知(国家目标的理解)</p>			社会因素
<p>希望同学以一种非常直接的形式向我们介绍自己民族,以更好促进民族间交流、交往和交融(a28)。包括像我们学校参军入伍的学生,有很多都是少数民族,来自新疆或者其他地方,他们很优秀,退伍返校之后都很好,而且他们有很多特长。例如我们的足球队,40%都是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有自己的特长,为什么不提供给他们一样的平台?(a30)</p>	<p>a28 民族文化展示平台</p> <p>a30 专业能力发展平台</p>	<p>A8 发展平台建设</p>	教育环境支撑	精神因素
<p>除了课堂授课以外,我经常通过微博、抖音、青年大学习、学习强国等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a35)。……</p>	<p>a35 媒介使用</p>	<p>A9 媒介使用倾向</p>	人才培养	
<p>在学校组织下,我们参观了抗日战争历史博物馆(a8)。……</p> <p>经常会谈到,我感觉在每一个专题里面,例如依法治国等,感觉整个授课中都会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a17)。……</p> <p>感觉老师大多讲得比较笼统,反复强调,却没有进行具体分析。这就导致我只知道老师上课提过,但是具体是怎样讲的、讲的什么、已然不记得了(a21)。专业课的话:虽然我是社会学专业,但是因为这个话题感觉比较敏感,不太接触这方面</p>	<p>a8 学校实践教育</p> <p>……</p> <p>a17 课堂内容突出</p> <p>……</p> <p>a21 相关内容以理论灌输为主</p> <p>a22 专业课程学习侧重点不同</p> <p>a39 教师适配度</p> <p>a40 民族教育管理</p>	<p>A10 人才队伍建设</p> <p>A11 课堂教学方式</p> <p>A12 课程教育模式</p> <p>A13 生活环境建设</p>	<p>教育安排</p> <p>教育评估</p>	

代表性原始话语	概念化	初始范畴	范畴化	范畴类属
<p>内容 (a22)。……</p> <p>2022 年才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配齐了我们的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 之前一直是人员不太饱和的状态 (a39)。</p> <p>“1+1”双辅导制度, 学院辅导员和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联合管理、培养少数民族学生 (a40)。……我们会针对这一个名词进行专题性的课程讲解, 小组讨论汇报 (a46)。因为课堂中有少数民族同学, 以互动的方式让少数民族同学介绍自己的民族。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清晰地理解名词, 在课本中老师教的时候, 就可以让大家明白 (a48)。</p> <p>《近现代史纲要》, 老师讲课的过程中会给我们提及民族故事。……</p> <p>上课时候有相关内容涉及,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基础》的知识讲解中会选择有关事例为支撑材料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a51-a67)。……</p> <p>《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 对我们少数民族学生而言, 是既定知识, 没有特别感受 (a56)。……</p> <p>“丝路文化节”、系列活动、主题征文、民族服装食品歌唱路演等, 周期一个月; 新生入学后 10—12 月 (a84)。</p>	<p>模式</p> <p>……</p> <p>a46 课堂教学方式 (专题讲解、小组汇报)</p> <p>a48 教师课堂引导 (反复强调民族知识重点、以民族生作为举证材料)</p> <p>a51-67 思政主干课程教育、党课教育</p> <p>a56 少数民族学生专门的民族课程教育</p> <p>……</p> <p>a84 校园民族文化活动</p> <p>……</p>	<p>A14 文化环境建设</p> <p>A15 朋辈群体影响</p>		
<p>我们教育面向部分少数民族学生,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让教育面向更多类型的学生 (a1)。</p> <p>目前没有从整体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行评估 (a2)。</p> <p>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门课程与读本 (a3)。</p> <p>我们学院基本没有普及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 (a4)。</p> <p>在学校呆了近一年, 目前没有民族文化节和民族团结月活动 (a5)。</p> <p>我们接触的少数民族学生挺多的, 他们中有的会进行一些有特点的宗教活动, 有坚持一直做的 (a6)。</p> <p>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课基础不太好, 帮扶效果不佳 (a7)。</p> <p>有一种明确的师生之间区隔在 (a8)。</p> <p>我觉得整个的宣传也好, 氛围也好, 外部环境支持有待加强 (a9)。</p> <p>我觉得可能这种比较官方或者说和我们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a10)。</p> <p>传播的目的性和政治性太强 (a11)。</p> <p>大部分学校已经没有这样的场域……学生都很少愿意穿上自己民族服装去展示……可能现在学校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氛围 (a12)。</p>	<p>a1 过度关注特定民族生</p> <p>a2 教育、教学评估体系设计</p> <p>a3 铸牢教育专门课程、读本设置问题</p> <p>a4 铸牢教育工作开展不到位</p> <p>a5 民族文化活动宣传范围有限</p> <p>a6 宗教文化影响学校管理</p> <p>a7 帮扶效果不明显</p> <p>a8 师生交往距离</p> <p>a9 铸牢意识环境支撑乏力</p> <p>a10 专业化解读</p> <p>a11 传播亲和力不足、渗透力不强</p> <p>a12 族际交往环境支持</p>	<p>A1 教育面向</p> <p>A2 教育辐射</p> <p>A3 教育重视</p> <p>A4 政策支撑</p> <p>A5 交往意愿</p> <p>A6 学习力差</p> <p>A7 文化接触</p> <p>A8 理论阐释</p>	<p>物理因素</p> <p>社会因素</p> <p>精神因素</p>	

表 4 访谈资料的选择性编码分析

主范畴	初始范畴	范畴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场域认同	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大学生，能够结合个体成长经历理解多民族空间格局的发展与演变
	民族文化认同	大学生能够肯定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
	民族历史感染	大学生能够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准确地认识、理解、看待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40]
	民族情感凝聚	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依恋感、凝聚感、秉持感与维护感
	党的领导认同	大学生能够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社会发展认知	大学生对社会发展的认知程度、评价倾向以及未来感知
教育环境支持	发展平台建设	与大学生教育、学习、竞赛、就业等紧密相关的平台建设
	生活环境建设	与大学生紧密相关的宿舍、教室环境、校园、家庭、社会等空间场域的设置
	文化环境建设	与大学生紧密相关的场域中对民族团结文化氛围的布置
适应-内生教育	适应性教育	大学生通过感知校园的文化环境、民族氛围，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教育
	内生性教育	大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参与民族文化活动，在感知民族团结氛围中主动进行自我教育
人才培养	人才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的适配度；学生干部群体的培养计划
	朋辈群体影响	大学生彼此之间的生活、教育的影响作用
教育安排	课堂教学方式	在具体授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无结合不同教学方式、教学模式的优劣，有无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
	教材使用情况	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程中教材选择的原则、教材普及的范围、具体运用的方式等情况 ^[41-42]
教育评估	教育面向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关课程的具体安排、人员选择和教材使用
	教育评估	评估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中不同教育主体的行动和表现
	教育辐射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对不同学段、不同社会主体产生影响，以及高校教育有无与各教育主体进行有机联动
	教育重视	高校能否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统筹协调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理论阐释	教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方式，以及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程度
个体发展需要	交往意愿	针对不同民族大学生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性高低、行为主动与否
	学习力差	不同民族大学生之间差异化的学习接受程度
	文化接触	大学生由于共同的学习生活的接触而在彼此之间产生的对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联系的需要

(二) 绘制“认知地图”

围绕“适应—内生教育”这个核心范畴，建立两条扎根理论（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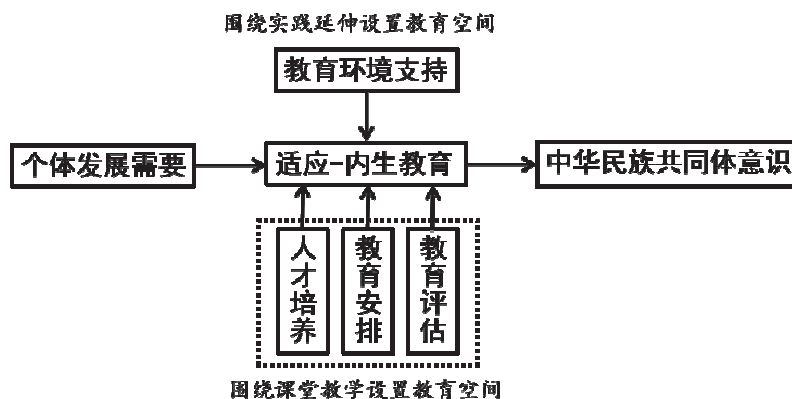


图 1 主类属间逻辑关系结构图

“个体发展需要”是促成“教化”向“内化”转变的态度因素，决定了“适应—内生教育”能否促成个体生成、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环境支持”与课堂教学体系的搭建，作为外界条件对个体“适应—内生教育”产生影响，促成学生教育接受力与内驱力的变化，对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起调节作用。

图 1 所表示的各主类属间的逻辑关系为：围绕实践延伸设置教育空间的“教育环境支持”与围绕课堂教学设置教育空间的“人才培养”“教育安排”和“教育评估”的主范畴，影响并调节“个体发展需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关系的强度。“学习力差”“交往意愿”“文化接触”等“个体发展需要”均属于表象，而教育生活场域、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社会政治氛围等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是症结所在，会对个体产生程度不一的心理限制，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

(三) 理论性编码

理论性编码发生在核心类别和相关概念理论饱和的基础上，即实质性编码完成的阶段。理论性编码将核心类别和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建模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是编码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负责理论整体生成^{[37] 115-117}。

因此，本次研究预留了 1/4 的访谈记录，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方法是：对预留的访谈记录进行实质性编码（开放性编码、不断比较、核心范畴出现、选择性编码），之后观察是否出现新的概念；若无，则判断出该模型的范畴已达到饱和状态。通过检验，尚未出现新的概念和范畴，说明影响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范畴已发展充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见图 2）的理论性已达到饱和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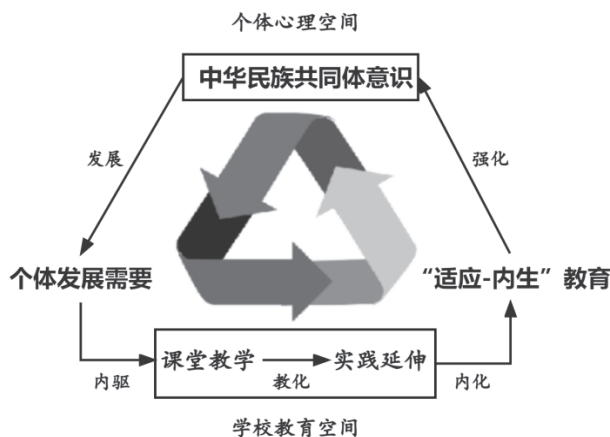


图 2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

三、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窄化”的归因分析

本次调研从学生发展、学校教育教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环境三个方面，关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涵盖微观（家庭、自我教育），中观（教育、教学活动规划与管理）和宏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政策理解、运用等）的教育表现，分析得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质量、水平及变化状况。

总体而言，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状况良好。特别是在高校教育空间中，多民族学生混宿、混班的安排，便于学生拥有更多机会与不同民族的同学进行交往、交流与交融，高校学生已具备较高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显示，不论是民族院校，还是非民族院校；不论是公办院校，还是民办院校，都能充分利用“一站式”学生社区，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载体。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混住、共学的安排，可以为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机会，使各族学生在朝夕相处中不断增进情感、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在“你是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问中，学生多以“一体（个）”“不可分割”等词语表达出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认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等具有政治倾向的词语，传达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但同时，调研发现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存在教育面向有限、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教育辐射力有限等问题，总结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窄化”情况。

（一）什么是“窄化”的教育？

查尔斯·泰勒曾总结出现代性的三种隐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丧失^[43]。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现代性隐忧”日渐向教育领域蔓延，尤其是个人主义的扩散与异化，造成个体以自我为中心，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教育价值与自我专注形成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宰制，造成了知性教育成为主导形势，实践教育日益丧失地位，并沦为知性教育的附庸，甚至出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理性话语结构失衡^[4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现代性隐忧”的影响，出现“窄化”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窄化”，从本质上讲既是对铸牢对象

全面性地误读, 也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联动性的机械解读。

本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窄化”定义为: 在“现代性隐忧”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以目的为导向, 通过可视化实践、确切性知识生产, 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重点教育, 并出现了教育主体与主体内部之间联系区隔的问题。下文从主体选择、内涵理解、平台搭建方面对“窄化”进行分析。

在主体选择上,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重民族生轻汉族生”以及“重特定民族生轻其他民族生”的不足。有教师认为, “我们可能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新疆籍的少数民族学生身上, 并没有注意到其他民族学生的成长环境……”。从备受关注的民族生视角而言, 有的受访学生认为: “‘特别的’关注, 让我有些许不适。实际上, 我觉得我们已经平等, 无需过度关注。”整体而言, 生际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考量比重不一致的问题。

在内涵理解上, 以课本知识为主, 延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 是在课堂教学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常规方式。在传统的“教一学”主客体教育模式的规制下, 有受访学生认为, “(课堂教学)比较官方, 和我们的距离比较远”; 有受访教师认为, “缺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门教材, 课堂难以把握”。这些问题造成了师生以片面的学科知识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相对抽象的概念, 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的窄化。在实践教育环节, 部分高校存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理解为表面化的文化活动。在具体实践中, 规范的组织机制、细化的实践活动以及可行的考核方法的缺乏, 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活动形式和组织方式上出现窄化。

在平台搭建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活动开展存在平台窄化的问题。从活动设计角度,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重视度不够的问题。有受访学生表示: “在学校待了近一年, 目前没有民族文化节和民族团结月。”从参与者角度,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辐射力有限的问题。有受访学生说: “学校这方面(民族团结的校园活动)比较薄弱, 这类活动的重点更偏向于少数民族学生, 且(路演)具有选拔性, 我们(汉族生)一直没有入选。”

(二)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什么会“窄化”?

据材料分析,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存在渗透性、融合性、联动性不强的问题。一方面,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脱节, 教师多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机械的理论灌输。另一方面, 一体化协同育人机制的缺失, 学校、家庭和社会出现“各自为营”, 或是在社会功能链中出现断裂, 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出现分散化、浅表化和窄化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既需要漫灌式的理论引导, 又需要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式的理论浸润^[45]。因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理论灌输与实践启发的统一中, 帮助学生从适应教育转变为内生教育。

第一, 学校资源的低效化利用, 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物理空间相对缺失可感载体。学校教育空间以“物质性”为本质特征^[46], 承载了多元教学需要的教育资源与教学现象, 能够为师生共同发展、生生融合发展提供场域保障。“教育环境支持”以学校的文化环境建设为主, 由教育者与管理者进行管理和把握, 多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 满足个体发展和情感变化的需要。

调研发现,高校物理空间承载象征符号的教学资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之间存在契合度不高、联结性不强等问题。物理空间作为一切外部直观的、基础的、必然的、前验的表象^[47],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具体指向。但是,在教师实际教学中,学校凝固的物质层、学生现实可感的文化精神载体,却不能以直接的教育形式帮助学生实现“感知—认知—体验—内化”的认同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感知”与“认知”之间出现断层,校园政治文化象征符号不能实现教育层面的跃升,不能成为隐性教育的可感实体。

第二,教育受众的片面化选择,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社会空间出现交往区隔。“个体发展需要”内含了“文化接触”“交往意愿”“学习力差”等需要,由“需要”发展“关系”,是社会空间的构建必然。社会空间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一环,承载了教育空间中个体对各种社会关系交往的需要。它既指明对“教育环境支持”的物理空间的需要,又强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空间的需要,成为两者的中介,对维系个体与社会的同向共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访谈反映,在“教育环境支持”的物质支持下,出现以“师—生”“民族生—汉族生”等不同身份类属的交叉交往现象。然而,在互动交往中,高校在全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出现认知偏差,“双向铸牢”不足问题明显。部分高校有意识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但该课程只针对民族生开设,且多设置在预科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第一课堂尚未实现全员和全过程育人。此外,校园文化活动方面,学生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的了解程度仅处在“听说过”层面,真正“参与”的只是少数,且活动对象多倾向民族生。总体而言,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只强调、只面向民族生的问题^[48],系统性的民族教育在学生的全过程教育中仍处于缺位状态。教育实践活动的辐射力、教育的影响力同样存在不足。总体而言,全员育人和全过程育人还存在改善的空间。

第三,施教主体的分散化行动,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精神空间出现情感断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教育发展的关键一环,在学生情感体悟与内化过程中作用明显。由“教育环境支持”的物理空间,通过“适应—内生教育”的转变,构筑起学生对交往场域、历史文化、国家发展等方面认同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弥合“个体发展需要”中出现的问题,达成社会空间中群体价值取向的融合、情感升华,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显示,学生从学校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获得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教化”层面的认知,难以在精神空间实现“内化”的情感升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断点。在教化主体方面,目前各主体存在“各自为营”的倾向。特别是在民族生的家庭教育中,其过多强调文化差异性,凸显了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忽略。此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顶层设计的均衡性、形式编排的吸引力、范围辐射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流于形式”“活动局限”“被动交往”等负面评价。究其本质,以高校为阵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尚未形成较强的辐射力与影响力,若单靠知识灌输,难以形成自我同一性,情感内化存在困境。

四、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去窄化”的路径

根据列斐伏尔“物理—社会—精神”空间的对应关系,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形成

“教育环境支持”的物理空间,“个体发展需要”的社会空间,以及在精神空间中情感的升华,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之源。在高校教育语境,“物理—社会—精神”空间形成了以象征符号建构的物质空间、以教育体系建构的认知空间、以交往实践建构的情感空间,营造了“适应—内生教育”的内、外部教育空间。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去窄化”实践,即通过教学资源与教育实践,不断丰富物理空间的可感载体,减少社会空间的交往区隔以及精神空间的情感断点,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适应—内生教育”空间。

(一) 教学资源“去窄化”:合理配置资源,贯通“适应教育”的“物质—认知”空间

教学资源作为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物理空间的物质媒介,能够在直接与间接有感中提升学生对抽象关联的深层感知,为“适应教育”提供可感的物质实体。

1. 挖掘意义符号,以象征打造“适应教育”的物质空间

象征种类繁多,从功能导向视角对高校已有的象征进行归类,可将其分为统合性象征、表达性象征、强化性象征等^[49]。

以统合性象征实现国家意志的具象表达。国旗作为统合性象征的代表,是民族、国家整体意志的象征物,是整合各族师生、凝聚情感共识的中心象征。教育者可将国旗的颜色、五角星所蕴含的国家形象、民族精神与“四个与共”的抽象意义进行迁移。我们不仅要从国旗现实表征的直接感知层面帮助学生获取信息,还须对“先有感念”即中国革命历程的原有意识进行再加工,以“四个与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内涵进行阐释^[50],深层次指引学生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意义,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表达性象征传递共同发展的美好寓意。“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象描绘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状态。石榴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本体上,石榴与石榴籽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喻体上,“紧密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夙愿与历史传统,更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要素。“中华民族”作为上位概念,是“石榴”;“汉族”和“少数民族”作为下位概念,是“石榴籽”。剖析“石榴”,旨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开创者,是“石榴”的培育人,隐喻党的领导之关键。此番阐释可以帮助学生具象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加深对党、“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认同。

以强化性象征促进节日仪式的政治强化。节日纪念、仪式活动是强化性象征的主要途径。高校常态化开展纪念活动,将民族集体记忆作为教育资源,实现了记忆的代际传播,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八一事变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被时间赋予了特殊的民族与政治象征意义^[51],是能够作为教学素材,帮助教育者串联“五个认同”的政治逻辑。仪式纪念可以将具身实践与学理认知结合,帮助学生明确党领导中华民族在历经民族苦难、建立国家、创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沿革,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实现过去与现在、情感与现实的联系。

2. 共享教育资源,借网络拓宽“适应教育”的认知空间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来看,社会化媒介可以启发学生思维感知,拓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空间^[52]。

第一,借助数字化平台,盘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文化构成主体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丰富内涵，能够整合成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要对大量的数字文化资源进行归属，精准推出系列文化活动，有针对性地建设高质量的数字化文化教育集成基地。数字化平台可以在赓续中华文脉、高扬文化自信的主旋律中，配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教育学习，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诋毁中国的妄言，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高校要合理运用中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平台，结合“五史”教育，实现从文化心理归属的形塑走向共同体意识铸牢的价值论证，发挥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基质作用^[53]。

第二，围绕课程教学，搭建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技术入侵，抢占网络制高点刻不容缓。网络是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最大增量，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54]。高校应基本形成普惠全学段、全体学生阶段性教学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线上教育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开辟数字化发展频道。要解决网络资源与教学实际融合应用的问题，构建覆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和各教材版本的学科课程资源体系。要发挥头部院校、特别是民委委属院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不断丰富“云课堂”建设，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为其他各类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示范，着力解决教育教学“无抓手”“无参照”的问题。

（二）教育实践“去窄化”：聚焦教育交往，衔接“内生教育”的“认知—情感”空间

教育实践涉及教育主体、教育过程、教育布局等方面。首先，需明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主线目标、课程教学中的关联，找准教育教学定位，提高教育者在学理层面的把握度。其次，在教育主体与教育过程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以思政课程为引领，面向全员，辅以课程思政的渗透，有效融入实践课程，实现“理论—实践”“汉族生—民族生”的“双向铸牢”。再次，在教育布局中，要以高校为教育示范高地，着力打造教育工作的“大一中一小”纵向衔接以及“家—校—社”横向协同的合作模式，全过程、全方位聚焦教育交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同频共振：明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关系

目前部分高校存在不清楚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间的关系、在课堂中不清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讲什么的问题^[55]。

从主线目标来看，《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指明了两者的关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立足“多元”强调“团结”，是对各民族群众提出的实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立足“一体”强调“团结”，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提出的应然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之间的叠合性关系，提出了向“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聚焦的要求。在这一要求中，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有效手段，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任务。

从课程教学来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立足民族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形塑国家观；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则直接立足国家观，贯通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等，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要内容、辅以“五史”教育为素材,多层次开展教育。教育者要从学理视角讲清国家、党与人民之间的逻辑关系,帮助学生梳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内涵意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关系,培养学生对党、国家的认同,树立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此外,教育者要密切关注时事与学生的思想动态,谨防“三股势力”入侵思想舆论阵地、侵蚀学生的理想信念。因此,教育者要在教育交往中,通过话语建构与理论灌输,进行生活化教育,不断强化学生的共同体意识。

2. “双向铸牢”: “理论—实践”与“汉族生—民族生”的同向教育

第一,调整课程结构,增加实践课程,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融合。探索以课堂教学为依托的认知实践,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课堂讲授、讨论、讲座等认知教学,灌输民族理论与政策,拓宽学生“认知空间”。探索以课外活动为依托的操作实践,借助“互联网+”“挑战杯”等科研创新平台,鼓励学生深入基层,对民族工作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围绕“三项计划”,构建互嵌式“社会—高校”实践教育联系网。在研学实践中,各族学生通过主题交流、社会实践交流,“手拉手、结对子”帮扶交流等活动,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类型多样的实践活动可以缓解学校在活动安排方面平台有限的问题。

第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综合改革。教学综合改革要加强思政课程的正面引领和课程思政的全面渗透。要提高《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政治站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要从课程教学规划入手,扩大课程普及范围,将其纳入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切实做到全员学习。选择相关教材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中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有效发挥教材的启智增慧作用。在课程思政方面,不仅要重点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试讲、试用工作,还要重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相近学科和课程的教学。要以增进共同性为原则,推动属性相近的学科形成相互支撑、互为补充、共同参与的多学科内涵挖掘格局,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横向迁移。要抓准学科教学知识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契合点,明确学科教学在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等方面的解读。要在增进共同性、把握差异性的前提下,突出学科课程的核心内容,积极引导明确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民族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帮助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自觉将个人发展与中华民族、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学科教学与“四个与共”教育的纵向迁移学习。

3. 一体化教育: “大一—中—小”全过程贴合学段教育

第一,在学段教育设计环节,要贯通课程。高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示范高地,要根据各学段学生学情特点进行系统规制,在内容衔接与主题升华中有效增进教育实效。小学阶段要注意学生由具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变期,教育者要合理运用国旗、国徽等政治符号,从国籍、民族类别方面,引导学生初步认识“国家”“民族”概念,树立身份意识。小学高年级与中学阶段,学生抽象思维不断发展,教育者可以结合班、队、团课,以专题教学、实践活动等方式,围绕“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历史文化、精神延续、革命领导等方面,抽象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发展与领导传统,纵深发展学生的民族观、文化观、国家观等。大学阶段作为

抽象思维成熟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日渐成熟,教育者应注意运用理性批判,培养学生研究思维与自主学习能力;以问题为导向,教育者通过剖析有关时政热点、开展学术理论阐释,辨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出现的现实症候,不断深化“五个认同”。

第二,在教学问题把脉环节,要融通教学、联通教材、打通队伍。高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牵头,联系各学段、各学科教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同课异构”活动。由此,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的断点与偏差,或是同学段知识点的前后断裂,或是不同学段的上下断裂,继而可以解决教学重点的理解偏差、教学效果有限等问题。在教学研讨环节,以高校思政教师团队、学科教研员、各科教师进行“手拉手”对话,针对思政课程,对标《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凝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逻辑。从“异”入手,寻求各学段教师在教材分析、教学设计等方面的差异性特征,破解学术界在“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难题,推动教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针对课程思政,高校思政教研团队要为一线教师提供智力支持,解答学科教师在开展思政教育中遇到的难题,兼顾社科与自科,从跨学科、多学科视角,凸显学科特色,进行针对性教学,推进课程育人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4. 破解短板:优化家庭教育在“家—校—社”协作体系中的整体效能

调查显示,家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程度是影响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基石,其通过生活化的教育内容、情感化的教育方式,发挥潜移默化教育作用,可以激发学生“内化教育”的驱动力。

第一,学校、社会发力,护航民族生可持续发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生活水平、教育程度等家庭因素,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显著影响^[56]。因此,在“家—校”教育环节,高校应引导民族生适应校园环境,通过民族文化活动的有力感召与全体学生的有效参与,不断改变民族生的被动适应感。其次,要善用同辈教育,要在互促交流中增强其认同感,推进“内生教育”。再次,学校要发挥教育优势,鼓励民族生返乡创业,服务家乡。如师范院校以“红烛”精神,激励师生投身西部教育事业,力求在铸魂育人中缩小教育差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家—社”教育环节,社会、学校与政府应利用信息化平台,合力推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讲座,让每个家庭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涵。另外,社区可设立“一站式”家庭教育服务岗,引进相关教育背景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者,普及科学的教育观与学生观,协助与指导家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断增进社区凝聚力,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示范点。

第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家文化”有效融合。“国”作为“家”的延伸,“家”是“国”的浓缩,家、国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现代化背景下,为避免家庭个体化、个体原子化,以家为视角重新反思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57]。因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文化”强调爱、团结与责任,同样适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既爱“小家”,同时也爱“大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立足“人”的视角,融入祖国河山、人文情怀,拓展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的知识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也应利用“家文化”中“团结”之于成员凝聚力的积极

作用, 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格局, 把各民族团结奋斗历史讲生动,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完整的命运、政治、经济以及历史文化共同体讲透彻^[58]。“家文化”以责任为精神内核, 各教育主体更须明确自己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责任与使命, 大力培养具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具有强烈中华民族自豪感、民族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五、结语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 必须久久为功、驰而不息。其中, 在教育实践方面考察高校如何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调查研究,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综合性。从教育地位上讲,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增强学段衔接耦合、社会主体育人目标协同等方面具有联动作用。针对现存问题, 高校要注意在教育对象、教育路径中进行“去窄化”实践, 推动形成社会多元主体的教育联动机制。当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去窄化”实践, 不能只局限于高校视域, 而应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推进这项实践。从地理空间来看, 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核心; 同时, 也必须在内地、港澳台地区持续发挥民族教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支撑性作用。从教育对象来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穿全社会、全领域的基础性工作, 因此教育对象应包括少数民族同胞、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等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教育工作既要在全员育人方面持续下功夫, 克服教育面向窄化的问题; 也要从全过程育人角度出发, 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平台, 构建与完善教育组织体系, 缓解教育平台窄化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3]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2023年工作要点 [EB/OL]. (2023-03-29) [2023-09-15]. http://www.moe.gov.cn/s78/A12/gongzuo/yaodian/202302/t20230221_1046541.html.
- [4] 教育部 2022年工作要点 [EB/OL]. (2022-02-08) [2023-09-1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64/202202/t20220208_597666.html.
- [5] 国家民委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委属高校办学治校全过程 [EB/OL]. (2023-10-12) [2023-10-19]. <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2310/1168221.shtml>.
- [6] 金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答记者问 [N]. 人民日报, 2023-10-26(2).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3-10-25(5).
- [8] 唐兴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行动逻辑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6): 28-34.
- [9] 石梦. 民族教育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 [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6.

- [10] 李芳. 高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基本问题探析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 (4): 33-40.
- [11] 江玲丽. 民族院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 [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22.
- [12] 苏晓轶.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机制构建研究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 (5): 172-176.
- [13] 陈立鹏, 张珏. 关于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几点思考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6): 143-149.
- [14] 曹能秀, 马妮萝.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融入学校教育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1): 122-131.
- [15] 钱民辉, 陈婷丽.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5): 40-47.
- [16] 韩宁, 阎占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逻辑阐释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11): 187-193.
- [17] 张利国. 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若干思考 [J]. 民族学刊, 2020 (2): 63-70.
- [18] 李红婷, 滕星. 倡导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理论依据及理论贡献 [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20 (6): 17-23.
- [19] 么加利, 付倩. 文化共生观照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1 (4): 45-53.
- [20] 武显云. 跨文化视域下民族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 [J]. 民族学刊, 2021 (7): 85-93.
- [21] 赵心愚. 教育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民族学刊, 2021 (2): 1-8.
- [22] 王延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J]. 民族研究, 2018 (1): 1-8.
- [23] 曹高丁, 青觉. 概念溯源与流变: 从构建中华民族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学术探索, 2023 (6): 116-124.
- [24] 王瑜, 马小婷, 吴艳梅. 民族地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与主要原则——基于“意识三态观”分析框架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6): 37-46.
- [25] 朱亚峰.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观教育进路研究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1 (3): 149-154.
- [26] 青觉, 王敏. 认知、情感与人格: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治心理建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6): 26-36.
- [27] 胡平, 韩宜霖. 心理空间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初探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6): 150-154.
- [28] 孙琳. 以情感认同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依据、机理与路径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2): 147-151.
- [29] 管占龙, 费艳颖. 主体间性视阈下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 (2): 45-51.
- [30] 原子茜, 袁梅. 后主体性理论视角下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2): 219-225.
- [31] 李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高校教师素质提升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1): 65-73.
- [32] 王玉刚. 新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分析与对策 [J].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0 (3): 19-22.
- [33] 马静. 西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思政资源和路径研究 [D]. 拉萨: 西藏大学, 2022.
- [34] 德吉白珍. 铸牢西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长效机制研究 [D]. 拉萨: 西藏大学, 2022.

朱尉,汪喆.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去窄化”?——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108-125.

- [35] 后慧宏, 苏德. 东部地区汉族大学生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族际交往态度影响因素的扎根理论研究[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1): 54-63.
- [36] 张军桥, 张保同. 铸牢内地高校各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1(3): 31-38.
- [37] 朱迪斯·A·霍尔顿, 伊莎贝尔·沃尔什. 经典扎根理论: 定性和定量数据的应用[M]. 王进杰, 朱明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97.
- [38] 伍威·弗里克. 扎根理论[M]. 项继发,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21: 57-58.
- [39]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334-335.
- [40] 牛锐, 李翠. 史金波: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自古有之[N]. 中国民族报, 2022-01-11(5).
- [41] 罗建河, 王重阳. 中国民族团结教育政策的历史回顾与新时代展望[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4): 45-53+182-183.
- [42] 杨敏, 陈雪龄. 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 民族学刊, 2022(12): 70-77+153.
- [43] 查尔斯·泰勒. 本真性的伦理[M]. 程炼,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3.
- [44] 季海菊.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 [45] 宋才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教育[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21(2): 7-17.
- [46] 付强, 辛晓玲. 空间社会学视域下的学校教育空间生产[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4): 74-79.
- [47]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韦卓民,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48] 支仕泽.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困境与破局策略[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174-184.
- [49] 何星亮. 象征的类型[J]. 民族研究, 2003(1): 39-47.
- [50] 郝亚明. 从五个时间节点来深刻把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4): 16-22.
- [51] 赵超, 青觉. 象征的再生产: 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6): 103-109.
- [52] 青觉, 赵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 民族教育研究, 2018(4): 5-13.
- [53] 张前, 张晓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1): 32-37.
- [54] 习近平.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 求是, 2023(18): 4-9.
- [55] 严庆. 提升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信度与效度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5-13.
- [56] 张宇峰, 方晨光. 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与培育路径[J]. 当代青年研究, 2019(3): 57-64.
- [57] 黎朝辉, 赵曼. 脱嵌与再嵌: 家文化的复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广西民族研究, 2022(5): 79-86.
- [58] 赵刚, 蒲俊焯. 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 概念、价值、内容与路径[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4): 12-18.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统一战线话语 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林华山 龚静阳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重庆 400064）

摘要：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指各类主体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和具体实践等的知识生产、认知建构及系统化表达。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需要阐明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机制，是官方、学界与社会在治理交往中建立的团结共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人类文明的共通理念，以及阐明社会变革中统一战线形态升级的未来走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历经“以团结赢得斗争”“以团结安邦定国”“以团结富国利民”“以团结强国复兴”的主题话语演进，“法宝论”与“联盟论”的枢纽话语演进，各领域的专门话语演进；在叙事上则有张贴标语、开展宣讲、发布口号，撰写诗词、成立文化社团、演出话剧，兴办媒体、发表文章，发表白皮书等多种方式。当前，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美西方对华认知战恶化外部环境、新技术的负面效应带来新变数、国内场域的统战话语叙事建设存在改进空间等困境。加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要坚持内容建设、主体协同、方式改进、健全平台、完善环境等一体推进。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内含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范式拓展和统一战线形态变革的丰富意义。一方面，它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范式从“利益分析”“组织分析”传统视角拓展至“话语分析”新视角提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6.010

作者简介：林华山，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执行主编、副编审，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龚静阳，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

基金项目：武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023年度课题重点项目“多维融通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研究”（whtz202301）

引用格式：林华山，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供了启发。另一方面, 它为信息社会统一战线形态在经历“物质的统战”“组织的统战”后向“话语的统战”复合上升创造了有力的连接, 启发面向未来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创新思路。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将日益从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 深度体现统战话语与话语统战的辩证互转。

关键词: 统一战线; 话语体系; 叙事体系; 统战话语; 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6-0126-1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构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 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 是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组织开展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教育, 把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内容, 把统一战线工作纳入宣传工作计划, 把统一战线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内容”^[2]。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给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 其中包括如何有效构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在国际上, 美西方有关国家为了遏制我国发展, 频繁在政党制度、民族宗教、民主人权和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华侨华人、海外中资企业包括主要民营企业等统一战线相关领域制造污名话语, 并借此实施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极大干扰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国内, 统一战线作为一门科学, 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相对滞后问题, 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社会话语建设仍存在互不融通现象, 社会各界对统一战线仍存在不太准确、不太全面的认知。着眼对外反对西方话语霸权、塑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对内团结全体人民、凝聚广泛力量的需要, 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这项工作事关中西方人心之争、力量之争和制度之争。

近年来, 学界对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相关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相关研究一开始主要从增强中国话语权视角关注统一战线话语问题。有研究认为, 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建设高度关联, 既处在话语权争夺的第一线, 又是争取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源泉、增强中国话语自信的重要条件、服务中国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力量^[3]。还有研究提出, 统一战线话语权是中国整体话语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4]。随着各方对中国话语问题认识的深化, 学界对统一战线话语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拓展, 开始触及统一战线话语的本体领域。有研究梳理了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来源, 认为其生成经历了以“合”为中心的革命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以“稳”为中心的建设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以“大”为中心的改革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演进历程^[5]。另有研究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统一战线的性质、构成、范围、主题、任务、特征等作出相应话语表达——革命形态的统一战线、建设形态的统一战线和治理形态的统一战线^[6]。与此同时, 有些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话语的国际维度，认为统一战线强调多样性文化的共生共荣、以文化共和为指向，蕴含着伦理共和的普遍话语资源^[7]；梳理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的具体挑战和应对举措^[8]。更多研究则在新闻传播、国际政治研究中按议题划分，重点就美西方国家在新疆、台湾、香港、西藏、人权民主等涉统一战线领域的话语干预和舆论炒作开展了案例研究。除了对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分析，统一战线话语研究文献还较多涉足历史研究，且主要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历史进行了广泛梳理。比如，有研究分析巴黎《全民月刊》促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话语实践^[9]，有研究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团结”战略叙事^[10]，还有研究以话剧《屈原》为案例分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11]。此外，一些研究立足学科角度探讨统一战线话语的建设。比如，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12]。

整体而言，鉴于美西方国家日益把统一战线作为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崛起的焦点议题，为了回应统一战线战略定位从“重要法宝”跃升为“强大法宝”的现实需要，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专业学术期刊《统一战线学研究》自 2022 年第 6 期起便连续开设“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在 2023 年 6 月召开该专题同名研讨会，组织全国多家单位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2023 年 4 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召开“统一战线与话语权构建”学术研讨会。但是，学界既有对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研究以及实务界的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构建的实践，存在“六多六少”的不足。已有相关研究和实践更多是直接使用“统一战线话语”等术语，而较少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更多着眼于对统一战线话语内容构成的梳理，较少对统一战线话语内容的叙事层面进行关联分析；更多着眼于对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梳理，较少对统一战线话语建设的现实转化进行分析；更多着眼于对国内视野下统一战线话语的梳理，较少基于国际与国内话语互动语境展开研究；更多着眼于抽象意义上的学科话语建设讨论，较少对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一体建设进行分析；更多着眼于对传统载体条件下统一战线话语叙事能力建设的分析，较少对新技术条件下统一战线话语叙事能力建设进行分析。可见，深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重点在破解上述相互割裂、贯通程度不高的问题。

本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融通”要求，以“多维融通”为核心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问题开展整体性研究。本文把统一战线话语内容生产和叙事传播相关联，把统一战线话语历史梳理和回应现实需要相结合，把统一战线话语国内建设与国际传播相统一，把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一体化建设同关照，把统一战线话语叙事的传统载体与新兴载体相融合，主要讨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基本概念、历史演进、现实挑战、建设路径等方面。本文的讨论也旨在对统一战线与新闻传播、政治传播等广泛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行尝试，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范式从“利益分析”“组织分析”传统视角拓展至“话语分析”新视角提供一定参考。

二、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概念界定

从整体与局部关系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下文简称“统一战线话语和

叙事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具体领域之一。从表达简洁考虑,“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缩写。“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概念涉及话语、叙事及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等元概念,其种属范围则是统一战线领域。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对这个概念作以下递进界定。

(一) 话语与叙事的概念发展

“话语”的原意为“言语,说的话”^[13];“叙事”的原意为“叙述事情(指书面的)”^{[13] 1471}。《现代汉语词典》界定的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与“话语”和“叙事”一开始作为语言学基本术语出场时的语义相似。语言学语境中的“话语”特指与书面文本相对应的口头语言延伸部分。类似这种情况,“叙事”概念一开始是从文艺理论中“叙述”的概念转移、发展而来。狭义的“叙事”特指书面文本的修辞、书写等。后经福柯的话语理论、热奈特的叙事理论等对这两个概念的学术拓展,“话语”和“叙事”从语言学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拥有了更为广泛、有更多附加内容的含义。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14]。福柯话语理论中的话语“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或写出的论证性话语,它不只是‘说’和‘写’的问题,而是伴随着‘说’和‘写’的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是一系列‘事件’”^[15]。经由热奈特的理论演绎,叙事概念逐步超出语言学的界定,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叙事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口语、书面语或辅之态势语、音像、图片等综合手段表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行为过程或所有具有叙事性的言语成品。”^[16]话语与叙事概念从语言学、文学领域向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拓展,使这两个概念开始具备了丰富的政治社会维度。“与语言学、叙事学着重形式的话语观相比,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的话语观则着重关注隐藏于话语深层次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17]通过前述简要梳理可发现,话语与叙事之间是一个互为存在前提、互动共生的协调整体,两者都包括“内容”和“传播”的环节——话语作为叙事的“里子”,叙事作为话语的“外衣”,两者互为一体。只不过,话语更加倾向内容生成,叙事更加倾向信息传播。

(二) 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内在联系

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以“话语”和“叙事”为基本词根,形成拓展的词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作为拓展的词组,事实上把话语与叙事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加密。这种关系加密有利于消解西方语境中话语理论、叙事理论存在的“话语”相对脱离实践、轻视物质的倾向。正如有研究认为,福柯话语理论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话语论以对表征的分析取代对在场直接经验的分析,这一转换隔断了真理、知识与主体的种种非话语实践或与现实的物质实践关系;话语与社会制度实践的关系也很薄弱^[18]。中国语境下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反映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内涵。体系即系统,话语和叙事体系即对话语和叙事的系统化。话语体系包括事实层次、逻辑层次、价值层次、表达层次的四位一体^[19],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20]。叙事体系包含“谁讲故事”(叙事者)、“讲什么故事”(文本)、“谁听故事”(接受者)、“如何讲故事”(方式)等关键环节。叙事体系是主体基于一定的逻辑和价值判断对故事、文本进行的系统表达。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互为结构:话语体系为叙事体系创设主体内容和逻辑基础,叙事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传播场域和方法支撑。

（三）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基本含义

基于对相关基础概念的梳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指各类主体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和具体实践等的知识生产、认知建构及其系统化表达。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超出统一战线自身范畴，与广泛的政治社会系统发生紧密联系。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具有以下多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大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以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制度安排和理论思想、政策实践。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需站在世界人民珍重团结、中国人民热爱团结、中国共产党善于促进团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政治秩序、治理之道高度进行认知、阐述和表达、传播。在这个层次上，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建构现代国家、开展国家治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与表达。

其二，国家治理中的“多层次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是官方、学界与社会在治理交往中建立的团结共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最核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和发展壮大统一战线，促进重要领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谐，形成了以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话语和叙事风格，构成枢纽性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进行学术分析和研究，形成专业性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统一战线实践的参与者和统战工作对象包括统战成员、所联系群众等社会主体对统一战线形成的认知与表达，构成群众性的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对政策性话语叙事、专业性话语叙事、群众性话语叙事的对接与融通，促进中国社会各部分各群体达成对大团结大联合的真正体认。

其三，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多类型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人类文明的共通理念。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强大法宝，富有中国特色，富含中国理念。同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人类社会追求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同人类社会文明存在价值通约与共识因子。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既旨在对内促进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并致力于强国复兴，也旨在对外为全人类注入合作共赢的团结理念。特别是面对美西方国家基于对霸权秩序的维护、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布局，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更承担着斗争性回应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连接着社会主义中国与充满多样性的世界，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原则，通过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为人类社会共建命运共同体作出文明层次的贡献。由此，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包括主动宣介型、回应斗争型、文明塑造型等类型，面向建设更加团结的世界。

其四，技术社会形态演进中的“新形态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在社会变革中形态升级的未来走向。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是符号的集合和传播。但是，统战工作中的话语和叙事也承担着对实践的引导功能，即相关主体发出相关话语并在不同主体间进行互动交流，各方围绕核心主体创设的话语达成共识，进而实现团结合作的目标。在前工业时代，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和通信条件的限制，统一战线的实施更多运用直接的利益照顾、人际关系调整等载体，更多表现为“物质的统战”。在工业时代，随着科层组织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实施主要依靠政治吸纳、

组织吸纳等方式, 更多表现为“组织的统战”。而在后工业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与深度发展, 技术社会形态发生变革, 新技术为组织与个体、个体与个体的跨空间、跨时间连接创造了便利条件。由此,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生产、流通获得广阔空间, 统一战线的实施开始更多运用话语和叙事来塑造连接、传递意义、团结个体与人群, 逐步生成“话语的统战”。统战话语和叙事日益从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

综上所述,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立足中国共产党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阔场景, 对嵌入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统一战线、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统一战线、技术社会形态变革中的统一战线形成系统性认知与表达, 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工具性与价值性、现实性与未来性高度统一的意义体系。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 需要立足大历史、大空间、大视野, 对统一战线进行长时空、多层次、多类型的融通构建, 进而为把团结话语更好地转化为推动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实践力量作出积极贡献。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在源头上从团结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 并对团结实践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 彰显了“统战话语”与“话语统战”的互转辩证法。

三、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历史演进

从广义看, 统一战线的话语叙事与自身的实践形影而生, 人类社会中主张不同力量的团结合作的表达均可纳入其中。从狭义看,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叙事是党在推动“两个结合”中以团结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实践的表述集合, 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主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中主张合作共赢思想对接中国实践等的综合表达。

(一) 统一战线话语演进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根据相应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和现实需要, 经历前期酝酿、中期强调、后期宣传等过程而推出, 可从主题话语、枢纽话语、专门话语的演进进行简要考察。

其一, 统一战线主题话语演进。百余年来,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经历了“以团结赢得斗争”“以团结安邦定国”“以团结富国利民”“以团结强国复兴”的主题演进。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 党推动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话语中的“联合”话语从弱到强, 回应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现实构成, 反映了从一开始排斥统一战线到重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实践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建立起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并逐步将工作着眼点转向全面发动工农劳苦大众。这个时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把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 推动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巩固工农联盟, 发展壮大工农红军, 不断扩大根据地。这一时期统战话语覆盖链条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劳苦大众”, 政治纲领上的话语表现即主张建立“工农共和国”。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话语的深入人心, 政治纲领上的话语表现即把“工农共和国”调整为“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建构从之前的更加重视阶级分殊视野, 纳入了更加广阔的中华民族视野, 这与中国共产党从“工农的政党”转变为“全民族的政党”历程相一致。经由全民族合作抗

战的实践交往，统一战线话语在中国社会得到空前传播，中国人民的团结意识得到空前加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主要描述中国共产党联合被压迫阶级阶层、民主力量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革命任务，政治纲领上的话语表现即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过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中国共产党与党外力量协商建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含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生动展示了统战话语交往的丰富成果。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实现了从阶级联盟到政治联盟的转变，建立了爱国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以是否爱国为标准，形成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鲜明话语，实现了凝聚建设社会主义广泛力量的作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元素，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统一战线性质，进一步丰富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使命任务，对促进“三个大团结”起到极好的话语构建作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话语范式实现了从经典的“敌我友”范式到新型“共同体”范式的变迁^[21]，有力动员更多的国内力量共建大团结局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到整个人类发展，实现了从两个范围联盟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型^[22]。

其二，统一战线枢纽话语演进。在主题话语演进的规定下，统一战线形成对理论与实践具有牵引作用的抽象性范畴，即枢纽话语。统一战线枢纽话语重在对自身的定位、性质进行描述和表达。一方面，创新提出和丰富发展统一战线“法宝论”。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3]。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通过表意形象、通俗易懂的话语描述而得到很好的社会化传播和党内外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对统一战线“法宝论”进行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24]中国共产党通过重申统一战线的战略性而向全党全社会有力传达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坚决方针。此后，统一战线“法宝论”持续得到重申和发展。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大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25]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三个重要法宝”的论述，即“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6]，进一步丰富统一战线“法宝论”的话语内涵。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论”的表述从“重要法宝”跃升为“强大法宝”，实现了统一战线枢纽话语的标志性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27]统一战线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论述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提法调整或者概念升级，而是对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战略定位更加重要、战略作用更加突出的理论反映和实践要求，突出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法宝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28]。另一方面，与时俱进表述统一战线联盟的范围。统一战线性质中“联盟”表述的调整与拓展，展现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追求的人民性和包容性。新中国成立前，统一战线性质主要从

阶级结构话语进行表述, 侧重传递出通过几个阶级联合反对特定“敌人”的话语意涵。改革开放后, 统一战线经历从“三者联盟”到“四者联盟”再到新时代丰富后的“四者联盟”的话语表述发展, 传递出通过广泛调动各界力量激发人民共和的政治伟力。“法宝论”与“联盟论”的与时俱进, 科学反映了统一战线的时代内涵、任务变迁和崭新价值, 产生了极大的凝心聚力效能。

其三, 统一战线专门话语演进。在不同时期, 统一战线根据时空特点和工作任务形成各领域的专门话语。一方面, 统一战线形成本领域宏观特色话语, 即围绕“大团结大联合”这个“元话语”进行了一系列话语建构。在革命战争时期, 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话语富有动员革命力量的色彩, 在历史上表现出由“联合”向“团结”的表述变迁。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系统论述了关于建立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 指出“历史上的运动无论是哪一种, 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 “中华民族的大联合, 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922年6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后来, 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 “联合”是其中的高频词汇。新中国成立后, 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话语更多转向国家建设与治理中的“合作”话语, 旨在凝聚团结兴国富国强国的广泛力量。1949年10月24日, 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说: “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 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 有什么好处, 原因在哪里。应当说, 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29] 党还提出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基本原则,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重大政治社会关系和谐, 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等。另一方面, 统一战线形成本领域具体特色话语, 即统战工作具体领域的重要方针、原则、要求等。它们包括: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知识分子政策,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重要论断, 等等。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取得重大进展。“最大的政治”“最大工作”“同心圆”“石榴籽”“最大公约数”“有事好商量”等一系列统战特色话语在实践中焕发活力, 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统一战线经典论述的政治传承^[30]。经过历史发展和党的主动建构及其与各界的良性互动, 统一战线专门话语库不断充实, 话语质量不断提高, 形成显著的话语效应。

(二) 统一战线叙事演进

相较于倾向内容生产的话语, 叙事侧重言说任务的达成, 涉及话语传播的目标、策略、手段。话语产生出来后, 只有匹配相应的叙事, 才能让话语抵达受众, 在互动中提升话语权。在不同时期, 统一战线的叙事体系随着时空环境和话语内容而变迁, 在叙事方式和效果上得到发展。从赢取认同的角度看, 统一战线叙事的展开过程也是统战工作的展开过程, 在话语的交往实践中实现统战目标。

其一, 张贴标语、进行宣讲、发布口号。这类叙事方式突出体现在革命时期尤其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红军在长征沿途注重发表有关决议、布告、宣言和张贴标语、口号等, 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积极宣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反对轻视少数民族。在云南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 朱德亲自到清真寺宣传红军的民族平等主张, 次日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 并在红军中组成回民

队伍。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开展广泛的针对性宣传工作。这些统战宣传工作使长征中的红军得到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顺利北上实现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

其二，撰写诗词、成立文化社团、演出话剧。通过文学文艺传递统战话语，也是党开展统战话语叙事和增进团结的重要形式。比如，毛泽东与柳亚子的诗词往来谱写了一曲统战佳话。1945 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柳亚子重逢并叙谈多次，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手书 1936 创作并在此前未曾公开发表的《沁园春·雪》相赠，柳亚子和词“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表达了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决心。1949 年 3 月，柳亚子到京后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透露出自己的牢骚和退隐之意；毛泽东写《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作为答复，“以文化人”地做柳亚子的思想工作。又如，1938 年 4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第三厅建立了 10 个抗敌演剧队、4 个抗敌宣传队和 1 个儿童剧团，编写抗日剧本，谱写抗日歌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传播。人民抗日剧社在争取东北军、农民群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36 年七八月间，剧社前往东北军驻地安赛区杨家沟开展演出，演出内容包括《统一战线舞》《抗日舞》等。这些剧目引发东北军官兵心中共鸣，现场形成“台上演抗日戏，台下呼抗日口号的动人场面”，推动了抗日思想的宣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31]。此外，革命时期国内还成立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推动了左翼文化的发展，强化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

其三，兴办媒体、发表文章。延安时期，党就提出“全党办报”主张。1938 年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相继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对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出了卓越贡献。1937 年 4 月 24 日在延安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1941 年 8 月 31 日停刊，共出版了 134 期），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中央文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32]。《新华日报》代论（指用来代替社论的署名评论文章）承担着在国统区宣传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的重要职责，1938—1947 年《新华日报》的 52 篇代论文本的话语框架包括斗争实践、道理劝服和信念鼓舞^[33]。中国共产党 1941 年 4 月在香港创办“统一战线报纸形式”的《华商报》，集中在“舞台与银幕”版面积极刊发倡导“抗日统一战线”的影评，相关影评紧扣“团结抗日”这一核心主题^[34]。中共中央还在海外建立了舆论阵地，如 1936 年 3 月 15 日创刊于法国巴黎的《全民月刊》，便是以“巴黎华侨”身份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时政期刊。

其四，发表白皮书等权威文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以白皮书为重要叙事载体传播有关权威话语。自 1991 年发布首部白皮书，截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政府已发布 158 部白皮书，其中涉统一战线各类白皮书有 63 部（见表 1）。这 63 部涉统一战线各类白皮书中，综合性白皮书有 24 部，专题性白皮书有 39 部。39 部统一战线专题性白皮书中，涉政党制度方面的有 2 部、民族方面的有 3 部、宗教方面的有 2 部、新疆方面的有 13 部、西藏方面的有 14 部、香港方面的有 2 部、台湾方面的有 3 部。新时代以来，美西方对我国政党制度、涉台、涉港、涉疆等议题不断加大攻击力度。作为对西方话语攻击的有力回应，我国已颁布 30 部相关议题的白皮书。此外，我国在近年来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还注重通过发布清单类文件, 比如《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等, 反驳美西方涉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

表 1 中国政府涉统一战线白皮书分类统计

(单位: 部)

综合性	专题性						
	政党制度	民族	宗教	新疆	西藏	香港	台湾
24	2	3	2	13	14	2	3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的白皮书专栏信息统计和制表。

网址: <https://www.gov.cn/zhengce/baipishu/home.htm>, 访问时间: 2023-10-10。

(三)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经验

我国已经形成覆盖线上线下, 形式包括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的统战全媒体传播体系。统一战线借助统战部门官方网站、统战部门官方微信和统战团体、组织的网站、报刊、新媒体等, 极大丰富了叙事方式。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得到深入推进, 为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实现政治社会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一些实践经验。一是坚持正确的方向, 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的理论发展来更新和丰富统一战线的话语内容。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要全面反映和融入党中央的最新决策部署和理论创新内容, 把党的整体话语有机嵌入统一战线领域。二是契合国情民情, 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贴近人民群众的语言习惯。统一战线话语要在社会上有活力和有传播力, 同样需要植根中华大地, 善于以中国语言表述统战元素、传达统战意图, 便于口口相传而实现良好效果。三是坚持严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创新运用丰富多样的话语类型和载体。要广泛结合运用联谊交友、国民教育、干部培训教育、政策文件解读、新闻宣传、理论研究、文艺活动、新媒体传播等载体, 推进宣传性叙事、研究性叙事和斗争性叙事的一体运用, 丰富统战话语叙事的内容结构, 实现统战叙事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四是辩证看待统一战线“做”与“说”的关系, 妥善处理统一战线“脱敏”问题。“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都是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开展的, 这与一些敌对势力诋毁、中伤提出所谓的‘渗透’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35]统一战线历来与国家治理、社会生活、广大群众关系密切, 在稳妥可控前提下要加强统一战线领域的形象展示, 通过加强话语传播塑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四、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困境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在取得进展和经验的同时, 也面临着来自外部、新技术和内部等方面的困境。就外部而言, 中国统一战线领域在近年来成为美西方对华认知战的首要对象,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就技术而言, 新技术对意识形态和人群关系的负面影响加大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难度。就内部而言, 政策领域、学术领域、社会领域的统战话语尚未形成有机衔接。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有效融通国际与国内、传统与现代、政学社各界的迫切需要。

（一）美西方对华认知战恶化外部环境

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认知战已经从传统的军事斗争范畴拓展至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范畴，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手段。美西方一些国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护持自身霸权、遏制中国崛起发展的需要，运用自身话语和叙事优势，频频对中国统一战线领域进行话语攻击。事实上，西方自殖民扩张时期便开始在全球攫取各项资源，话语和叙事资源正是其中之一。美西方利用语言、渠道、技术优势，传播并强化其价值理念^[36]，逐渐形成话语垄断。在这样的话语环境里，中国的形象被定义、塑造、格式化。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认知战表现出若干新动向。从内容看，美西方对华认知战已经全面覆盖中国统一战线所有领域。美西方攻击我国的人权、民主议题特别是政党制度、少数民族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构造“民主—专制”二元政治叙事话语；攻击我国治疆、治藏政策，妄图干扰中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挑拨破坏我国民族关系；攻击涉台议题，妄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攻击涉港涉澳议题，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从主体看，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形成跨国联盟和国内“全政府—全社会”一体格局。西方有关国家组建的各种联盟机制如“七国集团”（G7）、“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民主联盟”、“民主科技联盟”等，时常以会议公告、声明等形式污名化中国，而中国统一战线领域几乎是它们每次炒作必提及的话题。从机制看，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认知战形成“流水线作业”模式。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建构了相应行动框架：智库编码/政要发声—媒体传播—受众解码再传播。美国政要、智库、非政府组织、资本、媒介、社会等在污名框架的上下游各自充当角色，环环相扣，最终完成话语攻击。从资源看，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形成较强的资源调取运用格局和复合动机。特别是除了政治动机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强的经济动机。比如，涉新疆棉花发起的舆论战实际上也是一场“经济暗战”。其实质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等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发布所谓“强迫劳动”的不实说辞，来打压“中国棉花”和“新疆棉花”在全球棉花生产和消费环节中的份额，维护美国棉花产业链利益和掌握国际棉花定价权^[37]。基于这种外部态势，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在回应恶意攻击、主动开展有效对外叙事方面面临紧迫的任务。

（二）新技术的负面效应带来新变数

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新技术迅速迭代更新，在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负面效应。“政治—技术—社会”三方力量博弈的动态变化展现社会舆论场的新发展趋势——媒介技术不断对社会政治力量进行试探与边缘突破^[38]。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也由此面临新变数。从技术影响意识形态的机制看，新技术往往带来话语碎片化、娱乐化、选择化趋势，对个体的思辨力和话语素养产生负面影响，加剧个体的原子化和群体的离散化。话语的碎片化趋势产生了“鸡毛蒜皮效应”^[39]，网络舆情容易被一个个或猎奇或刺激的事件占据重心，而冲淡了真正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重点。部分强调情绪宣泄的反智内容反而容易受到追捧，而强调理性、科学的内容往往难以成为爆款。一些图片、短视频、短动漫等话语符号，呈现内容往往不够全面，甚至以短时记忆拆解整体语境^[40]。算法推送按照受众习惯和兴趣选择性推送信息，加深了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信息壁垒，权威叙事和整体性价值观可能进一步受到消解。外界的有效信息和重要信息如果与该群体缺乏领域重叠，则可能在该群体内形成信息真空地带。传统的统战话语运行机制一般是“党政部门、团体组织、权威媒体

“一党外代表人士—一般统战成员/所联系群众”, 这种统战话语建构过程相对定向和清晰。而算法时代的话语传播呈现“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变革趋势, 表达权力泛化, 话语解释权在不同平台间争夺激烈, 社会化传播主体与传统官方传播主体的对话、博弈能力不断增强^[41]。传统统战话语以宏大叙事、定向叙事、科层组织—人的叙事为主的模式受到一定冲击。从新技术的局限性因素被一些主体恶意运用的情况看, 新技术正成为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风险点。社交机器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靡全球, 同样给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带来挑战。“大量由聊天机器人编撰的、带有明显目的性的真假信息涌入舆论场, 很容易影响公众的认知, 进而左右社会舆论。”^[42] ChatGPT能够对用户就个人问题和公共问题同其建立交流时生产的内容进行收集和存储, 这让部分信奉霸权主义和持有冷战思维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得以窥探和监视其他国家的公民隐私、社会热点、政治风向、群体心态和国家机密。这为其通过断章取义、恶意裁剪、歪曲抹黑等手段大兴舆论战, 攻陷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性^[43]。一项研究发现, 在抓取 358 656 条推文、测量用户的机器人评分后发现, 与中国相关的推文中超过 1/5 即约占 21.88% 疑似由机器人用户发布; 各涉华议题下均有一定自动化操纵的痕迹, 其中澳门 (34.87%) 和香港 (30.13%) 议题中自动化操纵痕迹最重, 民主 (21.98%)、台湾 (19.40%) 和新疆 (19.18%) 议题次之, 直接带人权相关标签的机器人最少 (12.29%)^[44]。基于新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被负面运用的现实风险,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流程优化和有效应对的突出紧迫性。

(三) 国内场域的统战话语叙事建设存在改进空间

整体而言, 国内场域的统战话语叙事建设在内容和方式两方面存在可改进空间。一方面, 统一战线的政策、学术、社会三类话语的构建不匹配、不衔接。统战政策话语宣传较多, 学术话语构建不足, 社会话语传播较弱, 三者之间缺少融通。统一战线政策与实践经验的学理化阐释和提炼仍有很大空间, 统战政策与实践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并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国内传播仍面临供给不足问题。在学术话语方面, 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仍然相对薄弱, 话语风格与专业学术话语对接仍有差距。2023年8月,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网站、孔夫子旧书网分别以“统一战线”为检索字段, 结合人工辨别检索条目 5 000 余条 (其中含重复书目), 在此基础上统计汇总了统一战线学术专著列表。有关专著共计 51 种, 其中统战基础理论类有 40 种, 统战历史类有 8 种, 统战工作类有 3 种。这一调研发现, 以“统一战线”为题名的书籍, 多是政策文件和经典文献汇编、一般统战知识教程或培训教材、统战实践调研报告汇编等, 而引入专业学科研究统一战线宏观议题的专业性、专题性学术著作很少。此外, 统一战线的政策话语生成后, 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在相应的社会话语传播中, 较多使用政策话语符号, 这对于群众形成了走近、理解、认知统一战线的较高门槛, 不利于统一战线话语的大众化传播和社会化叙事。有研究发现, 当前涉统一战线题材的出版存在故事性不强、青少年读物比较少、呈现方式单一等不足^[45]。可见, 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建设面临多学科专业介入的任务, 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存在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深度对接的需要; 统一战线政策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统一战线学术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工作话语, 实现这种话语的融通仍有较大空间。另一方面, 统战叙事方式存在手段载体老化、平台占有率低的不足。与我国庞大的网民群体相比,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对新兴载体使用仍相对不足。例如, 部分统战新媒体窗口已成“僵尸号”, 已较长时间未更新内容。笔者在抖音以“统战”为搜索字段, 发现主要内容还是统战基础知识科普, 例如

“什么是统战”“统战历史”，视频形式多为传统的字幕解说或主持人讲解，内容较为单一、形式较为传统，多数内容的评论、点赞、转发数据处在个位数。从一些统战新媒体账号的内容形式来看，缺乏长线议程设置，缺少与当下时事热点的对接，爆款内容欠缺。一些统战平台虽与新媒体实现连接，但内容形式未跟上，仍然以传统的图文叙事为主，缺乏使用新载体、有趣多元的新形式（H5、游戏、短视频、短剧、动漫等）。在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构建中，宏大叙事较多，而以讲故事为特点的微观叙事较少。在官方叙事、媒介叙事和公众叙事等不同场景中，针对不同受众应采取不同叙事方式，但目前统一战线话语在三种场景中均以宏大叙事为主。宏大叙事在记录信息、保存数据方面具有正面价值，但从抓取人心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来看，微观叙事的传播效力不可替代。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在加强内容供给和改进方式上均存在迫切需要。

五、融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实践路径

推进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首先要打开视野，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高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高地、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的战略高地、建构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学理高地^[46]。在具体路径上，要坚持“融通”的基本原则，坚持内容建设、主体协同、方式改进、健全平台、完善环境等一体推进。

（一）加强内容建设：多类型复调构建统一战线话语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前提是有相互衔接的内容，实现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在党政部门政策对外传递、学术部门理论建设、民间社会认知接受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实现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高效跨界生产与传播，“开创官方、精英、民间多层次话语圈同频共振、复调传播的新局”^[47]。化解统一战线话语在官方、学界、社会等不同领域相对割裂的问题，要着重挖掘统一战线话语在这三个领域的通约之处（示例见表 2）。官方话语是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主要来源和主导叙事者，需要对其中的代表性话语加强学理化阐释、学术化提炼，使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政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下实现学理建构和更好的推广。相关学科应结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交叉研究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着重提炼能够融通中外的统一战线标志性范畴。统一战线的不少制度化实践通过多学科介入，具有极大的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空间，蕴含诸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可以创新构建的知识增量。官方类统战话语也需要以更加通俗易懂的社会语言走入社会，使人民群众更加容易了解和接受统一战线的理念和精神，更加了解统一战线工作的实际运转。

表 2 统一战线各类话语对应关系示例

政策类话语	学术类话语	社会类话语
团结	政治秩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联合	共同体	肩并肩
政治引领	共识	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二）加强主体协同：多主体跨界塑造统一战线话语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言说主体涵盖各个方面与领域。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由于类型的复合性，更需要组建包含党政部门、专业机构、统战成员和一般民众的跨界讨论机制，形成统战话语的最大公约数。要构建以官方叙事为主导、学界叙事为支撑、民间叙事为补充的叙事主体联动体系，推进多主体合力构建与协同叙事，充分发挥各主体在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政策话语的权威构建者，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历来注重把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上升为政策话语。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得到创新发展，不断把实践中好的做法进行政策提炼，可以在相关党政事务、会议活动等场合融入统一战线元素，加以广泛推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五路大军”可在课题研究、调研咨政、学术交流等活动中，深度关注能与本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统一战线议题。统一战线成员现身说法讲述中国统一战线的故事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要进一步在日常履职、对外交往交流中传递统一领导、团结合作、民主协商等统一战线符号。在国际场域，要注重培养和发挥知华友华力量在传递中国团结合作价值、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民族宗教领域和睦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学术交流等活动，邀请有影响力的国际政要、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加强与不同海外群体的交流对话，拓宽统一战线符号的国际传播渠道。探索用好“虚拟主体”开展统一战线话语叙事。融通传统载体与先进技术场景，在用好传统部门一人、人一人传播载体的同时，利用网络、新媒体等现代传播手段和平台，借助图文、音视频、动漫等多模态符号增强统一战线的信息量和表现力。

（三）丰富叙事方式：多层次传递统一战线的鲜活故事

统一战线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容，具有较多的“高阶政治”符号和形象。但是，统一战线话语是多维的，其叙事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整体而言，要在坚持领导权的前提下，从叙事“主体本位”转向“受众本位”，做好分众传播。要融通国际与国内的统一战线话语叙事，在做好国内场域统战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同时，加强统一战线话语的对外有效叙事，综合使用新闻外宣、影视传播、书籍外译出版等方式。要强化嵌入式表达，把统一战线相关符号、人与事等巧妙融入一般性的对外宣介活动中。比如，把统一战线历史与现实中的著名事件、典型人物、事迹等编成故事、拍成影视和短视频等进行传播；根据需要适时发布统一战线领域的白皮书、纪录片和专题片等，增加对各类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吸引力。一项覆盖 100 国受众（样本总量 50 357 个）的调查显示：在受众有意愿接触的中国媒体内容（新闻、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娱乐综艺、动画片、音乐以及中文教育等）中，电影（49.0%）是最受欢迎的内容，其次是新闻（47.9%），纪录片（46.9%）和电视剧（42.2%）分列第三和第四位，中文教育（38.9%）、娱乐综艺（37.9%）和动画片（36.6%）紧随其后^[48]。要强化故事化表达，从涉统一战线的正面典型案例中挖掘小切口的叙事案例，按照叙事的基本规律编辑好文本，实现从政治叙事向生活叙事、从集体叙事向个体叙事的转化，形象化塑造与传播鲜活的统战历史与现实，更好达到与国内外受众共情的效果。比如，针对美西方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等谎言，我国知名插画师团队“乌合麒麟”以漫画《Blood Cotton Initiative》（中文名《血棉行动》，2021年3月27日发布）为介质，以细节呼应历史，揭露美西方自身在人权领域的诸多问题。画中展示了美国 3K 党（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残酷役使黑奴采摘棉花的情景。画面里，一个稻草人被捆绑在木桩上，接受手持 BBC 话筒的记者采访。截至 2023 年 9 月 9 日，该博文在新浪

微博被转发 12.4 万次、留言 2.5 万次、点赞 108 万次。当然，优质的统战叙事对博主的人文社科知识、国际形势认知等有较高要求，新媒体平台上的此类博主还非常有限。此外，着眼应对美西方涉华认知战的需要，我国在加强宣介性、回应性的统战话语叙事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美西方涉中国统一战线污名化和炒作的斗争性叙事。要主动前瞻塑造中国统一战线正当性的“标签化”叙事语境，打造有利于我国的叙事“标签”，进行议题设置和情节设计。

（四）健全叙事平台：多载体激发话语统战的实践效能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话语叙事为机制促进“统战宣传”向“话语统战”的转型升级具备扎实的社会基础。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在上百万款互联网应用中，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的用户规模稳居前三；我国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规模分别达 10.47 亿人、10.44 亿人和 10.26 亿人，用户使用率分别为 97.1%、96.8% 和 95.2%^[49]。随着新技术平台的全面普及，统一战线在开展话语叙事时既要用好传统的报刊、会议、活动等媒介，更需要进一步用好新型载体。在这个方面，各级统战部门已经做了一些实践探索。比如，中央统战部建立了覆盖即时通信、短视频、期刊网站等的线上线下宣传平台，包括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中国统一战线》期刊及其新浪微博官方账号、统战新闻手机新闻客户端、“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头条号（西瓜视频、抖音等账号）等，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国家层面统战宣传体系。各民主党派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积极创新民主党派宣传工作，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团结报社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2022 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微信矩阵 8 个公众号，平均发布天数为 242 天，共发文 3 876 次，共推送文章 4 571 篇，文章获得近 846.6 万次阅读、10 万+次点赞、近 4.9 万次在看；8 个公众号的微信传播指数 WCI 均值为 720^[50]。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要使新技术平台从一般的统战宣传功能衍生出话语统战功能，并在现有各地网络统战、数字统战平台建设中加强大数据分析、舆情研判、互动与回应功能。

（五）完善整体环境：多体系保障统战话语叙事的构建条件

要把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纳入我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范畴，做到一体规划和一体建设。构建大统战话语叙事格局，运用大统战工作格局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机制，整合使用统战部及统战系统各单位、宣传部、外交部、中联部和公共外交等领域的涉统战内宣和外宣职能，形成统战话语叙事合力。构建统战话语叙事力量提升机制，加强对官方媒体、专业媒体、民间媒体、新兴媒体等各类传播主体的培训和指导，提高他们的国际叙事能力和水平，形成具有国际协同效应的多元叙事主体。构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支撑机制，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处于政策话语、社会话语的中间环节，承担着把政策话语学理化提升、把学术话语社会化普及的桥梁功能。要加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探索统一战线学的交叉学科建设规律，比如探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中设立“统一战线”二级学科；支持各级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设立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加大对统战专业研究的资助力度。

六、结语：从统战话语走向话语统战的图景展望

统一战线发展演进内在包括自身的形态变迁，话语统战反映统一战线形态变革的趋势。统一战

线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为了达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内含主体、客体、载体、场景、目标等要素。统一战线正是特定主体挖掘共同利益、运用相应载体来影响、团结客体并结成共同体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条件下, 统一战线展现出各有侧重的形态特征。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农业经济占主体的时代, 人们对物质利益等初级需求更加关注, 主体影响、团结客体时更加注重发挥物质利益的联结作用。相应地, 统一战线更多发生在直接的“人—人(群)”的单点辐射的静态场景中, 形成“物质的统战”形态。在近现代以来崛起的工业社会中, 生产力获得快速发展, 人获得进一步解放, 人们对初级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结社、参与等需求更加强烈, 主体影响、团结客体时更加注重发挥科层制组织的作用。相应地, 统一战线更多发生在建制化的“组织—人(群)”的伞状辐射的稳定场景中, 形成“组织的统战”形态。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 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 人们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精神认同等高层次需要, 主体影响、团结客体时更加注重运用传递话语、影响认同的机制。新技术手段使人與人之间建立联系更加广泛化、便利化的背景下, 特定人群将更容易受到话语及其所携带价值观的影响, 进而调整和建构自己的认知图谱。相应地, 统一战线更多发生在“主体话语—人(群)”的网状辐射的动态场景中, 形成“话语的统战”形态。统一战线的这三种形态本质上是经济基础变化带来的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见表3)。

表3 统一战线形态演进对比

阶段	背景	机制	场景
“物质的统战”形态	农业社会	人—人(群)	单点辐射的静态场景
“组织的统战”形态	工业社会	组织—人(群)	伞状辐射的稳定场景
“话语的统战”形态	信息社会	主体话语—人(群)	网状辐射的动态场景

统一战线历来注重发挥话语的团结功能, 信息社会对弹性团结的突出需求赋予话语统战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 解决的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问题。统一战线通过影响和改变特定人(群)的认同而达成团结联合的效果。从话语的角度看, 这本质上也是主体的权威话语(一般有政策、主张、纲领等形式)为客体所接纳和践行。事实上, 统一战线一直处在“主体话语生产—载体传递话语—场景交互话语—客体接收话语和形成认同”的链条之中。只不过在生产发展的初、中级阶段, 统一战线更多通过物质利益照顾、有形组织整合来实现话语传递与认同建构。在新技术崛起的时代, 统一战线过程与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过程日益融为一体。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将日益从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话语统战密切贴合信息社会中弹性团结的需要。“在信息社会中, 信息技术为个体成员赋权与增能, 使个体的主体意识与自主能力迅速增长, 社会团结愈来愈建立在主体的选择意志与主观认同的基础上; 社会团结的刚性、固定性、稳定性在持续减弱, 而呈现出弹性、高自由度、弱联结性的团结形态。”^[51]

从统战话语走向话语统战, 意味着统一战线形态的多方位变革。其一, 话语统战适应客体新变化。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全面嵌入人们的生活, 带来生活方式巨变, 进而引起个体量子化和群体离散化。数字时代的统战工作将日益面临个体量子化和群体离散式联结的情形^[52]。

这种背景下，统一战线需要更加注重通过话语的有效传递和互动来影响人、团结人。其二，话语统战蕴含主体变革。传统统战工作主体是掌握权威话语生产资源的核心力量，其身份和地位相对固定。而在信息社会中，统战工作主体发出权威话语并传递至相应客体后，不仅主体和客体在经历话语的交互后可达成共识，而且客体通过对话语的再传递，能够更加广泛地影响不特定的人群，实现统战客体的某种“主体化”，增强统战工作的主体间性。其三，话语统战指向场景变迁。传统统战工作更多运用科层制组织渠道传递话语信息，运用文件、会议、报刊等方式载体进行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达。话语统战立基数字时代的技术发展，其工作载体鲜明呈现交互性、即时性、平台性、大体量等新特征，能够生成节点广泛互联的交往互动场景。随着统一战线与各种数字场景的深度有机融合，话语统战将成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重要实现形式。

对话语统战的图景展望也启发了当前统战工作实践的守正创新思路。一是牢牢掌握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仅要加强对统战成员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引领，同时需要强化塑造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话语为广大统战成员接收、接受和认同、践行的工作机制和载体场景。二是不断扩大团结半径，不仅要继续运用“组织起来”的有效经验和做法，通过组织吸纳加强对固定群体的团结，以及通过党外代表人士在统战团体中发挥辐射作用来团结相关群众；也要善于在数字场景中通过话语塑造和引导实现对更广泛的、不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团结。数字统战建设不应仅是相关统战工作事务上网和做好网上统战宣传，更应包括运用广泛的数字载体场景来发现、分析、影响和团结更多的对象。三是防范和化解统一战线领域风险，不仅要突出关注各种有形可见的隐患，也要更加关注美西方国家及其借助新技术实施话语霸权、价值观渗透等隐形话语风险，加强斗争性话语叙事的应对准备。未来，统一战线话语与叙事的团结功能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统一战线形态将不断实现跃升，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将更加巩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N]. 人民日报, 2021-06-02 (1).
- [2]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 (1).
- [3] 罗振建, 林华山. 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1): 32-40.
- [4] 徐佩瑛, 乐文红, 张师平. 论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权建设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3): 38-44.
- [5] 丁俊萍, 颜苗苗.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 1-14.
- [6] 李俊, 蔡宇宏. 中国语境下统一战线话语表达形态的百年演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5): 1-8.
- [7] 陈翔. 伦理共和视角下爱国统一战线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 [J]. 理论导刊, 2020 (5): 71-75.
- [8]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9-146.
- [9] 刘继忠, 张京京. 促成抗日统一战线: 巴黎《全民月刊》抗战话语研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5): 40-44.
- [10] 杨丽萍, 安俭. 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的抗战“团结”战略叙事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 (3): 220-230.
- [11] 吴文杰. 从话剧《屈原》看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

林华山, 龚静阳.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26-144.

- 会科学版), 2022 (6): 228-241.
- [12] 钱再见. 从科学到学科: 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 (4): 45-53+242.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第6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562.
- [14]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121.
- [15] 石义彬, 王勇. 福柯话语理论评析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0 (00): 26-33+234.
- [16] 祝克懿. “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4): 96-104.
- [17] 章晓英.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一个叙事学视角 [J]. 国际传播, 2019 (1): 1-7.
- [18] 周宪.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3 (1): 121-129.
- [19] 唐海江, 陈佳丽. 话语体系: 概念解析与中国命题之反思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 (7): 34-40.
- [20] 郭湛, 桑明旭. 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 (3): 27-36+155-156.
- [21] 路璐, 李小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13.
- [22]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 新时代统一战线研究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9: 32
- [2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6.
- [24]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03.
- [25]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43.
- [26]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 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解答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6: 9.
- [2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8] 钱再见, 高晓霞.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9.
- [29] 毛泽东文集: 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
- [30] 杨卫敏. 论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1): 4-18.
- [31] 曾荣, 王毅昂. 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考察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6): 5-12.
- [32] 靳诺. 理论的旗帜与思想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红色期刊的历史贡献与宝贵启示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 (6): 3-9.
- [33] 双传学. 意识形态话语的突围: 《新华日报》代论的话语实践及共意动员——基于1938—1947年52篇代论文本的框架分析 [J]. 当代传播, 2023 (1): 67-73+86.
- [34] 吴迎君. 两段失语间的短促扬声: “抗日统一战线”路向香港左派电影批评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1 (3): 91-99.

- [35]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EB/OL]. (2021-08-26) [2023-09-09].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826/c64387-32209511.html>.
- [36] 程曼丽. 打破西方话语垄断 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J]. 新闻战线, 2023 (7): 45-47.
- [37] 邓金剑. 美国限制进口新疆棉花: 供应链与产业链之争 [J]. 国际经济合作, 2021 (5): 79-89.
- [38] 喻国明. 当前社会舆情场: 结构性特点及演进趋势 [J]. 前线, 2015 (12): 35-37.
- [39] 王天楠. 碎片化网络舆情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探析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0 (1): 36-42.
- [40] 陈帅. 自媒体话语生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及其对策 [J]. 理论导刊, 2022 (9): 59-63.
- [41] 刘康. “去中心化—再中心化”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建构路径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5): 102-109.
- [42] 史安斌, 刘勇亮. 聊天机器人与新闻传播的全链条再造 [J]. 青年记者, 2023 (3): 98-102.
- [43] 蒲清平, 向往. 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 的变革影响、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102-114.
- [44] 师文, 陈昌凤. 分布与互动模式: 社交机器人操纵 Twitter 上的中国议题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20 (5): 61-80.
- [45] 王福振. 新时期图书编辑的职责和任务——做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统战出版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 (10): 218-220.
- [46] 梁君思. 中国统一战线话语权建构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统一战线与话语权构建”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4): 51-69.
- [47] 史安斌, 童桐. 从国际传播到战略传播: 新时代的语境适配与路径转型 [J]. 新闻与写作, 2021 (10): 14-22.
- [48] 李宇. 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创新: 柔性叙事与软性传播 [J]. 对外传播, 2023 (7): 44-47.
- [49]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2023-08-28) [2023-09-09]. <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3/0908/MAIN1694151810549M3LVUW0AV.pdf>.
- [50] “数”说民主党派微信传播这一年 | 党派中央篇 [EB/OL]. (2023-01-19) [2023-09-08]. <https://mp.weixin.qq.com/s/4xGrZgPd6CT85PvMkpDDGA>.
- [51] 戴洁. 社会团结形态演进与信息社会的弹性团结: 历史、趋势与路径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6): 163-171.
- [52] 谢静. 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17-23.

责任编辑: 刘涪菡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 成因、影响与走向

戴维来

（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传统中等强国，近年来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其一些鹰派政客与媒体频繁挑战涉华议题，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炒作战争言辞，通过反华宣传声称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观，并预测两国将爆发战争，企图抵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突出表现为莫里森政府时期出现的“战鼓论”。所谓“战鼓论”，主要是指澳大利亚一些鹰派人物通过反华宣传，声称中国“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影响澳大利亚，对澳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观构成威胁，并暗示澳大利亚应准备迎接因台海问题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莫里森政府不断炒作“战争”议题，制造紧张舆论。这一动向与美澳同盟的联动影响、国内政治党争的推波助澜、游说集团的煽动鼓动等因素密切相关。“战鼓论”对中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双方在地缘政治、外交和贸易等领域出现一系列矛盾和争端，同时给民进党当局释放错误信号。澳大利亚所谓“战鼓论”强硬派一度甚嚣尘上，在塑造澳大利亚对华公众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澳大利亚政权轮替，所谓“战鼓论”强硬派对政策的影响已经减弱，也受到了经济利益、民意、政治力量等掣肘，不过也并未退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中澳关系出现转圜迹象，双方都致力于改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访问、经贸谈判措施，双边关系有所升温。但澳大利亚台海政策依然受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所谓“战鼓论”在未来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6.011

作者简介：戴维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院长助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3ZDA023）

引用格式：戴维来.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成因、影响与走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145-162.

是否会继续活跃，会否干预台海事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澳大利亚执政者对其国家利益的判断和外交战略布局。为发展稳定的中澳关系，中国应坚决反对所谓“战鼓论”，与各界保持接触，寻求长期对话，活跃双边交流，充实合作纽带，培植政治互信，管控和妥善解决分歧，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关键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战鼓论”；台湾问题；地缘竞争；“印太”战略；美澳同盟

中图分类号：D618；D8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6-0145-18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近年来在联盟党执政下，澳大利亚一些“对华鹰派”政客、智库和媒体炒作战争风险，从以往避谈台海“战事”到煽动所谓“战鼓论”，企图加速形成对华敌视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中澳关系特别是莫里森政府时期在地缘政治、外交和贸易争端等领域出现诸多矛盾。2022 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代联盟党执政，其对华政策及态度有明显变化，中澳关系出现转圜的迹象，过去剑拔弩张的态势日渐缓和，双方皆致力于改善关系。不过，深入把握澳大利亚近年来出现的前述政治辩论发展脉络、动机影响及走向，仍有现实意义。这有利于更好地以长周期、全过程的方式，认识和理解亚太地区安全的发展走势，更好地应对我国统一进程中的外部干预。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澳大利亚在台海问题上所谓“战鼓论”辩论的研究较少，多着眼于澳大利亚整体对华政策，围绕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方面的合作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凸显了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和外部因素对其政策和行动的重要影响。

一是主要涉及台海安全合作方面。一些研究认为，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一直叫嚣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所谓“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并在“联盟制华”和“以台制华”方面采取行动。这导致美、日、澳三国加强了制度化水平的安全合作，尤其是采用联合介入议题、加强国内机制协调、增强双边合作、建立三边同盟等途径来深化台海安全合作。然而，这种合作受到了软性和硬性条件的限制，包括美国国内政治优先、日本和澳大利亚认知上的差异、联盟扩散引发的减弱效应以及国内法律等^[1-2]。

二是主要关注澳大利亚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反应。一些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政策从“战略模糊”明显转向“战略明确”。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的国策。这一国策具有深厚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基础、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的民意支持。澳大利亚通过与美国结盟，获得了丰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但也必须忠实地履行其对美国的承诺，在亚太地区扮演“副警长”的角色。在当前的“联盟遏华”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台海策略密切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频繁的行动，如制造“台海危机”和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由于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仍存在差距，可以预见，澳大利亚将继续紧随美国的台海政策，积极参与台海事务，采取新的政策行动，从而影响中澳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3-4]。

三是主要聚焦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和舆论方面的问题。不少研究认为，作为“五眼联盟”的重要成员，澳大利亚在追求对美遏华政策上与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受到

戴维来.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 成因、影响与走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45-162.

美国压力的影响, 还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不能忽视中国市场, 且必须在对台政策上考虑中国的立场。在认知层面, 澳大利亚国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策观点: 一种是主张发展对台的“实际关系”, 另一方面是坚持对台的“战略自主”。其最终的政策选择还受到执政精英对公众舆论认知定位的影响^[5]。

综合前述文献来看, 尽管大多文章着眼于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台海安全合作以及国内政治和舆论对政策的影响, 但还未直接提供关于所谓“战鼓论”语境下的研究观点。这表明在澳大利亚台海政策领域的研究中还存在某些内容和角度需要加以补充, 特别是关于所谓“战鼓论”对澳大利亚在台海问题上立场和行动影响方面的研究。围绕澳大利亚所谓“战鼓论”政治辩论加以全面的研究, 对决策、社会舆论和安全战略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分析, 有助于深入考察所谓“战鼓论”在澳大利亚内部的政治影响。这一辩点会否制约澳大利亚对华关系、影响地区和平稳定值得认真研究。

二、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的登场与折冲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主要表现为莫里森政府时期的所谓“战鼓论”。它是指澳大利亚一些鹰派政治人物、媒体和学者等针对中国的反华宣传, 近年在澳媒体和政治舞台上逐渐流行起来, 其主要内容是声称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观, 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干预澳大利亚, 并预测两国将会因台海问题爆发冲突, 鼓吹澳大利亚要为迫在眉睫的冲突做好准备。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 莫里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停炒作“战争”议题, 制造所谓“战鼓论”的舆论风潮。然而, 澳大利亚“战鼓派”已随政权轮替下台, 它们虽然还没有偃旗息鼓, 但对政策的影响力已今不如昔。

(一) 莫里森政府时期所谓“战鼓论”登场鼓噪

莫里斯政府时期, 在台海局势紧张背景下, 一些澳大利亚政客开始频繁煽动战争言辞, 媒体持续跟进炒作, 渲染战争气氛, 宣称台海冲突迫在眉睫, 澳大利亚应准备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开战”。所谓“战鼓论”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舆论开始出现。

所谓“战鼓论”首先由莫里森政府的高官炒起,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彼得·达顿、彼得·詹宁斯等。2021年4月, 澳大利亚内政部部长迈克尔·佩祖洛声称: “澳大利亚必须努力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但不能以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作为代价, 只要‘暴政’对自由的威胁持续存在, 人们就必须保持武装, 坚定地战争做好准备。”他宣称: “战鼓正在敲响, 有时微弱而遥远, 有时会更大声, 且更为接近。”^[6] 2021年底, 澳大利亚时任国防部部长彼得·达顿声称, 不能排除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必须对中国的“敌对行为”保持清醒, 必须准备“再次派遣我们的将士奔赴战场”^[7]。达顿的言论引发了巨大争议, 但其即使在下台后依旧频繁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他甚至刻意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作直接对比, 妄称“台海如果发生冲突, 澳大利亚可能向台湾运送武器, 将竭尽所能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实施‘侵略’”^[8]。这位新任自由党领袖坚持将中国视为澳大利亚面临的“最大问题”, 并向工党新政府施压坚决反对中国^[9]。澳大利亚军方也迅速跟进对所谓“战争威胁”的讨论。澳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亚当·芬德利声称, 要阻止战争爆发, 澳大利亚军队必须与中国对澳大利亚施加的“强制性约束”展开竞争^[10]。澳美还制定有关台海可能发生冲

突的军事协同作战计划，是为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社会寻找“官方”支持的新机制。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部长克里斯托弗·派恩声称，“台湾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发点，澳大利亚可能会陷入冲突，一场涉及中国的战争是你我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可能不得不面对的事情”^[11]。澳前国防和情报高级官员巴贝奇声称，在未来五年内，澳大利亚有 50% 的可能性被卷入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台湾问题爆发的“毁灭性战争”，澳大利亚拒绝加入美国“协防”台湾地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声称中国可能会对澳军事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他担心澳洲没有准备好应对此类“威胁”^[12]。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是推动所谓“战鼓论”的主要力量。澳参议院外委会前主席埃里克·阿贝茨声称，澳大利亚将有责任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帮助保卫台湾”，呼吁与台湾当局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终结澳大利亚“一个中国”政策^[13]。工党参议员金伯利·基钦、现任自由党影子国防部部长安德鲁·哈斯蒂和蒂姆·威尔逊、詹姆斯·帕特森、菲利普·汤普森等反华议员强烈呼吁支持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盟党和工党的一些后座议员则呼吁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群“对华鹰派”议员叫嚣反击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例如，现任自由党反外国干涉影子部长帕特森组建了一个名为“金刚狼”的非正式跨党派鹰派团体，鼓吹“中国威胁”，要求对中国强硬。帕特森妄称中国是主要“威胁”来源，比冷战高峰时期更糟糕，而且这是一个更复杂的挑战^[14]。

2022 年 5 月，联盟党政府下台后，“战鼓派”失去执政和政治表演舞台，有关势力转战新闻舆论场。“战鼓派”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混淆是非，误导舆论，不断大肆宣扬“中国威胁”，甚至炮制出澳大利亚将对华开战的谬论。2023 年 3 月，澳大利亚两大主流媒体《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发表所谓专题报道《红色警戒》，声称两家媒体召集的五位“国家安全专家”开会研究得出结论：“澳大利亚的压倒性危险源头来自中国，我们国家在未来三年内可能会与中国发生战争，但我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15] 这比美国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预测的时间更早。澳大利亚“对华鹰派”专家主张重新引入征兵制，配备远程核导弹。洛伊研究所 2022 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中国大陆所谓“进攻”台湾并且美国决定干预，超过 51% 的受访者支持部署澳大利亚国防军，与 2019 年相比，这一比例上升 8 个百分点^[16]。该机构在 2023 年 6 月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其中 6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与中国就台湾问题爆发军事冲突的前景是“重大威胁”，支持“澳大利亚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61% 的受访者支持“动用澳大利亚海军协助防止中国封锁台湾”；当然，56% 的受访者也表示恢复澳中外交接触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17]。

（二）理性政治力量对所谓“战鼓论”的批判反思

对于所谓“战鼓论”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澳大利亚主要政治力量对此并未有共识意见，反而有许多政界及学界人士对此持批评意见。他们指出所谓“战鼓论”并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这些观点认为，如果澳大利亚在任何有关台湾问题上与美国一道同中国开战，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在当前世界所有的不确定性中，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台海政策无疑是必须展开的最重要讨论之一。前总理基廷强烈批评前述《悉尼先驱晨报》等媒体再度鼓吹的战争论调，指出这是“我在 50 多年活跃的公共生活中所目睹的最令人震惊和挑衅的新闻报道”。基廷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谓“战鼓论”。他直言台湾问题为中国内部事务，全世界都承认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若美国真的愿意为台湾开战，澳大利亚也没有义务加入，因为堪培拉与台北没有一纸盟约，台湾地区不是澳大利亚重要利益^[18]。时任工党影子外长黄英贤批评莫里森政府插手台湾事务，称这种策略只有不负

责任的政客才会使用, 指责达顿等人放大“战争”威胁以提高其所在政党的选举地位。前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比尔·肖顿表示: “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使用如此煽动性的语言, 除了引起更多的焦虑, 这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19]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文敦促要淡化战争言论, 称社会上可能有一些人在欢呼, 但这种语言不符合公众利益, 完全没有必要^[20]。进步派杂志《独立澳大利亚》表示, 澳主流媒体正在厚颜无耻地敲响战鼓, 同时故意回避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实际情况。澳知名记者保罗·格雷瓜尔也撰文揭露“战鼓派”在其战争宣传中回避残酷的现实, 因为冲突将导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年轻人大规模丧生, 伴随供应链被切断、超市货架空荡、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加剧等危机^[21]。澳大利亚独立与和平运动倡导者贝文·拉姆斯登表示: “澳大利亚卷入美国对华战争对澳人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后果。”^[22]悉尼大学教授詹姆斯·柯兰批评所谓“战鼓论”是铤而走险的标志, 打“中国牌”无疑会损害国家利益^[23]。工党政府上台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简·戈利、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等 15 位知名学者立刻致信阿尔巴尼斯, 呼吁新政府“更换战争语言”, 以澳大利亚人民利益为中心谈论中国, 与中国同行进行对话, 修补中澳“糟糕的外交关系”^[24]。

一些曾任澳大利亚军方高层的战略学者和前官员也加入辩论当中, 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名誉教授、前国防部负责战略与情报的副部长休·怀特, 前国防军总司令、海军上将克里斯·巴里, 前国防部国际政策与战略司司长艾伦·贝姆, 前澳大利亚军方情报官克林顿·费尔南德斯等人。他们虽在一系列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但在一件事上的观点不谋而合, 这就是无论有没有澳大利亚的辅助, 美国都无法战胜中国。休·怀特指出: “在台湾问题上, 澳大利亚支持与否, 美国都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战争。”克里斯·巴里认为, 若与中国发生任何战争, 对澳大利亚将极具破坏性。艾伦·贝姆表示, 考虑到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速度, 2035 年以后更有可能出现中国战胜美国的结果^[25]。

(三) 阿尔巴尼斯政府为所谓“战鼓论”降噪降温

2022 年 5 月, 澳大利亚大选后政党轮替, 一向对华强硬的莫里森政府下台, 工党的阿尔巴尼斯上台执政。与莫里森政府相比, 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抨击中国的言论上更加谨慎, 批评所谓“战鼓论”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避免在言辞上挑衅中国核心利益。此后, 澳大利亚的对台政策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变得更加温和与小心。对于保守党政府咄咄逼人的台海政策, 工党政府称不会被卷入有关台湾问题的假设中。阿尔巴尼斯在接受 CNN 采访时被问及“如果中国大陆‘入侵’台湾”, 澳大利亚是否会在军事上“保卫台湾”, 称将“使用外交语言而不是走那条路”, 谈论这些潜在冲突的问题不符合澳大利亚和平与安全的利益^[26]。对于美国时任众议长佩洛西窜台, 阿尔巴尼斯拒绝评论, 称美国与台湾同行的接触程度是他们的事。他称, 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 “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 将继续与伙伴合作, 促进台海和平与稳定”^[27]。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理查德·马尔斯重申澳大利亚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称不相信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会阻碍堪培拉与北京之间双边关系的修复, 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做法将是“专业的”和“尊重的”, 不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28]。马尔斯认为需要对中澳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采取谨慎的态度, 但同时也声称必须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的前景保持警惕。

三、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中“战鼓派”泛起的成因和意图

澳大利亚近年来出现的所谓“战鼓论”并非因应现实中的可能，更多是为了服务于鹰派人士对其内外利益的把握，特别是内部选举、党争以及澳美联盟的需要。这些战争言论的出现主要是着眼于满足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需求，实现鹰派的政治利益。

（一）所谓“战鼓论”的成因

澳大利亚所谓“战鼓论”出现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主要与双边关系、区域局势紧张有关。其中，澳大利亚国内党争是引发所谓“战鼓论”的直接原因。

1. 美澳同盟的联动影响。“战鼓论”的出现主要与澳大利亚对台政策服从于美国对华战略相关。对澳大利亚而言，澳美同盟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石，加强这一联盟可确保其驾驭地区安全环境的能力^[29]。澳大利亚莫里斯政府对美国霸权的强烈认同解释了其对美国地位下降的普遍恐慌，这让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态度更加明确。鉴于澳美同盟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澳任何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变化都与美国的对华战略密切相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取决于中美关系状况。

历史地看，澳大利亚对华强硬政策的转变与中美关系的冷热程度高度吻合。1996 年，受台海局势的影响，中美关系高度紧张。当时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跟随美国，迅速逆转了前任基廷政府对华的温和政策，改对中国强硬，支持美国派遣海军进入台湾海峡，并邀请达赖喇嘛窜访澳大利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特朗普政府声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集中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对付中国。而后的拜登政府实际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竞争对抗关系的定性，采取了以“印太”战略为主导的对抗遏制措施，继续对中国保持强硬姿态。作为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跟随美国调整台海政策也不难理解。澳大利亚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化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并依从美国强化安全合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教授保罗·迪布认为，在两岸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美国面临介入其中的风险；如果美国要求澳大利亚提供军事援助，澳大利亚别无选择，只能服从^[30]。作为远离欧洲和北美的白人国家，澳大利亚认为只有站在美国一边才能维护其安全。那些在澳大利亚政界有所企图的人，首先争取来自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必不可少。莫里森就因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经常受美国官员“称赞”^[31]。澳大利亚政客惯于谄媚献礼、取悦华盛顿政客，他们通过高喊反华口号来寻求美国的关注不足为奇。此外，美国在澳大利亚教育界和媒体智库中长期保持巨大影响力。一些大学中的“和平研究中心”被改名为“战略研究中心”，以期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企图将澳大利亚人的思想塑造成“反华”思维。此外，澳大利亚许多媒体和智库也受到美国的操纵，成为美国的宣传机器。

当然，中美关系紧张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和主要的国际政治环境，但它并非澳大利亚对台海形势判断的唯一标准。澳大利亚长期持有的地区霸权心理加剧了其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防范，热衷于将自己标榜为“地区领导国家”和“首选合作伙伴”^[32]。作为亚太地区“唯二”的白人国家，澳大利亚怀着固有的“零和思维”，面对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亚洲崛起，担心其地区霸权受到冲击和挑战，面临被战略孤立的可能性，因而对亚洲强国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任何可能影响其地区势力范围的力量。由于中国的力量增长速度快，澳大利亚担心贸易机会将被中国公司“夺走”，担忧中国

不断上升的实力会“侵蚀”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因此, 澳大利亚便通过对台湾事务等中国内政加强干预并向中国施压, 企图获得某种程度的砝码, 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2. 国内政治党争的推波助澜。政党政治对澳大利亚外交的影响相当明显。与工党对亚洲的态度相反, 联盟党认为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 更有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中右翼自由党领导的联盟控制议会后, 澳大利亚便形成对中国强硬的政策路线, 把应对“中国威胁”、对华示强视为赢得政治胜利的工具^[33]。围绕议会选举竞争, 澳相关政党在台海问题上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 使中国成为选举的“选票提款机”。2022年5月,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举行全国选举。选举政治明显抬升澳大利亚政客对华政策的激进言论, 联盟党与工党为争取选民支持, 特别是执政党把对中国政策作为“催票器”, 煽动民粹情绪, 使得所谓“战鼓论”等强硬言论层出不穷。澳大利亚执政的保守派联盟利用台湾作为支撑其选举优势的棋子, 在遇到麻烦时拼命地玩“中国牌”^[34], 不断炒作“外部势力干预选举”, 暗示其工党对手将向强大而“危险”的中国政府示好, 从而显示其对中国强硬, 凸显政敌对中国软弱屈服, 以转移澳大利亚人对其国内施政弱点的关注, 为谋求连任寻找理由。联盟党抨击对手工党阿尔巴尼斯为所谓中国“代理人”^[35], 而工党也回击联盟党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不够强硬。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后, 工党猛烈抨击联盟党, 指责其造成澳大利亚几十年来在太平洋地区最严重的外交失误, 使澳大利亚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 如若工党胜出选举, 会增加外交经费援助太平洋地区国家^[36]。澳大利亚政客对“中国威胁”紧抓不放, 政界的头面人物不断宣扬敌意和恐惧情绪, “对华鹰派”鼓吹与台湾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3. 游说集团的煽动。澳大利亚媒体与智库在所谓“战鼓论”等强硬政策形成方面扮演了重要的推手, 它们服务于军工集团利益。澳大利亚民众从媒体头条中, 常常听到澳处于“与中国开战边缘”的信息和评论, 这些信息激起他们对战争的恐惧。有证据表明, 台湾当局为所谓“战鼓论”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已向澳大利亚许多有影响力的智库捐赠上百万美元, 尤其是向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供资金。根据公开的年报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国防部每年向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供400万美元的一次性拨款, 占该机构年收入的37.5%。此外, 美国国务院和“台北驻澳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机构提供资金多达195万美元, 占该机构年收入的18.3%。几乎所有海外机构资助目的都指向中国^[37]。战略政策研究所是一个鹰派组织, 专门炒作“中国威胁”, 构筑针对中国的负面叙事和虚假事实, 被称为“澳大利亚改变中国看法背后的智囊团”。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将其描述为“澳大利亚中国威胁论的设计师”, 维多利亚州参议员金卡尔谴责这些智库同华盛顿携手推动“与中国的新冷战”^[38]。该机构执行董事彼得·詹宁斯是制造中国“威胁论”、鼓吹澳军事介入台海的摇旗式人物, 此人公开年薪高达44.5万澳元(仰赖金主资助)。詹宁斯妄称, 台湾之于当代, 就像1939年波兰之于欧洲一样; 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有赖于此, “它使我们与台湾的安全直接相关”^[39]。拜登政府上台后, 詹宁斯再度炒作澳大利亚必须准备好战斗, 称解放军现在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如果美国在中国的“胁迫”下选择不大力支持台湾地区, 这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信誉^[40]。詹宁斯对美国媒体宣称, 在“印太”地区建立强大的威慑很重要, 因为中国大陆会认为代价过高, 不值得对台湾进行军事冒险^[41]。这些依附于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和相关资助方的智库, 充当“政治雇佣军”的角色。只要资助者希望得到证实和确认某种立场的“建议”, 它们就提供相应的理论与舆论造势, 如此就能继续得到资助。

（二）所谓“战鼓论”的政治目的

澳大利亚鼓动所谓“战鼓论”的鹰派人士希望通过散播战争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一方面，对内可以攫取更多政治利益。散播与中国可能发生战争的言论，能够为澳大利亚的鹰派人士带来政治利益。通过强调战争的威胁，他们可以在公众中塑造捍卫澳大利亚的强硬者形象。这种情绪的操纵可以使鹰派人士获得更多支持和认同，有助于他们在选民中树立形象，争取选民的选票，赢得选举胜利。鹰派人士希望通过散播战争言论来推动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所谓“战鼓论”鼓吹者通常会选择特定的信息和事件来支持他们的战争言论，并通过采访、专栏文章、电视节目等手段进行选择性和强调特定的威胁，影响公众对局势的理解，从而形塑民众对战争风险的认知，激发公众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而当人们面临威胁时，更有可能支持强硬的政策和行动，以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这些言论可以激起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担忧，并对政策制定施加压力，推动政府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如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增加军费支出等。

另一方面，对外实现威慑与平衡。所谓“战鼓论”鼓吹者通过强调与中国可能发生战争的风险，试图塑造澳大利亚的形象，使其被美国视为坚定的地区安全保障者和抵抗中国影响的盟友。他们通过加强与美国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巩固澳美同盟，以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量，在地区内寻求更多的安全平衡。这种言论可以促使美国增加对澳大利亚的支持和合作，构建对华政策的联合行动，扩大澳大利亚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意图在南太平洋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同时，所谓“战鼓论”鼓吹者希望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关注和担忧，加大对中国的警惕和抵抗，联合行动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维护澳大利亚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利益。

四、所谓“战鼓论”的影响及限度

澳大利亚政界、舆论界鹰派人士对介入台海冲突的言论总是不能自拔。然而，这些战争言论对中澳关系改善以及台海局势缓和造成了负面影响，引发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地区不稳定，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一）所谓“战鼓论”产生的后果

1. 给中澳关系制造“政治噪音”。澳大利亚政客和媒体普遍对台海问题的历史经纬所知甚少，并且有一种反射性的倾向。所谓“战鼓论”鼓吹者往往将问题转化为“要么对中国强硬、要么向中国投降”的零和思维与二元对立的身份政治术语。一旦外交政策成为身份认同而非政策选择的问题，它就会缩小政治上妥协的可能性。在这种世界观下，每个让步都将被刻画成一种投降，而不是缩小分歧、寻求合作的努力。于是，以所谓“战鼓论”为代表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政客频繁攻击中国，渲染“台海恐有一战”的论调，给中澳关系“火上浇油”，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反华言论也在澳大利亚社会引起恐惧和不安全感。澳大利亚舆论界煽动仇视中国的运动引发社会上对澳华人华侨的攻击，要求澳华人“谴责”中国，否则将质疑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忠诚，种族主义者更是对华人进行人身伤害。澳大利亚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2%的澳大利亚人担心中国可能“袭击”澳大利亚。这一调查结果与所谓“战鼓论”叫嚣战争不无相关。

2. 甘当美国的“附庸跟班”。美国政府目前尚未明确作出将来要“防卫台湾”的保证，只是同

意提高其“自卫”能力。澳大利亚一部分政客和媒体频繁发出的“好战”言论, 实际上是对美国注意力的“吸引”和力量配置的“催促”。它让美国接收到的信号是, 由于中国军事力量“咄咄逼人”, 试图改变台海现状, 西太平洋地区战争阴云密布, 美国需要马上把军事力量往亚太地区转移部署, 这样就会更加凸显澳大利亚的重要性。美国驻澳大使馆临时代办迈克尔·戈德曼曾透露, 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讨论应急计划, 以应对在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冲突; 不仅要使两国军队具有互操作性和良好的协同运作, 而且还要进行战略规划^[42]。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一旦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及其盟友将采取行动。澳前国防部部长达顿随即附和声称: “如果美国选择采取一项行动, 我们不支持美国的行动, 那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将与美国一道保卫台湾。”^[43] 这些人士妄想, 在和平时期, 澳大利亚在中国海域的常规潜艇行动可能会迫使解放军分散其反潜战力部署, 以消耗其他领域所需为代价, 在反潜战上投入资源; 而在战时, 则依托澳英美联盟中的澳大利亚海军(包括今后新编入服役的核潜艇)参与封锁行动, 甚至阻断中国海上战略通道。

3. 向“台独”势力喂“迷魂汤”。澳大利亚政客等一批人鼓动战争、加入美国“保卫”台湾以及让中国付出各种代价等言论, 给民进党当局释放了错误信号, 让台湾出现一种可以依赖澳大利亚的错觉, “台独”势力因此跃跃欲试。台当局宁愿相信, 澳大利亚、美国会出兵“协防保护”台湾, 如此中国大陆才不敢动武。顽固“台独”分子吴钊燮屡次与澳大利亚智库、媒体、议员等接触, 声称正准备与中国大陆开战, 呼吁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提供支持, 敦促澳大利亚向台北派驻武官, 以加强安全机构联络。例如, 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 吴钊燮声称希望澳大利亚增加对台湾在情报和安全方面的援助。蔡英文也感谢澳大利亚支持台湾, 表示“维护我们共同的民主、自由和法治价值观”^[44]。有了澳大利亚政客摇旗呐喊, “台独”分子叫嚣的战争言论自然契合澳大利亚、美国同行的“心意”, 在挑衅大陆、挟洋自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险。

(二) 所谓“战鼓论”面临的掣肘因素

当然, 所谓“战鼓论”总体上属于政治造势, 受到包括经济、舆论、政治、法律等因素的掣肘; 台湾当局指望澳大利亚介入并不明智, 实乃玩火自焚。这种做法面临着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后果和国际声誉影响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 必将以失败告终。

1. 所谓“战鼓论”有悖于经济利益。在过去十多年里,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伙伴, 占其全部出口收入的 32.2%; 美国位居第二, 仅占市场份额的 8.2%^[45]。澳大利亚的矿产、农业、教育、旅游、酿酒等行业因中国市场而繁荣, 从业者也因与中国贸易合作赚得盆满钵满。2020 年, 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在系列问题上挑衅中国利益, 波及贸易领域。煤炭、木材、大麦、棉花、牛肉、食用油、龙虾和葡萄酒等多类产品都受到严重冲击。鉴于中国的庞大规模, 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在短期内无法被取代。这意味着, 无论喜好如何, 澳大利亚各方都会争相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盛宴, 也不得不承担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巨大风险。目前, 中澳正在开展贸易谈判, 进展比较顺利, 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 2023 年 4 月访华讨论双边贸易问题。当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访澳, 举行中澳外交部政治磋商, 这是六年来访澳的最高级别中方官员。中澳关系改善迹象对所谓“战鼓论”也给予了一定的政治牵制。不过, 双方的贸易情况仍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得到较大改善。所谓“战鼓论”漠视与中国交好的巨额经济利益, 迎合美国及特殊利益集团, 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这种刻意制造台海冲突氛围的妄言以及与中国爆发战争的恐吓,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造成无法承受的

灾难。

2. 所谓“战鼓论”未获普遍民意支持。事实上，澳大利亚使用武力干预台海局势并没有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有关战争的讨论越来越多，针对中国的负面舆论持续发酵，但真正支持武力介入台海的人却没那么多。即使在“战鼓论”甚嚣尘上的 2021 年，洛伊研究所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及若中美爆发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应怎么办时，57%的受访者称澳大利亚应该保持中立^[46]。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68%）表示只有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才应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更少的受访者（34%）表示会支持在亚洲采取军事行动，例如台海冲突^[47]；只有 21%的澳大利亚人准备为支持“台独”而发动战争，40%的人反对，39%的人未作决定^[48]。从这些民调数据可以看出，支持“台独”对澳大利亚没有好处，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会想冒着危险为他人参战。大打所谓“中国威胁论”为选举牌的联盟党在选举中下台即是明证。

3. 所谓“战鼓论”不具法律支持地位。美国若要求澳大利亚在台海冲突中一起作战，澳方该如何应对一直存在争论。悉尼大学国际法教授本·索尔尖锐地指出，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考虑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开战，公众就应该知道战争是否合法，而不仅是出于对“台湾民主”的政治“同情”或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偏好的产物。索尔进一步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维护对自己领土和人民的权威，包括通过强行镇压分裂主义。西方干涉中国内政以协助台湾，将是对中国的非法使用武力和刑事侵略^[49]。休·怀特认为，《澳新美条约》第四条中的“太平洋地区”不包括台湾地区^[50]。条约文本没有直接规定澳大利亚有义务“保卫”台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伊恩·亨利认为，澳大利亚对澳新美联盟处理台湾问题的义务微乎其微，不采取行动造成的潜在联盟后果被夸大了^[51]。因此，澳大利亚军事介入台海争端不仅没有国内法的支持，更没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正当性。

五、所谓“战鼓论”的未来走向

澳工党政府上台后，原联盟党政府高调炒作的所谓“战鼓论”声势有减弱的迹象，其走向如何，将继续受到中澳政治氛围、经贸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

一方面，“战鼓论”在政策影响上将会走弱。伴随鼓吹战争论调的政客下台，“战鼓论”对工党政府台海政策的影响不能与莫里森政府时期同日而语。所谓“战鼓论”政治噪音尽管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了不少好战的言论，但从未改变澳大利亚“一个中国”政策的事实。阿尔巴尼斯政府一再强调同中国保持合作，希望以沟通交流来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阿尔巴尼斯上台后就多次表达了访华的积极意愿，表示将在适当时间访华；继续主张消除澳中之间任何贸易障碍，并形容两国为“两个伟大的国家”^[52]。双方在外交上也确实凭借一系列出访交流活动达成一定的共识。澳大利亚新政府多次重申对“一中政策”的承诺，表示尽管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但希望建立稳定的澳中关系，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保持稳定^[53]。两国外交关系开始逐渐升温。2022 年 11 月，在 G20 印尼峰会期间，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时表示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澳方愿意通过建设性、坦诚对话沟通缩小分歧，推动澳中关系稳定发展。2022 年 12 月，黄英贤访华并举行第六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表示要恢复和发展各领域沟通交流。阿尔巴尼斯表达了访华的

积极态度, 将会接受访华的邀请^[54]。2023年11月6日, 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阿尔巴尼斯成为7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在任总理, 表示“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积极推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双方同意恢复中澳总理年度会晤、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及其他政府间对话机制。在澳大利亚惠特拉姆前总理访华50周年之际, 这一访问为中澳关系修复增添了一些暖意。随着两国政治关系氛围改善, 中澳开始就大麦争端达成协议。澳大利亚统计局2023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当月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28亿美元, 环比增长28%, 同比增长31%, 创历史新高^[55]。通过高级别的互动和访问, 中澳双方有机会重塑互信和友好关系, 减少紧张局势, 增进合作的机会。这是中澳两国一度冰冷关系解冻的重要迹象, 表明两国关系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未来, 工党政府对台立场预期不会改变, 但是表现方式会更为低调, 其希望改善中澳经贸关系, 不会刻意炒作战争议题, 且不赞同所谓“战鼓论”的激进主张。工党政府在涉台象征性表态时会讲求成本管控, 避免成为中国“火力”反击的主要对象。对于接触派来说, 充分发展与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澳国防部部长马尔斯表示, 前政府的说话方式总是好战, 新政府则寻求改变语气。在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后, 黄英贤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大陆发射弹道导弹, 呼吁各方缓和紧张局势, 但被问及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 澳大利亚是否会支持华盛顿时, 黄英贤称不会回答假设性问题^[56]。这实际上是回避军事冲突问题, 降低了声调。黄英贤表示, 虽然两国关系无法回到15年前的状态, 但澳政府正在寻求稳定与中国的关系, 通过外交努力降低台湾问题上任何潜在冲突的热度, 并警告国内媒体和政界不要“疯狂”地猜测战争^[57]。2023年6月,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马尔斯称, 该地区内部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但不希望看到台海现状有任何改变^[58]。迄今为止, 美国尚未对阿尔巴尼斯政府稳定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发表公开评论。但据洛伊研究所称, 美国外交官私下里警告澳大利亚要谨慎^[59]。澳大利亚对此认为,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 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作”, 但“在必须反对的地方……始终以我们的国家利益为重”^[60]。整体上看, 澳大利亚政府倾向采取地缘政治平衡行动, 在中美之间走“地缘政治钢丝”, 比如阿尔巴尼斯在访华前后两次访问美国, 寻求进一步巩固关系。阿尔巴尼斯希望通过沟通和接触的方式稳定关系, 展现了其外交路线的务实风格。

另一方面, 所谓“战鼓论”在军事布局上仍存空间。澳大利亚和中国尽管就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很小, 但就其本质而言, 国防政策是在低概率、高后果的事件领域运作, 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莫里森政府卸任前宣布在“中国和俄罗斯构成战略风险”的情况下, 推出380亿美元的国防扩张计划, 计划在几年内把国防军规模扩充至10万人, 达到越南战争以来的最大规模, 澳军将进入战时状态^[61]。同时, 澳大利亚也没有放弃同美国的军事政治合作, 阿尔巴尼斯仍旧将澳英美联盟作为澳大利亚外交与安全的关键方向, 不断推进同英美两国的核潜艇协议。工党政府尽管不会像联盟党政府那样敌对地炒作战争威胁, 但坚持反对所谓“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政策。澳国防部部长马尔斯声称, 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周边地区的航行自由对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至关重要^[62]。这位新任国防部部长上任第二个月即承诺将澳美军方合作从互操作性发展到互换性。阿尔巴尼斯政府承诺继续增加军事力量, 不会让国防开支低于联盟党政府的目标(即占GDP的2%)。这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民意支持。洛伊研究所202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增加军费开支, 多数人认为

中国在未来 20 年内将成为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63]。2023 年 4 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一份报告，提出准备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改革，将优先考虑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制导武器的国产化，并将北部基地打造成威慑对手、保护贸易路线和通讯的据点^[64]。

为支持美国，澳大利亚军方往南海派出舰船和飞机，积极寻求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在澳英美联盟机制下，美澳军事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顶点。澳美联合研究开发高精尖武器，深化国防工业基础合作，加强“印太”地区的联盟行动，实施联合情报搜集，建立联合后勤和维持中心。澳支持美国加强“印太”军事部署，进行更多联合演习。澳大利亚舰机与中国频繁对峙。同时，澳大利亚加入“五眼联盟”一起指责中国为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澳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声称：“澳大利亚政府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同样，“战鼓论”者、澳影子网络安全部长詹姆斯·帕特森表示，政府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65]。从这个意义上看，面对中澳关系有所缓和的态势，所谓“战鼓论”鼓吹者并不甘心，仍将继续制造杂音和噪音，试图对中澳关系特别是台海问题产生负面影响。

六、结语

未来几十年，澳大利亚将面对各种战略和经济问题，其中几乎每个问题都将受到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目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成常态化，而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澳大利亚将继续在美国的战略引领下发展其安全、外交和经济政策。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也将努力寻求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当然，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中澳之间仍可能出现摩擦。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对待中国的政策相似多于不同，倾向于亲美路线，并未出现核心战略的重大变化。澳大利亚盲目追随盟友犯下过一系列历史错误，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行派兵参战；越南战争时，澳大利亚政府未收到任何出兵要求却主动派兵参战，以及在伊拉克战争中轻信美国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并直接参与战争。过去的历史教训一定程度上会让澳大利亚认识到盲目跟随盟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强调在外交政策上需保持独立自主和审慎的态度。尤其对于以务实为出发点的工党而言，采取稳健的对华政策并在处理台海问题上谨慎行事至关重要。“战鼓论”等强硬声音有损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并不是主流观点。未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只有采取独立自主和务实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才能在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中保持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实现国家长期利益最大化，成为区域和全球事务中负责任的国际参与者。

对中国来说，发展稳定的中澳关系、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有助于本地区各方利益。一是反对战争言论。澳大利亚政界、媒体和智库中的鹰派反华势力鼓吹战争言论，不仅煽动敌意情绪，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对于那些所谓“战鼓论”和“仇华论”，我国要义正词严地驳斥，反对损害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煽动地区动荡不安的行为。二是寻求长期对话。与澳大利亚政界、媒体、智库和社会各界有关人士进行长期对话，是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手段。中国应该积极寻求机会，提供平衡和客观的信息，帮助澳大利亚人客观理解中国，树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认知，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传递积极信号，以消除误解和偏见。这种对话有助于澳大利亚加深对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多元观点的理解，为双方建立互信奠定基础。三是活跃各界交流。扩大中澳两国民间交流的广度和

戴维来.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 成因、影响与走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45-162.

深度, 这不仅面向政府官员, 还包括友好人士、学者、专家和商界人士。两国民间通过参加相关活动、会议和论坛等, 开展更多形式的学术、文化、体育等交流与合作, 有利于放大澳大利亚对华关系的理性声音, 争取更多支持力量。四是充实合作纽带。贸易合作是中澳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中澳双方应继续加强互利互惠的贸易合作, 加强地方合作项目, 共同构建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中澳关系。五是妥善解决分歧。中澳两国存在一定分歧在所难免, 关键是如何管控这些分歧, 找出合作共识, 强调通过对话、合作和互相理解, 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参考文献:

- [1] 张仕荣, 冯晨曦. 美日澳涉台安全合作新动向: 路径、态势与制约 [J]. 台湾研究, 2023 (2): 24-34.
- [2] 李航. 澳大利亚强化对华意识形态遏制及其影响 [J]. 和平与发展, 2023 (4): 118-137.
- [3] 蒋沁志, 林冈, 吴维旭. “自主”与“依附”: 影响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探析 [J]. 台湾研究, 2022 (6): 89-99.
- [4] 于镭, 于飞洋.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05-115.
- [5] 徐梦盈. “五眼联盟”中澳英加新追美遏华政策差异的理论阐释 [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3 (5): 99-132.
- [6] McKenzie and Anthony Galloway. Conflict with China ‘high likelihood’, says top Australian General [N/O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22-05-04) [2023-07-27].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conflict-with-china-a-high-likelihood-says-top-australian-general-20210503-p57ogv.html>.
- [7] Samantha Maideny. Peter Dutton’s Blunt Warning Over Prospect of War with China [N/OL]. National News, (2021-09-17) [2023-07-27]. <https://www.news.com.au/technology/innovation/military/peter-duttons-blunt-warning-over-prospect-of-war-with-china/news-story/15d47f2f5b3d48ca2f43a4648a8b5531>.
- [8] Henry Belot, Jane Norman. Peter Dutton flags Australia sending weapons to Taiwan [N/OL]. ABC News, (2022-05-07) [2023-07-27].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3-06/peter-dutton-flags-australian-military-support-for-taiwan/100886412>.
- [9] Tyrone Clarke. Peter Dutton urges Labor Party to stand strong against Beijing as he labels China the ‘biggest issue’ facing Australia [N/OL]. Sky News, (2022-05-30) [2023-08-01]. <https://www.skynews.com.au/australia-news/politics/peter-dutton-urges-labor-party-to-stand-strong-against-beijing-as-he-labels-china-the-biggest-issue-facing-australia/news-story/df0bbd7ac5d23ebc3622e871f7467fa2>.
- [10] Australia vows to ‘fight back’ against cyberattacks from China, Russia [N/O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2-01-20) [2023-08-02]. <https://www.scmp.com/news/asia/australasia/article/3164062/australia-vows-fight-back-against-cyberattacks-china-russia>.
- [11] Andrew Greene. Former defence minister Christopher Pyne warns of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N/OL]. ABC News, (2021-04-12) [2023-08-02].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04-12/christopher-pyne-potential-conflict-china-politics/100064226>

-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inquirer/wolverine-has-earned-his-claws/news-story/fadb60ad24fb3d3ec560d17adc65251e>.
- [12] Matthew Knott. Military expert warns of ‘very serious risk’ of China war within five years [N/O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23-06-22) [2023-08-05].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military-expert-warns-of-very-serious-risk-of-china-war-within-five-years-20230622-p5dim9.html>.
- [13] Andrew Greene. Liberal Senator Eric Abetz calls for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an end to Australia’s ‘One China’ policy [N/OL]. ABC News, (2021-10-29) [2023-08-08].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10-29/liberal-senator-eric-abetz-pushes-for-taiwan-to-be-recognised/100577250>.
- [14] Cameron Stewart. Wolverine Has Earned His Claws [N/OL]. the Australian, (2021-10-08) [2023-08-10].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inquirer/wolverine-has-earned-his-claws/news-story/fadb60ad24fb3d3ec560d17adc65251e?amp&nk=b467bdb403e8df2b94899fb90cd77a16-1698463374>.
- [15] Red Alert [N/O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23-03-07) [2023-08-12].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red-alert-20230306-p5cpt8.html>.
- [16] Jone Feng. Majority of Australians Would Back U. S. in War with China Over Taiwan: Poll [N/OL]. News Week, (2022-06-29) [2023-08-12]. <https://www.newsweek.com/australia-us-china-taiwan-war-survey-lowy-institute-2022-1720246>.
- [17] Potential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23-06-07) [2023-08-15].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charts/potential-military-conflict-between-china-and-united/>.
- [18] It Would Make a Cat Laugh: Key Moments from Paul Keating’s National Press Club Appearance [N/OL]. the Guardian, (2021-11-10) [2023-08-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nov/10/it-would-make-a-cat-laugh-key-moments-from-paul-keatings-national-press-club-appearance>.
- [19] Daniel Hurst. Fuel on the Fire: war of word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stokes tension [N/OL]. the Guardian, (2021-04-28) [2023-08-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apr/29/fuel-on-the-fire-war-of-words-between-australia-and-china-stokes-tension>.
- [20] Paul Karp. Home affairs secretary Mike Pezzullo urged to ‘tone it down’ after ‘drums of war’ speech [N/OL]. the Guardian, (2021-04-26) [2023-08-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apr/27/home-affairs-secretary-mike-pezzullo-says-australia-cant-avoid-drums-of-war-at-cost-to-liberty>.
- [21] Paul Gregoire. Get Ready for War With China Kids, as Albo’s Bashing Those Drums for Biden [N/OL]. Sydney Criminal Lawyers, (2023-03-14) [2023-08-18]. <https://www.sydneycriminallawyers.com.au/blog/get-ready-for-war-with-china-kids-as-albos-bashing-those-drums-for-biden/>.
- [22] Bevan Ramsden. Stopping Australia’s path to America’s war [N/OL]. Independent Australia, (2023-03-10) [2023-08-20]. <https://independentaustralia.net/life/life-display/stopping-australias-path-to-americas-war,17314>.

戴维来.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 成因、影响与走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45-162.

- [23] James Curran. PM' s playing of China card trash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L]. 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 (2022-02-20) [2023-08-20]. <https://www.afr.com/policy/foreign-affairs/pm-s-playing-of-china-card-trashes-the-national-interest-20220217-p59xh1>.
- [24] Resetti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under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EB/OL]. (2022-05-25) [2023-08-22]. <https://asialink.unimelb.edu.au/insights/resetting-australia-china-relations-under-the-albanese-government>.
- [25] John Lyons. What would war with China look like for Australia [N/OL]. ABC News, (2023-02-20) [2023-08-22]. <https://www.abc.net.au/news/2023-02-20/what-would-war-with-china-look-like-for-australia-part-1/101328632>.
- [26] Anthony Albanese. Interview, Sunrise [EB/OL]. (2022-05-26) [2023-08-25]. <https://www.pm.gov.au/media/television-interview-sunrise>.
- [27] Bryant Hevesi. Albanese makes Australia' s position on Taiwan clear amid China concerns [N/OL]. Sky News, (2022-08-03) [2023-08-25]. <https://www.skynews.com.au/australia-news/politics/albanese-makes-australias-position-on-taiwan-clear-amid-china-concerns-as-he-unveils-strategic-review-into-defence-force/news-story/a83falbb8458e8d2fd87f61af2e83731>.
- [28] Miriah Davis. Richard Marles reaffirms Australia' s commitment to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stabilising' Canberra-Beijing relations [N/OL]. Sky News, (2022-08-14) [2023-08-28]. <https://www.skynews.com.au/australia-news/richard-marles-reaffirms-australias-commitment-to-the-onechina-policy-and-stabilising-canberrabeijing-relations/newsstory/716fc09621432f9692983e03ff6bb9c2>.
- [29]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2017 [EB/OL]. (2017) [2023-08-29].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2017-foreign-policy-white-paper.pdf>.
- [30] Paul Dibb. Australia and the Taiwan contingency [EB/OL]. (2019-02-06) [2023-08-2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ustralia-and-the-taiwan-contingency/>.
- [31] Yan Zhuang and Damien Cave. Australia Asks: How Far Is Too Far in Making China a Campaign Weapon [N/OL]. the New York Times, (2022-03-10) [2023-08-31].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0/world/australia/election-china.html>.
- [32] James Curran. Could the AUKUS Deal Strengthen Deterrence Against China-And Yet Come at a Real Cost to Australia [EB/OL]. (2021-09-20) [2023-09-02]. <https://www.cfr.org/blog/could-aukus-deal-strengthen-deterrence-against-china-and-yet-come-real-cost-australia>.
- [33] David Goodman. Australia and the China Threat: Managing Ambiguity [J]. The Pacific Review, 2017, 30 (5): 769.
- [34] Daniel Hurst. Penny Wong decries Morrison government' s position on Taiwan as most dangerous election tactic in Australian history [N/OL]. the Guardian, (2021-11-22) [2023-09-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1/nov/22/penny-wong-decries-morrison-governments-position-on-taiwan-as-most-dangerous-election-tactic-in-australian-history>.

- [35] Andrew Green. China behind failed attempt to bankroll Labor candidates in federal election [N/OL]. ABC News, (2022-02-11) [2023-09-03].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2-11/china-accused-attempt-bankroll-labor-candidates-federal-election/100822512>.
- [36] Daniel Hurst and Josh Butler. Solomon Islands-China pact is worst policy failure in Pacific since 1945, Labor says [N/OL]. the Guardian, (2022-04-20) [2023-09-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2/apr/19/china-and-solomon-islands-sign-security-deal-chinese-foreign-ministry-says>.
- [37] ASPI Annual Report 2020-21 [EB/OL]. (2022-04-20) [2023-09-08]. https://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ad-aspi/2021-09/ASPI-Funding-2020_2021.pdf?VersionId=tJxiJj2k0UALZCiXY18A0YodZMHFDKHv.
- [38] Myriam Robin. The think tank behind Australia's changing view of China [N/OL]. Financial Review, (2020-02-15) [2023-09-08]. <https://www.afr.com/policy/foreign-affairs/the-think-tank-behind-australia-s-changing-view-of-china-20200131-p53wgp>.
- [39] Peter Jennings. Alliance Safe, but Real Danger Lies ahead [EB/OL]. (2021-11-14) [2023-09-10]. <https://www.aspi.org.au/opinion/alliance-safe-real-danger-lies-ahead>.
- [40] Hearing on U. S. -China Relations 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entennial [EB/OL]. (2021-01-18) [2023-09-1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1/Peter_Jennings_Testimony.pdf.
- [41] China's Aggression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Trilateral Security Pact, says defense expert [EB/OL]. (2021-09-16) [2023-09-15]. <https://www.cNBC.com/2021/09/16/defense-expert-on-aggressive-china-us-uk-australia-security-pact.html>.
- [42] Andrew Greene. Australia Discussing Contingency Plans with United States Over Possible Taiwan Conflict [N/OL]. ABC News, (2021-04-01) [2023-09-16].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04-01/australia-discuss-contingency-plans-us-possible-conflict-taiwan/100043826>.
- [43] 'Inconceivable' Australia Would not Join U. S. to Defend Taiwan - Australian defence minister [N/OL]. Reuters, (2021-11-13) [2023-09-18].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inconceivable-australia-would-not-join-us-defend-taiwan-australian-defence-2021-11-12/#:~:text=Asia%20Pacific,'Inconceivable'%20Australia%20would%20not%20join%20U.S.%20to,defend%20Taiwan%20%2D%20Australian%20defence%20minister&text=MELBOURNE%2C%20Nov%2013%20\(Reuters\),Peter%20Dutton%20said%20on%20Saturday](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inconceivable-australia-would-not-join-us-defend-taiwan-australian-defence-2021-11-12/#:~:text=Asia%20Pacific,'Inconceivable'%20Australia%20would%20not%20join%20U.S.%20to,defend%20Taiwan%20%2D%20Australian%20defence%20minister&text=MELBOURNE%2C%20Nov%2013%20(Reuters),Peter%20Dutton%20said%20on%20Saturday).
- [44] Andrew Greene. Liberal Senator Eric Abetz calls for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an end to Australia's 'One China' policy [N/OL]. ABC News, (2021-10-29) [2023-09-20].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10-29/liberal-senator-eric-abetz-pushes-for-taiwan-to-be-recognised/100577250>.
- [45] Australia's goods and services by top 15 partners 2020-21 [EB/OL]. [2023-09-22]. <https://www.dfat.gov.au/trade/resources/trade-statistics/trade-in-goods-and-services/australias-trade-goo>

戴维来.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 成因、影响与走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45-162.

- ds-and-services-2020-21.
- [46] War over Taiwan [EB/OL]. [2023-09-22].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charts/war-over-taiwan/>.
- [47] Military action under ANZUS [EB/OL]. [2023-09-26].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charts/military-action-under-anzus/>.
- [48] Should Australia Go to War with China in Defence of Taiwan [EB/OL]. (2021-07) [2023-09-26]. <https://australiainstitute.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7/P1102-Should-Australia-go-to-war-with-China-in-defence-of-Taiwan-WEB.pdf>.
- [49] Ben Saul. Would a war over Taiwan be legal [EB/OL]. the Interpreter, (2021-10-14) [2023-09-2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would-war-over-taiwan-be-legal>.
- [50] 有关《澳新美条约》文本, 请见澳大利亚议会: The ANZUS Treaty [EB/OL]. (2023-09-28) [2023-10-02].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Joint/Completed_Inquiries/jfadt/usrelations/appendixb.
- [51] Iain Henry. ANZUS and Taiwan: What are Australia's obligations [EB/OL]. [2023-09-30]. <https://www.anu.edu.au/events/anzus-and-taiwan-what-are-australia%E2%80%99s-obligations>.
- [52]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China to be locked in at 'appropriate time' [N/OL]. Reuters, (2023-06-25) [2023-09-3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australian-pm-visit-china-be-locked-appropriate-time-2023-06-25/>.
- [53] Australia seeks stable ties with 'great power' China, minister says [N/OL]. Reuters, (2022-09-23) [2023-10-0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australia-seeks-stable-ties-with-great-power-china-minister-says-2022-09-23/>.
- [54] Australia PM Albanese says has not received invitation for China visit [N/OL]. Reuters, (2023-04-25) [2023-10-0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ustralia-pm-albanese-says-has-not-received-invitation-china-visit-2023-04-05/>.
- [55]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ustralia [EB/OL]. (2023-04-25) [2023-10-06]. <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economy/international-trade/international-trade-goods-and-services-australia/mar-2023>.
- [56] Mike Cherney. Australia, a Key U. S. Ally, Calls for Calm Over Taiwan [N/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2-08-02) [2023-10-08]. <https://www.wsj.com/livecoverage/nancy-pelosi-taiwan-visit-china-us-tensions/card/australia-a-key-u-s-ally-calls-for-calm-over-taiwan-GjuslGzTXugxk00G4m2Y>.
- [57] Mitch Ryan. Australia seeks to rebalance ties with China after three-year freeze [N/OL]. Nikkei Asia, (2023-04-23) [2023-10-09].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ustralia-seeks-to-rebalance-ties-with-China-after-three-year-freeze>.
- [58] Charmaine Jacob. China may be 'disruptive' and fueling anxiety — but talks must continue, defense chiefs say [N/OL]. CNBC, (2023-06-5) [2023-10-12]. <https://www.cnbc.com/2023/06/>

- 05/china-is-a-threat-but-talks-must-continue-germany-canada-australia.html.
- [59] Philipp Ivanov. Australia's delicate d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B/OL]. (2023-04-12) [2023-10-15].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australia-s-delicate-dance-unit-ed-states-china>.
- [60] Jack Lahart. Has Australia solved the China puzzle [N/OL]. Politico, (2023-10-23) [2023-1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ustralia-solve-china-puzzle/>
- [61] Andrew Greene. Defence to grow to largest size since Vietnam War, increasing by nearly 20, 000 people by 2040 [N/OL]. ABC News, (2022-03-10) [2023-10-16].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3-10/defence-workforce-growing-2040-national-security/100896902>.
- [62] U. S. Australian Defense Leaders Stress Importance of Alliance System [EB/OL]. (2022-10-01) [2023-1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176948/us-australian-defense-leaders-stress-importance-of-alliance-system/>.
- [63] Lowy Institute Poll 2022 [EB/OL]. [2023-10-12].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report/2022/>.
- [64] Nicola Smith. Australia prepares for biggest arms shake-up since Second World War [N/OL]. The Telegraph, (2023-06-04) [2023-10-20]. <https://www.telegraph.co.uk/worldnews/2023/06/04/australias-biggest-defence-overhaul-since-ww2-counter-china/>.
- [65] Jake Evans. Australia joins intelligence partners to blame China for US infrastructure cyber-attack [N/OL]. ABC News, (2023-05-25) [2023-10-23]. <https://www.abc.net.au/news/2023-05-25/australian-intelligence-blames-china-for-us-hack/102390024>.

责任编辑：刘泮菡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总目次

(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在当期开始页码)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汪仕凯(1·1)
-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规范建构……………田飞龙(1·23)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商量思维:内涵、实践与功能……………文梓浩 王 衡(1·38)
- 信息社会结构分化与包容性团结:层次、形态与路径……………戴 洁(1·51)
-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 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路 璐 李小宁(2·1)
-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樊士博 徐 敏(2·14)
- 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成利平 牛冬梅(2·25)
-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团结奋斗视角……………杨玉文(2·34)
- 迈向全方位统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镜鉴……………李 松(2·45)
-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本位及其团结奋斗逻辑……………张艳娥(3·1)
- 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郭道久 郝若雯(3·14)
-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长期稳定经验探析:统一战线视角……………冯 霞 简智荣(3·25)
- 形塑纵横交织的团结:统一战线价值新解……………张淑娟 孙冉冉(3·36)
- 统一战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底色与实践进路……………杨可 刘宗灵(3·46)
-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 ……………钱再见 高晓霞(4·1)
-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谢 静(4·10)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功能、难点与优化……………曾祥明 徐华晴(4·18)
-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陈章喜 邓 彪(4·27)
- 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严安林 洪志军(4·39)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陈云云(4·49)
- ### 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
-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戴 洁(3·57)
- 团结经济社会组织的新实践:政党—人民关系视域下组建社会工作部考察……………韩碧舟(3·70)
- 综合治理与团结意蕴:组建社会工作部的逻辑理路探析……………赵亚楠 樊士博 徐 敏(3·85)

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 “第二个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薛庆超（4·60）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田凯华（4·80）
-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于颖（4·90）
- 从新文化到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曹一飞（4·100）
- 新型政党制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成果……………王新影 温林森（5·40）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从“一条主线”到“一线两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导向
……………高永久 冯辉（5·1）
- 中华民族经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及实践路径……………徐光木（5·13）
- 财政转移支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路径与效果评估……………谢宇航 黄凯（5·26）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坐标、场域与进向……………何玉芳 张晓（6·81）
-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方正（6·93）
-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去窄化”？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朱尉 汪喆（6·108）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逻辑、内在理路和鲜明特征……………齐卫平 郑天骄（6·1）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及原创性贡献……………侯勇 柯增金（6·13）
- 团结与凝聚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康秀云 梁志勇（6·26）
-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
——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俞佳奇 秦宣（6·3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何旗（6·53）
- 从“谋一域”到“谋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在地方的孕育和实践
……………卢建华 颜晓峰（6·67）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 修例风波以来美国的涉港制裁：效果评估与中国的反制……………张建 朱晓易（1·62）
- 香港国安案件刑事管辖机制的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孙潇琳（1·73）
- 台湾地区 2022 年“九合一”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钟厚涛（1·84）
- 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特征、形势与方向……………张冠华（2·54）
-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郭雷庆 李新（2·65）
-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周明 何舒雯（2·81）

“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薛佳贝 (2·104)

修例风波以来英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方式、影响及趋势·····张 建 涂钦云 (3·95)

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斗争:逻辑、原则与策略·····周光俊 (3·108)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张 威 (4·145)

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对台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以波罗的海三国、捷克和波兰为例·····薛振威 孙 云 (5·100)

中国政府处理台湾地区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的战略考量和政策演变·····林凡力 (5·113)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与推进理路·····王 飞 刘身强 (1·94)

短视频传播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王 军 (1·107)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动向、风险与应对·····张 梦 罗 昕 (2·115)

算法权力与未来民主:数字技术的政治效应及其规制

——基于《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考察·····曹克亮 (2·125)

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与引导路径

——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许科龙波 (2·137)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编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实价值与实践路径·····高 维 刘红丽 (3·120)

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建设助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价值与路径·····罗 妍 马丽琳 (3·131)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徐光木 (3·141)

美国对华认知战:动向、影响与应对·····郭永虎 张函语 (4·110)

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认知战的运作机制与中国应对·····罗 昕 张骁 (4·124)

ChatGPT:意识形态家的机器学转向及后果·····曹克亮 (4·134)

社交机器人对涉华人权议题的舆论干预及中国应对策略·····相德宝 陈 茜 徐雄雄 (5·53)

美国涉华战略传播体系:宏观结构、微观运行及中国应对·····王超群 王珂璐 (5·65)

西方涉疆“强迫劳动”谬论演变与中国应对策略

——基于2018—2022年13家海外媒体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吐尔孙·艾拜 (5·78)

华语转话语:华裔留学生云端社群中的国际表达效能·····陈雯雯 (5·91)

从统战话语到话语统战: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融通构建与图景展望

·····林华山 龚静阳 (6·126)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结构、议程与整合困境:2022年中期选举后美国的政党政治走向·····王 浩 (1·118)

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特点、机制及走向

——以第115—117届国会涉华提案为例·····石培培 (1·130)

加拿大反分裂立法的历史图景、演进规律及当代镜鉴·····倪春乐 王泊勋 (1·144)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简军波 方炯升 (1·161)

右翼崛起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基于意大利兄弟党上台的透视……………彭重周（1·175）
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朱德涛 邓 妮（1·189）
论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合作：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中心的考察……………严少华 李炳萱（2·148）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郭永虎 于艳文（3·154）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美国对华人权制裁：法理批驳与中国因应……………李燕飙 许 妙（3·166）
美国移民拘留中心的强迫劳动：表现、后果及中国应对……………尚海明（3·181）
“以疆遏光”：美国以人权借口打压新疆光伏产业的新动向与中国新应对……………王 鹏（5·127）
拜登政府产业政策中的技术民族主义实践：表现、策略及挑战……………袁阳丽（5·142）
澳大利亚台海政策辩论及延续：成因、影响与走向……………戴维来（6·145）

研究现状与动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

——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何 旗 王 婷（2·161）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年第6期 总第42期 第7卷

双月刊 2023年11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20.00 元

统一
战
线
学
研
究

二
〇
二
三
年
第
六
期
（
总
第
四
十
二
期
第
七
卷
）